

2002

11

总第 128 期

炎黄春秋

彭老总在太原前线

张学良说杨虎城是西安事变主角

恩格斯勇于否定自我

郭影秋临终口述：『文革』亲历记

黑恶势力背后的关系网和保护伞

炎黄春秋杂志社出版



十七孔桥

炎黄春秋

春 秋 笔

- 1 陈独秀李大钊开创早期党风.....沈建中
4 总理办公室撤销始末.....南 哲
英 杰 谱
9 彭老总在太原前线.....吴 象
14 陈伯钧毛泽东的将帅情.....左玉河
沉 思 录
20 黑恶势力背后的关系网和保护伞.....江仁宝
人 物 志
23 蔡元培的为人风范.....崔志海
29 周惠在内蒙古推行包产到户.....储建中
陨 星 篇
32 我的父亲阳翰笙.....欧阳小华
38 陈沂:凡来找我的都不拒绝.....刘国尧
一 家 言
40 我们需要再反一次党八股.....潘家铮
42 恩格斯勇于否定自我.....冯东书
亲 历 记
44 郭影秋临终口述:“文革”亲历记 郭影秋口述 王俊义整理
挚 友 情
54 追思孙犁老师.....徐光耀
58 “好婆婆”莫艾.....周建英
遗 闻 录
62 张学良说:杨虎城是西安事变主角
——美国所藏档案新发现.....杨天石
65 邓拓收购名画的风波.....苏双碧 王宏志
文 荟 园
69 辛亥革命时期的“上海新舞台”.....李仲明
72 龙江剧创建者白淑贤.....曲润海
九 州 景
77 屈原流放地溆浦.....李华章
79 “苏三监狱”与《玉堂春》.....谈 风

顾 问:

费孝通 程思远 **陈 沂**

杜润生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光远 王俊义 王景山

冯 征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李 庄 李 普

李 锐 李学勤 吴 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 镔

张岂之 张国琦 郑 惠

范敬宜 凌 云 曾彦修

穆 青 戴 逸 魏久明

社 长(法人代表): 杜导正

副社长:

方 实 宋文茂(常务)

徐 孔 程理嘉

执行主编:

吴 思 刘家驹 庄建平

编辑室主任: 赵友慈

办公室主任: 郝爱存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理事长: 陈 渊

理事单位: 深圳市亚大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

秘 书 长: 徐 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

邮编 100045

电话 68532569 68534879 68532048

印刷: 唐山市润丰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

总公司(北京 399 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 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

龙源网上书店

网址: www.dragonsource.com

gb.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本刊电子信箱(E-mail)地址:

Yanhcq@sina.com

出版日期 每月 4 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 0079 号

定价: 4.80 元

陈独秀李大钊开创早期党风

● 沈建中

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十五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作风建设，在长期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形成并坚持发扬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优良作风。”的确，从党的诞生开始，中国共产党在作风建设方面，就有着较高的起点，而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在这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

1920年初，陈独秀在上海开始对工人群众进行革命启蒙教育，他主张创办工人刊物，并把上海作为工人运动的基地和建党的中心。他认为“上海工商业都很发达，新文化运动将影响到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到他们自己的地位，令资本家把劳动者当作同类的‘人’看待，不要当作机器、牛、马、奴隶看待。”陈独秀对上海原有的中华工业协会、中华总工会等团体进行了调查，发现这些工会是由“小政客发起的”，办工会的人“总是穿长衣的先生们多，穿短衣的工人很少很少”。这些团体大都为资本家、工头或政客所把持，不是真正的工人团体。因此，陈独秀着手筹办工人刊物《劳动界》、《伙友》（周刊），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真正的工会。他将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七卷六号编辑成《劳动节纪念号》，有孙中山等16人的题字，其中有9人是名不见经传的劳苦工人。如怡和纱厂绒毯车间工人武毓源的题字是：“不劳动者人类之公敌也”。植树工人刘朗山的题字是：“黜逐强权劳动自治”。先施大菜间工人王澄波的题字是：“不劳动者口中之道德神圣皆伪也”。怡和纱厂工人周传勋的题字是：“不自

食其力者社会之绝物也”。等等。除工人题字外，还刊登了33幅工人劳动状况的照片。这期刊物对国内劳动状况调查的文章，约占全部篇幅的三分之二。4月2日，陈独秀出席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作了题为《劳动者的觉悟》的演说。他指出，世界上“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他们是社会的“台柱子”，“因为他们的力量才把社会撑住，若是没有做工的人，我们便没有衣、食、住和交通，我们便不能存在。”陈独秀还亲自指导筹备“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这是上海工人第一次大规模地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

李大钊同样强调密切联系群众。他反复教育大家：“不要脱离群众”，“只有深入群众才能领导群众，只有不脱离群众才能指挥群众。”在同反动军阀政府的斗争中，李大钊总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1926年3月18日，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纠集英、美、法等八国以最后通牒方式向中国挑衅，李大钊领导10多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示威大会。李大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号召大家“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热血”，“不分界限地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反对军阀的卖国行为”。他充满激情的演说教育了广大群众，一致通过了驳回最后通牒以及驱逐八国公使等决议。随后2000多人的请愿团再次向政府请愿。反动军警用子弹、刺刀和大刀对手无寸铁的群众进行了大屠杀。当天，死伤240多人，李大钊也受了伤。但他沉着果断地指挥和掩护群众撤退，在敌人的枪声响了30分钟后，李大钊才同最后一批群众撤离。1926年3月18日这一天，被鲁迅称为“最黑暗的一天”。

正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密切联系群众，同群

众保持血肉联系，才使得初创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群众中生根、开花，迅速发展壮大。

二

陈独秀、李大钊十分重视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应当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陈独秀、李大钊都因故未能出席。“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纲提出：“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坚决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断绝一切联系”。陈独秀从广州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后，学习了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结合中国国情，于1922年6月15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分析了中国的现状和社会性质，他明确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处于受压迫的地位，军阀和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是中国现阶段的革命对象。他分析了国内民主派的力量，指出：“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他还提出：“在无产阶级未能取得政权以前，依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陈独秀提出了民主革命纲领的基本原则，为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作好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在1922年7月16日到23日的“二大”上，陈独秀等人起草的大会宣言，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方针。这个民主革命纲领，成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各阶层群众的战斗旗帜，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对当时的革命斗争起到了极大的指导作用。

在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方面，陈独秀、李大钊同样为全党作出了表率。

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独秀在政治报告中作了自我批评：“陈独秀由于对时局的看法不清楚，再加上他很容易激动，犯了很多错误。”与此同时，他对中央委员会和个别中央委员也作了批评。

李大钊也是开展自我批评的楷模。1922年5月，胡适起草了《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了好人政府主义，主张不分党派，由全国所公认的好人，建立一个“好人政府”，作为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要求。他还提出了具体的政治主张：即南北议和、尊重国会、制定宪法、废督裁兵、整顿官制、改革选举制度、财政公开等。这个政治主张完全是充满书生气的空想，在当时的中国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胡适首先同李大钊商量，李大钊认为这是当时混乱局势中一种差强人意的办法，于是同意担任《我们的政治主张》的提议人。而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讨论此事时，一致认为，“好人政府”的主张会阻碍革命思潮发展，将群众引入改良幻想的歧途。为了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态度，陈独秀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反对“好人政府”的主张，批评一切改良妥协的倾向。李大钊得知中央的主张后，经过深入思考，认为中央的主张是正确而合时的，立即作了自我批评，并把《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的印刷品分送给主张“好人政府”的朋友，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取得了大家的谅解。在李大钊的带领下，北京全体党员会议通过决议，批评了“好人政府”，一致拥护中共中央的立场。

三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也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根本目的。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直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虽然还不是执政党，但是由于国共合作，一些党员在国民党地方党部和地方政府中担任了一定的领导职务，有了一定的权力，出现了一些腐败现象。针对党内的不良倾向，1926年8月4日，陈独秀亲自签发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个反腐败文件：《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这份文件指出：五卅运动以来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的党乘着革命的高潮，有突飞的发展，这自然是一件可喜的现象。但同时投机腐败分子之混入，也恐是一件难免的事，尤其在比较接近政权的地方或政治、军事工作较发展的地方，更易有此现象。”“一个革命的党若

是容留这些分子在内,必定会使他的党陷于腐化,不特不能执行革命的工作,且将为群众所厌弃。所以应该很坚决地清洗这些不良分子,和这些不良倾向奋斗,才能坚固我们的营垒,才能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望。”中共中央特别训令各级党部:“迅速审查所属同志,如有此类行为者,务须不容情的洗刷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使党腐化,且败坏党在群众中的威望。望各级党部于接此信后,立即执行,并将结果具报中央局,是为至要。”为了捍卫党的纯洁性,陈独秀同腐败分子进行了坚决斗争,决不姑息,决不包庇。1926年12月2日,陈独秀发出《中央局给江西地方信》,要求“严厉取缔党中机会主义做官热的倾向”,指出几个热衷于当官的江西同志“之腐败堕落,充分表现机会主义的倾向”。强调:“当立即限期命令他辞职,如果过期不理立即登报公开开除。还有不服从党的命令而自由猎官猎高位的人,亦须严重警告,不听即断然公开开除。”陈独秀代表党中央采取的严厉措施,保证了党的纯洁性,同非无产阶级政党划清了界限。

在坚决反腐败的同时,李大钊、陈独秀以身作则,过着清贫的生活。

李大钊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收入不菲。但他把大部分工资用于党的事业,用于接济他人,以致使他的家庭常有断炊之虞。为了避免这种窘境,发薪水时他不得不预先扣下一部分交给妻子。李大钊“生时仅可供家食,殁后则一贫如洗,棺槨衣衾,皆为友助”,确实是艰苦奋斗的光辉榜样。

为了一心一意搞革命,陈独秀放弃了大学教授优厚待遇,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全身心地扑在革命事业上。他的生活十分清苦,妻子多病,还要抚养孩子,经济拮据,全家的生活主要依靠《独秀文存》的版税收入勉强维持,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亚东图书馆的老板汪孟邹知道他的生活很苦,对别人说:陈独秀“真是一个硬汉,他从来不开口要钱。我看见他坐的时间长了,总要问他一句:‘要一点钱罢?’他点点头。他拿了一元、两元,再坐一会儿,回去了”。据汪原放回忆,每次陈独秀到亚东图书馆,汪原放的母亲或婶母总要煮面条或炒蛋炒饭给陈独秀吃。汪原放说:“我的母亲、婶母常说,他苦呵!没有什么好的吃呵!一碗面,他总觉得是很好吃的!”

四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充分发扬民主,维护集中统一,是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环节。陈独秀在建立党的民主集中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担任中共中央负责人后,明确主张:“中国共产党不采取党魁制,如孙中山先生之任国民党总理那样,而采取民主的委员制,从委员中推选一个书记来负联络之责,其他委员分担宣传、组织等各方面的工作,权力不应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他强调委员制适合中国国情,指出,设立书记,遇事公决,不仅可以确立党的民主生活,而且可以杜绝个人独裁以及官僚式的流弊。由于陈独秀有较高的威望,开会时,大家十分尊重他的意见。陈独秀早有察觉,绝不把自己凌驾于党的组织之上。在1924年5月的中央扩大会议上,陈独秀明确表示:如果中央的政策多取决于他的意见,难免会发生偏差,因此要求会议给予纠正。他注意调动每个党员的积极性,鼓励大家发表不同意见,不搞一言堂。他起草的中央文件,总是请所有同志提出修改意见,注意集中大家的智慧,这种做法已经成为党的优良传统。

李大钊的民主作风,也受到党员们的一致好评。罗章龙回忆李大钊说:“他在工作中,以身作则,贯彻党内民主,实行集体领导。他坚持原则,服从中央,根绝派性,排除宗派思想。在他带领下,北方区组织长期稳定,团结一致,发扬正气,严斥奸佞,形成了一整套有关合理使用干部的人事制度,使北方区委成为一个艰苦朴素、忠心革命,既是指导北方地区各项活动的运筹帷幄的决策机关,又是一个执行决议的坚强战斗集体。”“守常同志谦虚谨慎,作风民主,很尊重群众的意见……使用干部,大胆放手,对同志十分信任……在教育党员方面,守常总是主张革命原则,一秉大公至正,主张团结,既不损害同志,也不放松批评……”

包惠僧回忆李大钊时写道:他在我们同志中,年龄最长,地位最高,所以我们在工作中遇着困难就去找他,他没有哪一次不是热情地接待我们的。他对同志们的意见总是虚心听取,慎重考虑。他从没有因为自己的工作忙,把区党委给他的工作任务推出来或者压下去。(责任编辑 林 耀)

总理办公室撤销始末

● 南 哲

1965年,关心政府机构的人们惊讶地发现:在新的国务院建制中,总理办公室突然消失了!许多人纳闷,不知道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为什么要取消总理办公室这一高效运行的政府机构?

总理办公室是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脚步和这个国家政府首脑忙碌的脚步走过来的。

新中国一成立,政府总理和所有的副总理几乎都处于“日理万机”当中。这么一个泱泱大国,没有一个专门的办事机构来协助总理、副总理们处理日常事务,显然是不行了。为此中央决定建立总理办公室。总理办公室直属于政务院(1954年9月改为国务院),最早由政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分管,齐燕铭兼总理办公室主任,副主任是李琦,下设综合组、财经组、外事组、秘书组、行政组。服务的对象是周恩来总理和其他几位副总理以及秘书长。总理办公室人数最多的时候是1956年,达到近20人。

随着政府有效运行机制的建立和行政体制逐渐理顺,为适应国家政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1957年底,总理办公室进行了第一次大的精简,近一半的人员调出去支援各条战线,留下包括正副主任在内的9位秘书,分别负责联系国务院各口的工作。从这时起,总理办公室不再分管其他副总理的日常事务,专为周恩来总理服务。

这次精简后,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不再兼任总理办公室主任。他卸任前,为周恩来物色了一个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童小鹏。童小鹏被调任总理办公室主任,具备了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周恩来对他比较熟悉,二是他对统战工作比较熟悉。这样,1958年4月,总理

办公室的人员各就各位:主任负责总理办公室的全面工作,副主任(许明)协助主任工作,其他几位秘书分别负责联系外交、政法、军事、经济、财政、文教、统战等方面的工作。

周恩来与秘书们在工作上都是直线联系。由于一国总理的日理万机,周恩来的秘书们也是最忙的。每天总理办公室收到各部门、地方的请示报告、文件资料、情况简报、统计报表等不计其数。如果是特急件,秘书们会立即报送周恩来。其它件,秘书们第一步先为总理充当“过滤器”,按轻重缓急分门别类,有的写出摘要,有的拟出提纲,等待周恩来夜里回办公室审阅和批示。大多数时候,周恩来白天忙于参加或主持各种会议,接待外宾或约请有关方面人士谈工作,会见各种专业会议的代表,还经常找机会去看望与我党长期合作共事的党外人士。一般到了晚上九、十点钟以后,他才能批阅那些堆放在办公桌上的大量文件。

作为一国之总理,周恩来也是总理办公室的“神经中枢”,千头万绪的工作,最后都要归到他那里。因此他除了凌晨几个小时的睡眠以外,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许多时候甚至不分昼夜地工作。他要面对十几个秘书,处理方方面面的工作。但在周恩来细密、踏实、有条不紊的工作作风影响下,秘书们将交到自己手里的繁多事项,及时、快速、高效地办理,做到事事有回话,件件能落实,从不疏忽,从不贻误。

尽管秘书们都是各部门抽调来的精英,但由于政府工作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周恩来对秘书们要求很严。从办公室主任到每位秘书,他经常叮

嘱大家要熟悉全局工作,不要“铁路警察各管一段”。1959年12月5日深夜,周恩来在阅完一封来信后,在信封背面批了这样几句话给办公室主任童小鹏:

童主任:

我批办各件,请你于每日在家时上午十二时前,晚间十一时左右来办公室看一次,以便熟悉全局,利于检查、联系和协调各口的工作。

此件请给各秘书同志一看,并对值班干事规定几条守则。

周恩来
十二·五

周恩来的秘书深深感到,在总理办公室工作,既要熟悉自己负责联系的某些部门的工作,懂得相关的专业知识;又要熟悉全局工作,学会做多面手。总理办公室既是国务院的一个“中枢神经系统”,也是个极为锻炼人的地方。

进入1964年下半年,随着国民经济调整的深入,如何进一步加大调整的力度,使各方面工作真正适应新的发展要求?从改革的意义上进一步精简机构的任务再一次提到日程上来。主持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周恩来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多的思考。经过几年的调整和精简,国务院的机构和部门大都按要求完成了精简人员和精简机构的任务,但仍有一些部门和省市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精简工作越做越难。为此,周恩来绞尽脑汁。一方面,他在各种场合不断地强调要搞“机关革命化”,对待调整问题“要有革命思想”;另一方面,他甚至又一次动了从自己身边减人的念头——第二次精简总理办公室。这两种考虑,是取消总理办公室的重要动因。

借制订国民经

济第三个五年计划之机,从计划工作入手,周恩来不断强调“革命化”的思想。

1964年夏天,中共中央决定趁在北戴河办公、休养之机,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商议制订来年度计划、三五计划和长期规划等问题。会前,周恩来于7月29日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就计划问题提出了六点意见,核心思想是传达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意思:“要有革命思想”。

从计划问题想到体制问题,由此想到庞大的体制带来的官僚主义现象,对此,周恩来忧心忡忡。他强烈地感觉到,不进一步改革体制,对庞大的机构进行精简,官僚主义发展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遏制。

这年的全国计划会议集中讨论了计划工作如何革命化的问题。会议承认,计划工作的主要错误是教条主义、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会议提出了彻底改革我国计划工作及其方法的十几条意见,还讨论通过了1965年计划纲要草案。

在这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将自己对官僚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工作方式的不满,明显地表露出来。他将自己对计划工作的不满,又扩展到对整个计委机构的不满。由此逐渐产生了改组甚至取消国家计委、另立机构的念头。国民经济调整后期,精简机构,仍是中央决策层考虑的一个重大



周恩来总理办公和居住的中南海西花厅外景

问题。

毛泽东在思考进入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对机构进行改革的意图，周恩来是体会得最深的。周恩来意识到，在毛泽东眼中，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许多部门都不适应“机关革命化”的要求，由于需要另立或改组的，总理办公室家计委，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是支持毛泽东的想法的。周恩来考虑，机关革命化的问题，首先要从国务院各部门抓起，而抓国务院系统的精简，首先又要从自己身边开始。在“机关革命化”呼声的大背景下，周恩来开始酝酿在国务院机构中取消总理办公室这一建制的事。

1964年12月20日至1965年1月5日，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周恩来第三次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12月21日至1965年1月4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决定周恩来继任国务院总理。会议期间，周恩来也强调了机关革命化的问题。

但要取消长期以来运作有效的总理办公室这一机构，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正在这个时候，从毛泽东那里吹来了一阵“东风”。

一次，毛泽东在与周恩来谈话时，半开玩笑地说：“你留那么多秘书干什么，让秘书牵着鼻

子走！”

这句话的本意，带有体贴周恩来辛劳的意恩。但周恩来有意将这句传了出去，目的是为机构精简作铺垫。然而，此话传出，却产生了各种想法和猜测。

毛泽东说这句话，是由一位中央领导的两个秘书在工作中出了差错引起的。周恩来的经济秘书李岩曾回忆过当时从外地回到西花厅时听到的情况。他回来后才知，当时一位领导同志的两个秘书在外事工作上出了点差错，由于他们的失误，耽误了一件大事。这事反映到主席那里去了。主席不高兴，就说了一句：“秘书太多会误事。”

总理一听这话就紧张了，他想：“秘书最多的当然是我这里了。”他果断地决定撤销办公室

周恩来的秘书马列有这么一段回忆：

总理作为这么一个大国的总管家，要管外交、国防、工交、财贸等几十个部门。我们每个秘书联系几个部委，重要的情况随时向总理汇报，以便于总理分别轻重缓急处理各项政务。

至于说总理让秘书牵着鼻子走，根本没有的事。总理尊重秘书，常常就一些问题征询他们的意见和看法，但从来不允许秘书擅自作主……

与总理办公室其他秘书一样，马列也是经过精心挑选后抽调来的。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首次访问苏联，期间与斯大林商定，要请周恩来前去苏联签订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月，周恩来起程前往莫斯科，带去了一个庞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包括东北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当



中南海西花厅外景

时的马列正在旅大区党委做外事工作,由于旅大区党委书记欧阳钦被选中作为周恩来的主要随行人员之一,欧阳钦又选中马列作为随行的工作人员。从此,马列与周恩来有了接触,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1950年10月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之前,马列奉命调到北京,正式进入国务院总理办公室担任秘书工作。当时的周恩来总理同时兼任外交部长,在抗美援朝的军事行动期间还实际担当“总后勤部长”和“总参谋长”的角色。马列到总理办公室,主要是担任外事秘书,负责联系苏联、东欧事务。在总理办公室多年,马列深知这一机构的重要性和作用,也深知毛泽东对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方面的信任。自马列到总理办公室后,他始终感觉这一机构处在忙碌和高效运转中。

对总理办公室的忙,马列还有一段回忆:

整个抗美援朝期间,总理那个忙,那个累就不用说了。从朝鲜前线来的所有电报都要先送总理处理,一些重大问题都是总理先提出意见,再报请主席批准。很多电报都是总理亲自起草或由总理口授的。那时总参谋长是徐帅,徐帅生病了,由聂帅代理总长。重要的作战部署都是在总理的主持之下决定的。开城谈判坐在谈判桌前的是南日和柴成文,幕后是李克农和乔冠华。在什么问题上据理力争,在什么问题上可以妥协让步,都是按着总理的指示进行的。总理经常要和第一线通电话,了解最新情况,作出最新指示。那时的电话线路不好,又没增音设备,听起来比蚊子声还小。总理扯破嗓子喊,每次打完电话都累得一身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总理是抗美援朝战争的总后勤部长、总参谋长和指导谈判的决策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之花是朝中将士的鲜血浇开的,同时也是总理心血的结晶。由于总理日夜操劳,到1951年5月份就高烧不止,累倒了。主席批准休息两个月。总理去了大连,在整个休息期间,一直关心着前线的战况,只休息一个月就回北京了。

周恩来的日理万机,是由他主管的工作面和他的细致的工作作风决定的。而他的工作习惯,又是由长期的战争环境和毛泽东的起居习惯决定的。毛泽东习惯夜间工作,上午休息。周恩来的工作习惯也就除了上午休息几个小时外,几乎昼夜都在工作,从白天一直到第二天凌晨。长时间

的超负荷运转,使他常常是在批阅文件时,由于太困而将手中的毛笔戳到文件上。实在太困的时候,他就用热毛巾擦一把脸,或者抹一点清凉油解一下困。为了保证工作的正常进行,他的秘书也就随时都要保持工作的状态。周恩来认为,他是一国总理,每天国内外发生的大事,都应该最先知道,所以他曾对身边的秘书提出这样的要求:一、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情,要立即报告;二、毛泽东主席找他时,要立即报告。遇到这样的情况,不管他是在主持会议,还是在接见外宾,都要立即写条子递进去;如果在睡觉,哪怕刚刚吃了安眠药,也要立即叫醒他。

1956年夏天从国家计委调到总理办公室担任经济秘书的李岩,对周恩来的“日理万机”也深有感触。他后来回忆:

调到总理办公室后,立即感到工作紧张繁忙的压力。总理是中央常委、军委副主席、政协主席。所以党和国家机关、人大、政协、群众团体,总之,党政军民学,凡设有工作机构的,办公室都有秘书分别与它们联系工作。秘书虽然不少,可每个人的工作量都不小。

1957年总理办公室压缩以后,剩下的8个秘书要分工联系的部门更多,仅经济部门就有14个之多。

为及时处置紧急公务和应付各种突发事件,除总理办公室建立了24小时值班制度外,周恩来还要求各部委也建立了24小时的值班制度。

李岩回忆道:

中央领导同志工作之忙,之辛苦,当时也许在红墙之外鲜为人知,当然总理是最忙的一位。由于他管的事多面广,所以办公室每天收到的多方送来的请示报告、文件资料、统计报表、情况简报等,多得不可胜数。分到每位秘书手中的都是厚厚的一摞。

周恩来是怎样使用这些能干的秘书们的呢?他对每位秘书的工作都是直线联系的,繁多的交办事项从不贻误。对交待给每位秘书的工作,只要事情未了,周恩来到时间会催问或提醒他们。为方便起见,每位秘书的办公室都配有电铃,遇有交办事项,周恩来按电铃招呼他们过去。由于周恩来白天外出工作较多,所以秘书们将当天来的文件和需要口头汇报的事项随时准备着,这就

使得周恩来无时无刻不在工作状态上。更有甚者,周恩来在用餐、洗澡和上卫生间时,都常常要处理工作上的问题。秘书多,也就意味着工作多,往往是周恩来刚刚进门,秘书们就排着队将文件送给周恩来批阅或向他汇报刚刚发生的国内外大事。

因为对国内外情况比较熟悉,所以周恩来作普通的会议报告时,一般不用秘书给他准备讲话稿,而是由自己事先拟好几条提纲就行了。半天的报告,他往往是只在小纸片上写上几句就够了。

尽管工作极度繁忙,涉及面广,工作时间长,使得周恩来多多需要一些秘书帮助工作,但总理办公室的工作效率和质量是很高的。这一点也曾得到过毛泽东的称赞。

总理办公室的建制和人数,就是基于这样一种极度繁忙的情况而建立和确定的。

应该说,取消总理办公室这样的建制,首先是周恩来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以身作则的结果。在调整取得进展,需要进一步实现“机关革命化”的关口,周恩来心中非常清楚,只有从身边开刀,才有利于动其他难动的机构,这就决定了总理办公室必须进行第二次精简。

为使大家心理上有所准备,周恩来早在1964年6月18日就召集办公室工作人员开会,商议工作安排的问题。他首先鼓励大家深入基层,去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提出了几条要求:参加劳动,访贫问苦,摸清情况,提高认识,坚持原则,解决问题,锻炼党性,增强体质,不急不怠,有始有终。

到了年底,在筹备召开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过程中,国务院机构改革的方案逐渐明朗,对总理办公室这一机构的去留问题,周恩来也下定了最后决心。随后,他让办公室负责人通知各位秘书开会准备善后事项。当时办公室副主任许明通知了在京外工作的秘书。正在山西搞“四清”的经济秘书李岩后来回忆道:

当时,我正在外地搞“四清”,工作已快结束了。一天接到许明的一封信,她信上说:“总理决定把办公室撤销,具体的信上不好说,回来你就知道了。”

秘书们都感觉到,总理办公室的撤销,速度太快了。

军事方面的秘书周家鼎当时也在农村搞“四清”。为了不影响军事工作,周家鼎下农村期间,中央军委曾从作战部为周恩来选了王亚志来作军事秘书。王亚志回忆道:

我是1964年7、8月间去的,到1965年2月就离开了,仅仅半年,同总理也没有朝夕相处的经历。我运气不好,刚去总理办公室,就赶上办公室裁人。……可以说,我还没有进入角色就退下来了,只干了些日常的事务。

1964年12月15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讨论了周恩来将向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稿。

周恩来在会上还介绍了《政府工作报告》的第五部分,这部分的题目叫《机关革命化》。单列这样一个题目,是“政府工作报告”中少有的。他借题发挥所讲的几句话,使与会的人感觉到了他内心的矛盾:

人少是好事,人多是坏事。主席经常跟我讲,你那个办公室搞那么多秘书干什么?我现在想通了要跟周荣鑫(作者注:周荣鑫当时任国务院秘书长)合并。合并不是假的,原来的那些秘书有的退回外交部,有的退回总参。我现在有12个人,六、七个人下乡,还剩一半,还不行,要作个彻底革命派,把那个办公室不要了。

可以说,这是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宣布总理办公室要取消的决定。

1月4日闭幕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有关的决议,总理办公室便从此在国务院的建制中完全取消了。

在贯彻中央精神方面,周恩来历来是雷厉风行的。1月13日、15日、16日,周恩来多次约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讨论各口机关的革命化问题。为给大家作表率,1月15日这天,他约周荣鑫、童小鹏、许明谈话,具体落实总理办公室撤销一事。2月2日,他正式召集办公室全体人员开会,除宣布办公室解散的决定外,布置了解散后的工作。总理办公室这一重要机构,便这样干净利索地撤销了。

总理办公室取消后,在周恩来办公和居住的中南海西花厅内,只设了一个总理值班室,留下来的,是仅有的一两个秘书。

(责任编辑 吴 思)

彭老总太原前线

● 吴 象

1948年秋,作为《华北人民日报》记者,我奉派到太原前线采访。攻城前夕,在前线指挥部突然见到了彭德怀将军。

太原是华北最后解放的一座孤城,迟于天津、北平,比解放南京还迟半天。其实,解放太原的战役从1948年10月就开始了,因为全国战局急剧变化,太原前线于11月间奉命暂停攻击,这一拖拖到1949年4月下旬才发起总攻,百万雄师已经渡江南下了。指挥最后阶段攻城作战的,不是当时病重的徐向前将军,而是路过太原的彭德怀将军,他在前线指挥部出人意料的发人深思的几次讲话,充分体现了这位彭大将军独特的风骨。

解放太原的第一个战役是攻克东山。

太原位于晋中盆地北缘,太行、吕梁两山东西对望。西山之下有十余里开阔地带,距城三里处为汾河,水深不能徒涉。而东山则可居高临下,拱卫城东,侧击城南城北,故东山得失系攻守太原主要关键。其最高峰在城东50里之罕山,整个山区南北宽约30里,东西长达60余里。日本投降时,阎锡山即在此大规模筑堡设防。后经上党、汾孝、运城、正太、临汾诸战役,阎锡山每失败一次即增修一次,经营历三年之久。晋中战役后,阎锡山在东山已最后完成纵深60里之永久性坚固设防工事,钢筋水泥堡星罗棋布,其前沿直抵罕山地区。每个山头有一单独据点,有三至十个小型水泥堡围于外壕劈坡(即将山之左侧劈成高一丈至二丈绝壁),各山头之间又可交叉射击,使每一山沟小道均在严密火网的封锁之下。城东30里的孟家井,有汽车路连接罕山与太原城,东侧山神庙有炮兵阵地,周围碉堡林立,便于屯兵、出击及增援。罕山西麓一线高地,则为太原近郊



彭德怀

内防线。由城东北之牛驼寨、北黄家坟,城东之小窖头、淖马山,城东南之山头、双塔寺诸要塞环成,故又称要塞堡垒线,距城仅五里至十里。阎锡山对此一线工事之构筑自夸为华北第一,整日吹嘘堡垒神话,谓其3000碉堡足抵50万精兵。

1948年夏晋中大捷后,追击的解放军曾一度出现在城南武宿机场附近,满城惊慌,着实风

声鹤唳了几天。但是惊魂甫定,阎锡山这位迷信“工事”的土皇帝又神气起来了,传话说东山是谁也夺不走的,太原这座碉堡城是谁也攻不破的。

太原前线我军的作战部队,基本力量包括十八兵团的三个纵队,一野的一个纵队及晋中军区部队,统一由十八兵团司令员徐向前指挥。从6月中旬到7月下旬在晋中歼灭阎军10万余人,毙、伤、俘阎军高级将领82名,总司令赵承绶和副司令元泉福双双被捉,解放县城14座,从四面包围了太原孤城。全军上下乘大捷之威,摩拳擦掌,决心最后攻克太原。

10月19日夜,夺取东山之战打响。我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南北钳击,一举插进东山核心,连克孟家井西北之榆林坪,以西之大窑头、大小北尖,西南之石咀子、麻地沟等险要地点,痛击猬集罕山之敌。阎锡山的“雪耻奋斗团”千余人被我军团团包围,无路可逃,19日在团长李佩膺率领下,集体投降。

扫清东山外围的阎军后,东山战役进入了关键阶段,争夺牛驼寨、小寨头、淖马、山头四大要塞。各个要塞都有所谓“平面四层,立体四层”的碉堡群构成密集火网,每个阵地、碉堡、壕沟、火力点,无不经过逐步激战反复争夺,确实是易守难攻,无法接近。攻坚战、争夺战一直处于胶着状态,反复拉锯。对峙到26日,我军向牛驼寨、小寨头、淖马、小山头四处同时发起总攻。阎锡山严令官兵据险顽抗,不准后退一步,违者当场处决。仅淖马主阵地一处,遭处决者就有四十师三团团团长刘永旺、八总队一营营长赵典章、三营营长房宗德等官兵数十人。但这一切均无济于事,阎锡山的所有反扑部队均遭到极沉重的歼灭性的打击。11月1日,牛驼寨各个碉堡全为我军逐一攻克,只剩下住着十总队司令部的庙碉,整个东山已全部为我占领,太原危城直接暴露于我军强大的攻击之前。阎锡山的防御体系及其堡垒神话,已被彻底粉碎。作为太原屏障的东山,已一变而为我军攻城最好的出发地了。但是应当承认,东山之役打得很艰苦、很惨烈。东山脚下的太原城看来已成瓮中之鳖,垂手可得,却仍然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正当太原东山酣战之际,东北战场传来特大

捷报:9月中旬发起的辽沈战役,已于11月2日胜利结束,歼敌47万,解放了东北全境。第四野战军奉令不顾疲劳,日夜兼程,隐蔽入关,配合华北野战军将张家口至平、津一线蒋军傅作义部“困而不打”、“隔而不围”。11月6日,紧接着淮海战役打响了。全国战局戏剧性地急剧变化,敌军数量上也转为劣势,国民党军事、政治、经济均濒临彻底崩溃。党中央、毛主席运筹帷幄,精心组织、指挥对全国性胜利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为配合全国战局发展的需要,中央军委于11月16日电令太原前线暂停总攻,围城待命。

兵团总部、政治部人员大部分从东山第一线撤下,在榆次城附近一些村子里驻扎,记者团的人也集中回来休整学习。这时,准备接管太原的干部正陆续奉命到达,分组学习入城接管有关政策、文件、守则,像是个大训练班、大学校,有时也集中起来听负责同志做形势报告。淮海战役经过两个月零三天的激战,歼敌55万人,天津、北平先于太原得到解放,和平谈判正在北平进行,全国胜利日益迫近,人们情绪高涨,斗志昂扬,着急地盼望着早日下达命令,赶快打进太原去。

等待到3月中旬,才终于有了消息。华北的十九兵团、二十兵团及四野的第一炮兵师奉命来到附近,参加总攻太原。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总前委,书记为徐向前,副书记为罗瑞卿、周士第,委员为陈漫远、杨得志、杨成武、胡耀邦、李天焕,并以十八兵团司令部、政治部为太原前线司令部、政治部,由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统一领导攻城作战。于是部队又上东山进入阵地,大军云集,战云密布。

4月5日,总前委在大峪口村召开扩大会议,各兵团都参加了。会议前一段是传达刚刚结束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接管组的主要领导人也来参加了;共约一百六七十人,会场设在一座古庙的大殿里,外面还搭了个棚子。袁毓明和我被指定为作记录的工作人员,列席了会议的全过程。徐向前没有来,主席台上坐在最明显位置的是彭德怀。会议先由罗瑞卿作传达。1938年抗大奉党中央之命挺进敌后,在延安三十里铺会师东征那次,他是抗大教育长,和滕代远一起来给我们作动员报告。他身材长而略瘦,显得威严、精神抖擞,讲话极富鼓动性,抗大学生特别喜欢听他

讲演。可惜以后再没有见过。那次是远距离,这次近在咫尺,不仅听得清楚,连手势、眼神、表情都看得很清楚。他首先传达了毛主席对形势的分析,特别讲到那份“围而不打”、“隔而不围”的电报,电报最后还加了一句“务请切记为要”。他说:“当时兵团几位领导都很纳闷,觉得我们都是多年带兵打仗的人了,难道连这一点都不懂,值得这么嘱咐么?事后才理解‘不打’、‘不围’这四个字真是妙不可言,如果领会不深、执行不严,战略意图稍有暴露,傅作义就可能下决心逃跑,战役也许是另一个样子了。”

这次传达有地方干部参加,关于入城后经济政策问题讲得十分详细,强调了现代的工商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只占百分之十,百分之九十左右还是同古代没有多少差别的农业、手工业,这种现实状况短期内不可能改变,应成为党的一切政策的根本出发点。罗瑞卿强调说:“不是某些政策,而是一切政策;不是一般的出发点,而是根本的出发点。”他讲了整整半天,内容丰富,生动深刻。讲到精彩处,连彭老总也不免点头首肯。会场一片肃静,都听得入神了。然而,当时我最大惑不解的,却是彭老总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呢?

彭德怀将军威名赫赫,是八路军的副总司令,人们都称他为彭老总或彭总。1939年春抗大一分校挺进太行山敌后,驻于襄垣、屯留、潞城交界的一些村庄里。八路军总部的首长朱德、彭德怀、左权、傅钟、陆定一轮流每周来讲一次大课,每次都成为全校师生的盛大节日。我就是在这里初次见到彭老总的。他身材魁梧,声若洪钟。他站着讲话,我们坐在自己的背包上听,在膝盖上记笔记,尽管当时根本没有扩音器,他却讲得清清楚楚,我们也听得明明白白,偌大的会场静悄悄的,充满他激昂宏亮的声音。五六千名革命青年的心被这声音所吸引所凝聚,久久难以平静。

此后没有再见到过彭老总。但是不断能听到关于他的消息。1940年冬百团大战后期的关家崞战斗,他一条腿蹬在土坎上用望远镜指挥作战的照片,后来被木刻艺术家刻印成版画,在太行山区流传颇广。1943年太行山区大旱,很迟很迟才下了点雨,全区所有机关部队、团体都把篮球场挖了播种秋菜度荒,这件事是彭老总最先倡议,并最先在总部篮球场上实行。解放战争以来,

彭老总转战陕北,保卫延安,与多四倍的敌人相周旋,始终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一次又一次歼灭敌人。胡宗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占领了延安空城,空欢喜了没有几天,又不得不抱头鼠窜而逃,西北战场捷报频传。彭总怎么突然会在这里出现呢?

事后我才从兵团宣传部长任白戈那里得知,不久前彭老总从西北前线到河北石家庄附近的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会后毛泽东让他回程顺路到太原前线看看,等太原战役结束再带部队回西北。他到达太原前线,先到榆次峪壁村去看望徐向前。徐向前因带病连续指挥作战,过度疲劳,肋膜两次出水,胸背疼痛,身体虚弱。东山战役时,他是躺着担架上前线的,11月初才回到峪壁村治疗休息。他们会见时,徐向彭总介绍了攻打太原的部署和准备情况,并恳切地请他留下指挥攻城,拿下太原后再走。彭总表示同意。总前委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后,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但不对外宣布,也不向下传达。一切作战命令仍以徐向前的名义下达。

会议的第二阶段是攻城部署,由周士第主讲,作战任务由参谋长陈漫远下达。周士第是北伐时期叶挺独立团的副团长,抗战时期任贺龙一二〇师的副师长,是一位老资格,待人非常和善,没有架子,讲话有点大大咧咧,好打手势。他不时扭过头对彭德怀说:“彭总,你说是这样吗?”“彭总,你说呢!”可以看出,他同彭德怀很熟悉,说话也是很随便的。一向严肃的彭德怀则微笑点头,并不插话,也没有讲话,大概彭总的意见在小范围开会时早已讲过了。会上宣布的作战方案是:二十兵团附一野七军的一个师,四野炮一师一部,由城北及城西北总攻突破;十九兵团附晋中军区三个独立旅及四野炮一师一部,由城西城西南攻击,得手后由首义门以东攻城;十八兵团附一野七军主力及四野炮一师一部,分组为两个集团,第六军、第七军为左集团,由大东门以北攻城;第六十二军、第六十一军为右集团,由大东门以南攻城。

这天晚上有晚会,演出前彭总就到了,和先来的一些熟人握手打招呼。有人说:“彭总,人家都想听你讲话,怎么你不讲讲呢?”好几个人都在响应,这时人来得多了,大家鼓起掌来,欢迎彭

总讲话。彭德怀走到第一排前边，扫视了会场一下，就开口讲起来了。他说：“本来想打完太原再同你们开会讲的，既然你们催着我讲，我就先给你们捎个信。我这次是专门到太原来的，打完太原，就要带你们几个兵团去参加第一野战军的序列，去解放大西北！谁也不要怕没有仗打！”一句话引起了全场热烈的掌声。他突然话锋一转，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是指挥员，是领导，是首长，到处受尊敬，看戏坐前排，你们知道自己是代表谁的吗？”他停下来，环视大家，接着才又说：“你们成为指挥员，因为你们作战英勇，有功，有突出的贡献。但是你们想过没有？战争中还有许多更英勇、更积极的分子，最积极的分子，最优秀的分子，最有贡献的分子，他们都不在了，牺牲了。没有他们，就没有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也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我们高兴的时候，受表扬、受尊敬的时候，一定不能忘记他们，时刻想着我们是他们的代表，是代表他们的。这样我们才能英勇无敌，无往不胜，否则就是忘了本，就不配做革命的战士！”这些话使会场一片肃静，许多人为之动容，终于爆发出一阵极为热烈的掌声。袁毓明悄悄对我说：“言简意赅，永生难忘。”

会议结束后兵团干部纷纷赶回部队，彭总也带领参谋人员上了东山前沿阵地。彭总详细观察了敌人的防御工事，又作了一些调查、了解，认为战士心理上有一个问题要解决，于是便召集一些指挥员和政工人员谈话。他说：“攻城作战，敌人在碉堡里，我们在碉堡外，战士们总是感到敌人打死我们容易，我们打死敌人难，其实并不完全是这么回事。一个兵拿起枪来打敌人，要有一定的场地和一定的角度，这样才能使他的标尺、准星和目标达成一条直线。敌人的士兵在碉堡里，里面那么窄小，碉堡墙厚，限制了射孔的角度，他能瞄准的视野就只有很有限的一小块。他要打外面的人，不见得那么容易。”各级指挥员和政工人员把彭总这个指示传达下去以后，战士们都觉得茅塞顿开，胜利的信心更强了。

接着，我还参加了彭总召开的一个座谈会。担负突击任务的各级指挥员，主攻团的班、排、连长也来了。彭总的询问看似随便却很详细，很重视关键问题的细节，这方面问得特别多，不时提醒点什么。最后还有段讲话。他说：“打仗免不了

要死人，但有时候让一个人死也不那么容易。枪林弹雨，说得很可怕，其实只要指挥正确，战术动作恰当，会判断、会处理，子弹就不敢随便欺负你。我打过不少仗，在枪林弹雨中出入过好多次，就没有负过伤。有一次，一颗飞弹打进了我的肚皮，但半截露在外边，原来距离远，成了强弩之末，没有什么劲了，没有打穿我的肚皮，倒被我的肚皮夹住了。我用手一拨，肚皮又鼓起来了。”说得哄堂大笑。彭总的幽默渗透着战斗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给人印象至深。

总攻前夕，集中炮击摧毁了双塔寺据点，俘虏了阎军军长曾卓之，彭总又亲自找曾谈话，详细询问阎军火力部署情况，我在旁担任记录。曾卓之对彭总十分尊敬，表示一定尽自己所知如实相告。彭总一面听他的答话，一面观看地图，在上面画记号。事后他又找炮兵指挥员谈话。他说我军从前攻城，最早是用云梯、跳板，后来用坑道爆破，这回要用炮轰开缺口，还是第一次。你们要认真对待，充分准备。要知道城墙是用夯土造成的，这么几十门、成百门炮打一个口子，而那炮弹打过后，口子上就是一片尘雾，什么也看不见了，你再打去的炮弹是打到口子上去了？还是打飞了？飞了，那就不能靠目测校正，要靠你们计算来校正。那要靠功夫，千万马虎不得。

这次攻城我们不仅在火力、兵力、士气占绝对优势，而且准备之充分，也是前所未有的，几乎每一门炮都明确自己轰击、摧毁的具体目标，全军蓄势待发，只等下总攻的命令了。

1949年4月24日清晨五时半，总攻开始，1300门大炮从四面八方同时齐发。顷刻间浓烟升起，遮盖天日，清晨的阳光也为之暗淡，离城墙50米就看不见城头。由于目标是炮手们事前瞄准好的，破城射击、压制射击、阻拦射击的炮群同时进行，炮弹几乎像机关枪般的密集连发，对方完全失去了还手的能力。战士们立起身子，看着弹着点议论：这回打仗，敌人有“三老实”：天上的飞机老实，我们的高射炮一打，它掉头就跑；地上的大炮老实，我们的炮一响，它就成了哑巴了；敌人自己也老实，躲在工事里挨打，不敢出来反扑。

原来规定炮击三个小时，到八点半才结束。但是战士们再三请求，敌人已经哑巴了，还傻等什么？七点半钟，北面、南面的兄弟兵团已经突击

登城，东面的部队闻讯着急起来，一个突破口刚爆破开，第一名登城突击手刘永昌就爬了上去，紧接着韩治国、金富彬、高来风也登了上去，四名登城英雄迎接汇合部队占领了大东门。躲在地洞里侧击突破口的敌人也被缴了械，保证了登城部队的安全。这时，我军强大兵团，从东南北三面的12个突破口登上城墙，像怒潮决堤般涌进了太原城，势不可挡地攻击前进。

我是10时左右从小东门入城的，市中心的战斗尚没有结束，但枪声越来越稀疏了。等我赶到鼓楼，孙楚、王靖国等十几名高级军政人员已从俘虏中清点出来，集中到柳巷正大饭店的院子里，狼狈地席地而坐，听胡耀邦给他们训话。

彭总呢？进太原后再也没有看到。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来也突然去也突然，大概已经到西北前线去了。

十年后，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彭老总因上书得祸，受到批判，后来竟成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头目，为此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斗争。消息传来，我同许多人一样，最初是震惊，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跟着斗争的深入神经逐渐麻木，终于接受流行的观点。但有一次我心里却动了一下。那次是厅局级以上干部的批判会，还把左权县麻田村的党支部书记也请来了，可能因为战争期间，彭老总在那里住的时间多，“流毒”较深吧。轮到这位支部书记发言时，他竟讲了一些不上纲、不上线的琐事，不是彭总教小孩认字，就是彭总帮老乡垒坝，一句一个彭总怪亲切的。有人急了，严词质问：“你到底是批判揭发，还是给他评功摆好？难道你不知道彭德怀是野心家、伪君子吗？”这位职务不高，文化也不高的党支部书记却不着急，只是不慌不忙地回答：“彭总怎么会是野心家、伪君子呢？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呢？一定是你们弄错了！”不



1949年4月24日解放太原

管会上如何打态度，他一直死咬住“你们弄错了”这句话不放。据说后来山西省委并没有给他戴什么帽子，认为他是基层同志，思想一下转不过弯，应该多加教育，等待他觉悟，竟不了了之。这位基层党支部书记在大是大非面前毫无疑惑、毫无畏惧，他不善于慷慨陈词，却坚持了自己应该坚持的，这不能不使我感到惭愧，感到不安。据说彭总后来曾痛苦地承认过强加给他的莫须有的罪名，原因不是别的，而是再三思考一些老战友的劝告，为了维护全党团结的大局。但是有人对此仍不满足，还要给他罪上加罪，彭德怀无法再忍耐了，1962年初，他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打电话，说他要给中央和毛主席写信，要求审查他的“里通外国”问题，“查出来，就把我的头砍掉，挂在天安门上示众，我毫无怨言。查不出，我倒要问问你们，为什么……”那位小小的支部书记没有彭大将军这么大的火气，他们的心却是完全相通的。

又20年后，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擦亮了人民的眼睛，被颠倒了的是非终于再颠倒过来，彭老总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恢复了他应得到的尊严。每想到彭老总往往不能不联带想到这位党支部书记，内心里感到惭愧、感到不安。更可惜的是，我竟一直没记清楚他的姓名

（责任编辑 程 度）

陈伯钧毛泽东的将帅情

● 左玉河

毛泽东说话幽默风趣，陈伯钧生性活泼诙谐。毛泽东称赞陈伯钧为“红军干才”，陈伯钧则昵称毛泽东为“老毛”、“大帅”。毛泽东与陈伯钧在戎马倥偬的革命战争年代，结下一段深厚的“将帅情”。

生死与共初结井冈情

陈伯钧，1910年11月26日生于四川达县河市坝村。1926年底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入第一大队第二队，与罗瑞卿、程子华等同学，恽代英为军校总教官。在这里，陈伯钧不仅受到了严格的军事训练，而且接受了严肃的政治教育，时任中共中央委员的毛泽东曾到校演讲农民问题，这是陈伯钧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尽管这位刚满16岁的小学员并没有引起毛的注意，但在陈伯钧的心灵中，已经初步有了“毛委员”的印象。

1927年5月17日，夏斗寅在宜昌叛变，率部进袭武汉。武汉军校学生奉令编入中央独立师，陈伯钧所在的一大队编为第一团，在叶挺指挥下很快击溃了叛军。陈伯钧在平叛作战中吃苦耐劳，作战勇敢，立即引起了中共地下党的注意。加以他学习用功，训练刻苦，很快便经熊修武介绍，在咸宁前线被接收为中共党员。1927年8月2日，陈伯钧随教导团东下参加南昌起义。因起义提前，教导团在九江被张发奎缴械，陈伯钧带领8位同志化装经瑞昌到高安，到二十军独立团任团部副官，负责训练新兵。

1927年8月中旬，陈伯钧随独立团经宜丰到达铜鼓，准备参加湘赣边界的秋收暴动。9月10日，负责领导秋收起义的毛泽东，从湖南浏阳脱险来到铜鼓。在肖家祠堂，毛泽东召开了独立

团排以上干部会，陈伯钧再次见到了“毛委员”，并聆听了他的讲话。操着一口四川话的陈伯钧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会后，毛亲切地询问了陈伯钧的年龄、籍贯和经历，陈向毛委员汇报了一个多月来对新兵进行军事政治训练的情况。陈伯钧直率的性格和诙谐的谈吐，给毛泽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根据毛泽东的部署，独立团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陈伯钧任该团第三营第六连第一排排长，随军挺进浏阳白沙镇，击溃一营敌军和当地挨户团，首战告捷。毛泽东称赞陈伯钧等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但在攻打浏阳东门市战斗中，陈所在第三团遭到国民党军袭击，被迫退到文家市。毛泽东把队伍集合起来鼓励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只要我们能够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就能够逐渐取得革命的胜利。”陈伯钧在这关键时刻，没有动摇，跟随毛委员继续南下途中，毛泽东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将师缩编为一个团，陈伯钧虽然患疟疾，仍任三营八连一排排长。

10月3日，陈伯钧随毛泽东来到井冈山下的古城，参加了前委扩大会议，决定联络井冈山上的袁文才、王佐武装。一心要为革命队伍寻找立足之地的毛泽东，派陈伯钧、游雪程、徐彦刚上井冈山，到袁文才部任连、排长，做袁部的改造工作。出发前，毛泽东在水口朱家祠，专门与陈伯钧等促膝谈心，告诫他们：“到那里要好好同人家合作，要搞好关系，听袁营长的话，注意了解当地情况，传播革命种子。”

袁文才部平时分散活动，陈伯钧等到职后，集中在步云山进行军事训练。不久，一直因脚伤未愈的毛泽东，无法随军行动，也来到茅坪养伤。

在这里，毛泽东与陈伯钧进行多次谈话，还到练兵场上检查战士们的军事训练。对此，陈在后来回忆说：“在我们操练空闲的时候，毛委员还开玩笑地对我们说，《封神榜》上有个土行孙，还有个哪吒，他们会入地土遁、腾云驾雾，为什么你们没有那样的本事呀！”陈伯钧自然领会毛委员的意思，苦练“能打能走”的本事。在陈伯钧等人的努力下，袁文才部很快走上正规。

1927年12月，毛泽东的脚伤好转，决定下山。毛亲自点将，让陈伯钧护送自己去茶陵找红军主力。陈立即带领一个班，护送毛泽东、毛泽覃等人出发。他们第一天走了60多里，夜宿茶陵坑口圩，估计当天可以到达茶陵城，陈伯钧就令这个班战士先回井冈山，自己留下与毛泽东、毛泽覃同行。但当走到离县城20多里时，前方传来机枪和步枪声，国民党军队围攻茶陵城，红军主力南撤。毛泽东一行在离城五六里的小村子住下。当晚，毛泽东和陈伯钧值班放哨，以应付紧急情况。此时，陈颇为后悔：过早令警卫班回井冈山，以致身边仅有三条枪，使毛泽东等人处于危险中。

看着神情紧张的陈伯钧，毛泽东神色泰然地吸着烟，思考着问题。他判断情况有变，决定马上追赶部队。南行30多里后，毛泽东一行仍未脱离危险。在匆忙中，毛问陈伯钧：“假若后面敌人追来怎么办？”陈伯钧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同你的警卫员留在后面打掩护，你们只管往前走！”说罢，便提着驳壳枪跑到了队伍的最后。陈伯钧在危难时刻的果敢表现，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天晚上，毛泽东与陈伯钧等人赶到水口，追上了正在休息的红军主力。毛泽东立即召开会议，讨论部队行动方向问题。此时，团长陈浩因对革命前途失望，正准备把部队拉走，投靠国民党方鼎英部，因此会议争论得非常激烈。毛泽东力排众议，命令部队折回井冈山，向宁冈砦市开拔。散会后，毛写了一封信，命令陈伯钧赶回砦市，送交中共永新县委。陈伯钧深知任务重大，不敢怠慢，拖着疲劳的双腿连夜走小路，及时将信送到。随后，毛泽东带着大部队返回砦市。在这里，毛泽东与永新县委召开全体党员大会，果断处理了团长陈浩等企图把部队拖走的事件，使年幼的红军

度过了一场严重危机。

短短几天生死与共的危急考验，毛泽东对陈伯钧不仅异常信任，而且对他的胆识更加了解，因此，在随后成立工农革命军教导队时，毛泽东任命陈伯钧为副队长兼党支部书记，叮嘱他好好读书。红军教导队是后来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的前身，是中国革命军事教育的起点，毛泽东将培养红军干部的重任，交给了陈伯钧这样的年轻军官，说明他对陈是何等的信任。正是因为对教导队有着殷切的期望，毛泽东非常关心教导队的成长，不仅经常抽空给教导队上课，而且听取陈伯钧的汇报，耐心地指导陈伯钧等人的工作。年仅17岁的陈伯钧，在毛泽东的鼓励和培育下，在井冈山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日益成熟起来。

骁勇善战将，坚持运动战

1928年1月，工农革命军攻打遂川时，陈伯钧率教导队负责押运胜利品和俘虏。2月攻打宁冈县城，陈伯钧率领教导队负责攻打西门。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到达宁冈砦市，与毛泽东率领的井冈山部队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第



陈伯钧

四军,陈伯钧任三十一团一营一连连长。5月中旬,赣敌发动第三次“围剿”,陈伯钧率部在毛泽东“声东击西”的战术指导下,进至高陇,打死敌团长刘胡子,占领永新城。随后,他又参加了毛泽东指挥的龙源口战役,三占永新,使井冈山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

7月中旬,中共湖南省委代表错误地把红四军第二十八团和第二十九团调往湘南后,毛泽东指挥第三十一团,用四面游击方式,与赣敌11个团周旋于永新县城附近,进行了长达25天的以少胜多的“永新困敌战”。陈伯钧在永新北乡作战时,被敌人的子弹打穿了左大腿,送回井冈山治伤。8月下旬,湘敌吴尚的一个师乘机进犯井冈山。留在小井养伤的张子清、陈伯钧参加了团长朱云卿、党代表何挺颖主持的干部会议,指挥红军取得了以少胜多的黄洋界保卫战胜利。毛泽东闻讯,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的著名诗篇。

1929年1月,毛泽东决定红四军从井冈山向赣南出击,留彭德怀的红五军坚守根据地。陈伯钧和团长张子清、陈毅安均被留下,协助红五军工作。在红四军出征前夕,毛泽东特地到医院看望他们,谈到深夜,恋恋不舍。1930年初,红六军成立,柯武东任第一纵队纵队长,陈伯钧任参谋长,接着便与毛泽东指挥的红四军一起夺取水南。陈伯钧骁勇善战,率部猛打猛冲,全歼了号称“铁军”的敌唐云山旅。在追击敌军于乌江时,他不幸右腿负重伤。

1930年7月,中共赣南特委决定成立红二十军,任命正在医院治伤的陈伯钧为该军参谋长。10月2日,腿伤刚好的陈伯钧指挥部队发起了第九次攻打吉安的战斗。在螺子山战斗中,陈伯钧再次负伤。

打下吉安后,陈伯钧见到阔别近一年的毛泽东,要求回红四军工作。毛泽东没有答应他的要求,而是让他暂时养伤读书,同时兼任朱德为校长、毛泽东任政委的红军学校第三分校学生总队政委,负责培训红军干部。

1930年12月,陈伯钧被毛泽东、朱德委任为红三军第七师师长,投入第一次反“围剿”战役。按照毛泽东、朱德采取的“诱敌深入”的方针,陈伯钧率部首先在龙冈打响了围歼张辉瓒师

的第一枪,与红四军和红三军一起取得了全歼该师、活捉张辉瓒的重大胜利,受到了毛泽东的嘉奖。战后,陈伯钧参加了毛泽东、朱德主持召开的干部总结会,对毛泽东的运动战思想有了深刻领悟。

1931年5月和7月,陈伯钧接连参加了第二、三次反“围剿”战斗,次年4月,参加了攻占漳州的战役,并升任红十五军军长,成为毛泽东军事战略方针的坚决支持者和执行者。1932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宁都召开扩大会议,对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战术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并免去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随后,“左”倾中央还在部队中撤换了一些领导干部,陈伯钧因忠实执行毛泽东的战略方针,被免去第十五军军长,调到瑞金红军学校学习。

1933年1月8日,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洵湾战斗中,红五军团参谋长赵博生牺牲。中共中央军委决定起用能征善战的陈伯钧,令他再回前方任红五军团参谋长。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嘱咐说:“你是井冈山的老同志、老党员,在军事工作上你要多负责任,打得好打不好都要找你是问!”

早就憋着一股劲的陈伯钧上任后,立即协助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朱瑞,坚持运用毛泽东提倡的运动战,先后取得了黄陂战役、草台岗战役的胜利。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陈伯钧也获得“红星勋章”,以实际行动证明毛泽东“运动战”方针的正确性。

然而,从1933年2月开始,王明、博古为代表的“左”倾中央加大对毛泽东军事政治路线的批判和肃清,他们以反对所谓“罗明路线”为由,撤销了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职务。此后,从地方到军队,层层寻找“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陈伯钧也遭到批判。但深思好学并深得毛泽东运动战精髓的陈伯钧,对李德的军事方针并不赞同。1933年8月31日,他写信给红军总部,陈述自己对当时形势及反“围剿”打法的意见。他的这一做法,立即引来了对他更激烈的批判。9月5日,在红一方面军总部会议上,陈伯钧被扣上“小资产阶级观点及政治之错误认识”,遭到了“严格而又深刻的布尔什维克的无情斗争”。

但耿直的陈伯钧并没有屈服。他从红军总部被批判回到红五军团后,立即起草第二次申诉书,重申8月31日意见书的内容。

陈伯钧的“顽固”态度激怒了“左”倾领导人。10月4日,陈伯钧被免去红五军团参谋长,改任新成立的红十三师师长。尽管如此,一向乐观的陈伯钧并不计较职务的变化,到红十三师后,立即投入了第五次反“围剿”,先后进行了新桥、梅岭、资溪桥等战役。“福建事变”发生后,毛泽东提出与十九路军签订停战协议的主张,陈伯钧极为赞同。他也提出了“善于运用目前有利于我们的形势和力量(即使不革命的力量,只要它能削弱整个统治阶级的力量,我们都应该利用它)”的建议,但并没有被“左”倾中央接受。

勤读多思 成为智勇干才

1934年10月18日,陈伯钧带病率领红十三师开始长征。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获得了对红军的指挥权,陈伯钧也回到五军团担任参谋长。毛泽东率一、三军团北上后,他与朱德等人留在西康,与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1936年7月,陈伯钧调任红六军团军团长,挥师北上。

1936年10月15日,当得知红六军团到达甘南、即将与一方面军会师时,正在陕北的毛泽东挥笔给陈伯钧写了一封短信:“闻你在六军,为红军庆得干才!你的身体好否?同志都想念你我们都好,相见之期不远,愿共努力!”领袖对爱将的关切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1937年4月下旬,陈伯钧作为红二方面军代表出席在延安召开的苏区党代表大会,终于见到了阔别近两年之久的毛泽东。1937年5月3日,毛主席在苏区党代会上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陈伯钧看到了自己尊敬



的“老毛”,并对“老毛”的报告由衷地敬佩。

5月9日,陈伯钧随朱德游清凉山后,来到毛泽东住地。久别重逢,尤其经过长征这样史无前例的重大事件,陈伯钧已经变得沉稳多了。他向毛泽东汇报了滞留红四方面军,及在红六军团的情况。对于陈伯钧与张国焘进行面对面斗争的勇敢事迹,毛泽东也有耳闻。他不仅欣赏这位“红军干才”骁勇善战的文才武略,而且赞赏这位年轻将领在困境中表现出来的政治上的成熟和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的鲜明立场。随后,毛泽东、陈伯钧等参加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尚留下来的部分同志在毛泽东住地前合影留念。(见上图,左三为毛泽东,左二为陈伯钧)

1937年8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改编命令,红六军团编为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陈伯钧为旅长、王震为副旅长。年仅27岁,便成为统领千军万马的少将旅长,尤其不仅肩负军事作战任务,还要处理好与国民党政治上的统战工作,确实显示了毛泽东对陈伯钧的器重和信任。陈伯钧也深知责任重大,暗自告诫自己:“过去我因只负责简单的军事工作,对政治问题深思熟虑不够,缺乏精密考查的功夫,因之工作不够深入,趋于浮躁。个性方面亦欠冷静,今后应加强政治学习。”

9月20日晚,陈伯钧再次与毛泽东谈话,就“目前时局、形势,及关于部队工作问题”向毛泽东汇报并请教。23日,陈伯钧的二哥陈笃斋与四川代表王干青来到延安。晚上,毛泽东请王干青

及陈笃斋吃饭,陈伯钧奉陪。“席间,毛主席谈古论今,确实相当风趣。”深夜,陈伯钧在毛主席处谈工作问题,就军事政治的训育、统一战线及阶级的警觉性、自学等问题,及自己的家庭、家事、一些高级干部的近况等进行了交谈。最后,毛泽东提醒陈伯钧在部队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对陈伯钧寄予厚望。

当陈的二哥离开延安时,毛泽东专门送了300元钱作为旅费,并希望他利用他在四川的社会关系,做些统战工作。10月9日,毛致函陈伯钧说:“你那些兄弟(在国民党的)应用好的态度去影响他们,争取他们的转变。”他在信中写道:“看书没有?不论怎样忙,总看一点书,把些原则问题多考虑考虑,这样来提高自己的,改正自己或有的某些缺点,这是我盼望于你的。”陈伯钧收到信后,觉得毛“为此小事深为劳神”,非常感动,决心将自己多年来养成的读书习惯坚持下来,不断克服自己浮躁的毛病。

年轻气盛 遭训诫管束

10月17日上午,驻军洛川的陈伯钧依依不舍地送走了阔别10年之久的二哥陈笃斋,回来与老朋友王维舟讨论部队开拔的事宜。此时,因天气较寒冷,摩托学校的司机拒绝载三五九旅袁会计到延安领公款,并蛮横无理地吵闹。对于这种无组织纪律的行为素来反感的陈伯钧耐着性子进行劝告,但该司机并没有把陈放在眼里,继续无理取闹。血气方刚的陈伯钧忍无可忍,挥手给了这个司机一个嘴巴。这本来是一件比较普通的小事,陈尽管承认自己的行为“真是鲁莽不该”!但觉得“司机这种既无政治立场,又无组织观念的态度,亦实可恨!”因为部队即将开拔,有许多事宜需要处理,故陈伯钧并没有在意。

然而,就是这样一件“小事”,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很快传到了延安。由于陈伯钧身为八路军主力旅旅长,竟然动手打人,因此被视为“军阀主义”告到中央军委,连毛泽东也知道了。

10月22日,陈伯钧乘车长驱270里,由洛川经甘泉来到延安,到毛泽东处谈话。对于毛泽东与陈伯钧谈话的内容,陈在当天的日记中作了记录:“主要是关于打人的事,自我批评不够;留

守开支较多;对同志团结不够;统一战线中太高,不虚心等。经毛主席指出根源是:由于主观性太强,客观性太差,此其一。其二是由于一切问题尚未完全提到原则性来看,再具体一点说,就是对片面与全面,局部与整部的关系未确实了解并统一起来。这些问题我都接受,均应努力改造之。毛主席谈话完毕,叫我深刻考虑几天,再来详谈。但最使我感觉惭愧的就是,王震同志从来没有把他的这些意见和我当面谈过,十分遗憾。”因为这样一件看似“小事”的“打人事件”,就挨了毛泽东一顿严厉批评,看来似乎有点小题大做。但实际上,除了当时可能有人要搞倒陈伯钧外,毛泽东自有他的想法。

在毛泽东看来,打人尽管是件小事,但“军阀主义”却是当时部队中存在较为严重的现象,抓住陈伯钧这个典型,无疑对克服和肃清部队中的“军阀主义”是有利的。毛泽东素来对自己的部属管束严格、要求甚高,即使出于对部属的爱护,毛泽东也不会轻易放过这个难得的“训诫”机会。毛泽东于是决定通过此事“教训”陈伯钧。

10月25日上午,陈伯钧到中共中央,与总书记张闻天谈话。毛泽东不便谈的一些话,张闻天告知了陈伯钧:指出陈的军阀主义倾向和意识的健康问题。到此时,陈伯钧才明白了事态的严重性。他在不经意间,犯了“军阀主义”和“意识不健康”两条错误。10月26日下午,毛主席再次约陈伯钧谈话,最后决定他留党校学习四个月,再回前方工作。

10月29日下午,毛泽东、张闻天等人 with 陈伯钧谈话,指出陈应该在个人修养、思想和工作方法上多努力。

在毛泽东的严厉“管束”下,陈伯钧被免去三五九旅旅长(由王震继任),调到中央党校学习。

敢于直谏 显忠诚本色

按照毛泽东当初的意思,陈伯钧到中央党校4个月,提高了自身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后,再回前线工作。但党校学习结束后,陈并没有回到前线。1938年6月,毛泽东考虑到陈伯钧的特长,

将他安排到抗日军政大学,担任训练部部长(校长林彪,教育长许光达),肩负起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重任。

陈伯钧曾自我分析说:“我的个性强,遇事锋芒毕露。”他的分析有道理。陈伯钧确实是一位坦率耿直的人,尽管对毛泽东有一种超出常人的崇敬,但在毛泽东面前从来也不感到拘束,总是敢于将自己的意见大胆地向毛泽东陈述。在当时毛泽东与江青恋爱问题上,他的这些个性得到了比较突出的展现。

1938年11月22日,当听说毛泽东与江青谈恋爱的消息后,陈伯钧认为毛不适合与江青结婚。当时,尽管很多人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结婚,但由于种种考虑却没有敢于公开劝阻。一向耿直坦率的陈伯钧,出于对“老毛”的爱护,“当即提笔起草一封关于主席和江青恋爱问题的信给毛主席”。次日,他“将给毛的信重新改写一遍,准备开会时寄去”。11月29日,陈伯钧与罗瑞卿“谈到大帅(毛泽东)的问题、江青的问题”,使他感慨万千。陈劝阻毛泽东的理由,主要是从政治影响上考虑的,而罗所谈,则从江青的为人、毛泽东的生活上着眼。

尽管他大胆地公开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结婚,甚至有点“直率与撞闯”,但陷入爱情漩涡中的毛泽东既没有怪罪这位耿直的部下,也没有听从陈伯钧及其他人的劝告,而是力排众议,与江结婚了。对于毛、江结合素来反对的陈伯钧,并不认为自己的观察有错。不久,江青的任性、孤傲、自私的特性便暴露出来,并经常与毛泽东发生口角。1942年5月22日中午,陈伯钧有事找毛泽东谈话,刚走到窑洞外,便听到“大帅与江青口角,声闻户外。”他感叹道:“呜呼!女人之幻想跋扈一至于此!盖身为统帅,将无数之将,统百万之兵,全国大事举棋若定,而独与一妇人女子竟如此之难应付,吾人于此岂可不更加警惕哉!”

经过一年的学习,陈伯钧在思想方法上有了明显提高,个人修养也进步很大。毛泽东决定放手使用这位“干才”。1938年12月15日,毛泽东与陈伯钧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毛泽东决定调他任抗大二分校校长,开赴华北前线。同时,他仍不忘帮助这位爱将详细分析个性特点与缺憾,并指明以后努力的方向。

从此以后,在毛泽东的督促和领导下,陈伯钧政治上更加成熟,在党和军队中负起了更大的领导责任。他先后担任军事学院副教育长、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员、三八五旅副旅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参谋长等职,颇受毛泽东的器重。抗战胜利后,他受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委托,率领800名干部从延安经过华北开赴东北,先后任北平军调部中共热河小组代表、合江军区司令员、东北军区第一前方指挥所副司令员、十二兵团第一副司令兼四十五军军长,参与指挥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和广西战役。1949年初,他以湖南军区第一副司令的身份,组织四十六、四十七两军进行了著名的湘西剿匪战,为建立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作出了巨大贡献。1955年12月,陈伯钧被授予上将军衔,及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陈伯钧在解放后担任南京军事学院副教育长及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时,组织全院教员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和保卫祖国战略方针,并将总结报告报送毛泽东。1960年4月14日,他在高等军事学院作关于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的讲演,并出版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军事思想》一书,积极宣传毛泽东军事思想。1962年,陈伯钧撰写了《毛主席率领我们上井冈山》一文,回忆了跟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的经过,将自己与毛泽东患难与共的“将帅情”公之于众。

毛泽东同样没有忘记自己的“红军干才”和心腹爱将。在陈伯钧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整整40年后,即1967年5月1日,他被邀请上天安门城楼观礼。毛泽东关心地问:“伯钧呀,听说你病了?”伯钧回答:“是的。感谢主席的关心。”这或许是陈伯钧与毛泽东的最后一次会面。与40年前一样,毛泽东仍不忘勉励陈伯钧要好好读书。

1974年2月6日,陈伯钧因病不治。当时主持军委和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与徐向前、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了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在惊悉陈伯钧病逝后,他的战友莫文骅曾作词一首,悼念陈伯钧将军:“半世纪来随主席,征南北,讨西东。血洒禾黍绿葱葱。”这是对毛泽东与陈伯钧长达40年的“将帅情”的最好描述。(责任编辑 庄建平)

黑恶势力背后的 关系网和保护伞

● 江仁宝

各地公安机关长期坚持了整治斗争,坚决铲除黑恶势力的关系网、保护伞,彻底摧毁黑恶势力的帮派体系,消除黑恶势力伸向社会的毒蔓,已成为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

但是,长期以来,每当打掉一个或一批黑恶势力时,警方或社会各界就提出一些疑问:为什么这些社会渣滓能在一地多年称王称霸,胡作非为,横行不法呢?为什么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中由党和政府派出的侦查人员步履那么艰难,居然要经过长时期的艰苦调查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才能侦破案件呢?为什么党和政府领导开展的一场接一场的“严打”和专项斗争,就是触及不到或触及不深一些有钱有势的犯罪分子呢?某些人往往用“打击不力”等词句来解释黑恶势力长期存在的原因,然而,又为什么在很长时间内一再出现“打击不力”呢?

最近,笔者认真翻阅和剖析了一些典型案例,从中发现:几乎在大多数黑恶势力的背后,都有一张渗透到一些党政机关或执法机关的关系网。对此,曾有人总结概括为:家族网、权力网、金钱网、人情网;在这一张张关系网中都有一些腐败分子利用职权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黑恶势力凭借这一张张关系网、一顶顶保护伞而得到巩固和发展;关系网、保护伞在黑恶势力的巩固、发展中也越来越坚固,致使黑恶势力与某些社会腐败现象勾结在一起,沆瀣一气了!例如:

哈尔滨警方打掉的以“乔四”宋永佳为首的五个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三年间作案 130 多

起,把一个北方名城搅得乌烟瘴气,竟未受到惩处,根子就在于公安、政法、银行、基建、供销、房地产等部门有近百名干部充当着他们的保护伞,其中处级干部 20 余名,科级干部 30 余名。

吉林省长春市不久前处决的该省最大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梁旭东,在短短几年中,用糖衣炮弹对国家工作人员进行高密度“狂轰”,在自己的关系网上布下一个个“红点”:与之有牵连的处以上党员干部 12 人,警察 10 人,检察官 5 人,法官 4 人,司法警察 5 人。他们为犯罪分子洗脱和掩盖罪行。该省的和龙市顾德成黑帮早在 1996 年已是当地有一定势力的犯罪集团,但顾德成本人竟能先后当上市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更严重的是,少数黑社会势力已经渗透到县市级政府内部选取“代理人”,参与安排地方人大与政协的领导人。

曾经震惊中外的海南省“南霸天”王英汉,在原县委书记、原公安局长等党政干部和执法人员庇护下,在澄迈县横行六年,作案 28 起,其中未立案的 11 起,抓获凶犯未查清就放人的 7 起,由王英汉说情“私了”的 5 起,降为治安案件的 3 起,移送检察院的仅 2 起(一起私藏军用枪支案,检察院认为不构成犯罪未予批捕;一起非法买卖 7 支军用枪并拒捕,又被检察院免诉与缓刑)。王英汉在被捕关押中,还从狱中捎出“密信”,让内弟找李检察长“疏通一下关系”。

齐齐哈尔市警方打掉的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老大”潘家长,垄断全市蔬菜、水果、钢材市

场后,不惜重金拉拢党政干部和政法干警编织关系网。潘为母亲过 60 大寿摆宴席,仅政法干警前往道喜的就有 20 多人;潘带人杀人案发后,收其贿金搞假案、通风报信、为其开脱的有公安局副局长、科长、干警等 8 人;潘家长被捕关押后,每天到公安局讲情的均有一些党政干部,甚至直接打电话威胁公安局长和办案人员;一些党政领导干部还公开宣称:潘家长是改革的典型,搞活了市场经济,把他打掉了,全市吃蔬菜就成问题了!

原广西百色市公安局局长农学益、李红专,副局长林树春、马斯克等一帮官场上的头头脑脑,为百色市最大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头目周寿南、丁旭撑起了保护伞。以周、丁为首的黑恶势力从 1991 年在澳门多次抢劫银行开始至 1999 年 9 月被公安机关一网打尽,前后共八年时间,先后作案上百次,打死 2 人、打伤 66 人,犯有抢劫、行贿、赌博、敲诈勒索、故意伤害、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名达 11 个之多。

原陕西省富平县公安局局长丁叔亮、副局长陈文忠、惠夏志、杨耀等一度是富平呼风唤雨的头面人物,为以董天运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大开绿灯,致使董天运犯罪团伙全面垄断该地区的非法炼油市场,并公然“靠拳头说话,用砍刀发言”,大肆伤害他人,对抗政府。以董天运为首的黑帮所以如此嚣张、疯狂,因为他们自恃有公安局整套领导班子的“保驾护航”,恣意妄为,似乎天下就没有他们摆不平的事情。

辽宁省沈阳市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首要分子、原嘉阳集团董事长刘涌,在一路绿灯下,他购买了大量枪支弹药和藏刀、匕首,纠集了一大批有前科劣迹的人充当打手,猖狂地打、砸、砍、杀,先后酿成血案 30 多起,并迅速暴力致富,成为沈阳市“著名私营企业家”。所以如此,因为市检察院检察长是他干爹,区劳动局副局长是他干妈,市政协副主席、中级法院副院长是他姘头,他更是一名响当当的沈阳市人大代表。据报载,刘涌认沈阳市和平区劳动局党总支书记、副局长高明贤为“干妈”,这个“干妈”竟推荐从监狱出来的“儿子”参选人大代表,并在推荐的材料中大胆写道:“刘涌同志思想进步,作风正派,具备人民代表的资格。”不仅如此,刘涌还向时任中共沈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向东行贿,并得到马

的保护。

2000 年底审结的浙江省温岭市以张畏、王秀方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一案,涉及故意杀人、非法拘禁、贷款诈骗等 11 项罪名,是一种黑社会性质的特大犯罪团伙,此案涉及资金 5 亿元,涉案人员 184 人,其中党政机关干部 42 人,司法干警 15 人,金融干部 10 人。张畏还通过种种欺骗、行贿等手段,获得了湖北宜都市政协副主席、浙江台州市青联委员、台州企业家协会副会长及浙江某报社名誉社长等“桂冠”,并得到温岭市原市长周建国、原公安局长杨卫中的特殊保护,在张畏的住宅别墅挂上“温岭市公安局重点保护单位”牌子,致使其在温岭称霸一方,无法无天,无恶不作达四、五年之久!

贵州警方侦破的凯里市“金井帮”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老大”潘万发,千方百计用金钱美女拉拢行贿党政干部和政法干警,被其拉下水充当保护伞的有 9 人,其中局长 1 人,科长 4 人。某局长接受其 2 名美女长期“服务”后,致使国家损失数十万元。某监狱科长接受其 7 名美女“服务”后,竟将微型冲锋枪借给潘作案。从检察院法纪科长到驻地派出所长,都成了他的铁哥们,使其有恃无恐,称霸一方,疯狂作案五年之久!

辽宁省义县警方摧毁的以大榆树镇党委书记于平印为首的“家天下”犯罪集团,垄断了全镇党政财文等大权。于平印擅自提拔长子当了党委秘书,次子当了工商所长,三子当了武装部长,四子当了镇饭店经理,长媳当了镇党委组织委员,弟弟、侄子、干儿子等 14 名亲戚把持了交通、林业、土地、教育等重要部门的实权,镇党委 7 人开会,有其家 4 人出席,在全镇建成了水泼不进的“土围子”。不到 4 年时间,这个“家天下”犯罪集团吃喝挥霍公款 50 多万元,强奸作案 9 起,流氓伤害案 23 起,敲诈勒索案 50 余起。

类似案例,不胜枚举,仅上 10 例足矣!

江泽民总书记早就告诫全党:贪赃枉法,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权钱交易,挥霍人民财富,腐化堕落等腐败现象是产生犯罪的温床,而且,严重的腐败行为就是犯罪。

大量案例事实充分说明了一个道理:各种类型的犯罪团伙和集团要生存、要发展,必然向黑社会势力犯罪演变,必然挖空心思、千方百计向

党政机关和执法部门渗透,编织一张张关系网,寻找一顶顶保护伞。一些蜕化变质、腐败堕落的党政干部和政法干警往往一拍即合,使许许多多犯罪分子利用他们的权力,庇护恶性膨胀、危害一方的黑恶势力。正是在各种关系网和保护伞的推波助澜、助纣为虐的作用下,一个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集团横行不法,为非作歹,肆无忌惮!

所谓“打击不力”,并非实施打击的执法办案人员不出力,不尽心尽责,而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集团靠金钱、权力、人情、族情编织的关系网和保护伞制造出种种障碍和阻力,使侦查办案难以调查取证,难以缉拿罪犯,难以贯彻实施打击惩处的措施。正如某地警方在侦破一起黑社会性质组织团伙中,经过两年多时间含辛茹苦的侦查、追捕,最终追到国外才把罪犯抓获归案,这时,一位刑警非常动情地说了一句话:“我明白了抗日战争为什么要打八年,汉奸太多!”这真是一语中的。

家族——在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家族势力一直是统治中国社会的重要力量之一,近几年来,尤其在农村又死灰复燃。一些地方黑恶势力就是带着浓厚宗法性的家族势力在作祟。在这类犯罪团伙中,其头子或骨干一般都是具有血缘关系,属于同一家族的成员,一旦这种愚昧的、封建的家族力量与贪得无厌的欲望相结合,家族势力就很容易发展成地方黑恶势力。有些黑恶势力还利用家族势力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当帮凶,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犯罪分子掩盖在盘根错节、犬牙交错的关系网中,以其传统的、愚昧的甚至野蛮的力量阻碍案件查处、追捕,以致许多案件难破,“难于上青天”!

金钱——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金钱,作为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编织关系网的“杀手锏”和糖衣炮弹,一旦轰开一些腐败分子脆弱的防线,就像“粘结剂”一样,可以将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人“粘”进黑恶势力的圈子里,心甘情愿地为黑恶势力效力,甚至不惜担风险,什么党纪国法、制度规定,统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金钱,又是“润滑剂”,可以使关系网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协调。

权力——许多案例事实说明,变异了的权力是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千方百

计牟取和利用的“指挥棒”。党政机关、执法部门一旦变异成黑社会性质犯罪分子的保护伞,权力就失去了正义,不再为党和人民说话办事,而成为黑恶势力的“代言人”。越是实力雄厚的黑恶势力,越千方百计在有关权力部门安插“代言人”,一有“风吹草动”,便通风报信,扭紧一股绳,或是群起而攻之,倒打一耙,好人反而变成坏人,或者运作包括舆论在内的各种权力机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蒙混过关。

人情——过去,因为我国社会长期盛行“人治”,因而也就特别讲究“人情”。人情则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用以混淆、干扰法律、政策、原则的“魔棒”。凡长期在一地从政执法的人员,都有些同事、战友、同学、老乡、亲朋好友,黑恶势力往往抓住这些“关系”,以金钱、亲情、甚至泪水打动“恻隐之心”,使一些干部一下子把“人情”看得比法律、政策、原则更重要,不惜打电话、写条子、通关节、走路子、出点子,为犯罪分子开脱罪责。所以,掌权者稍不留心,就陷入人情的泥坑中不能自拔。

由金钱、权力、人情、族情编织成的种种关系网、保护伞,使黑恶势力变得越来越黑,并像滚雪球似的恶性膨胀起来,使人们观察黑恶势力时敌我不清、难于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一些人在一段时间内颠倒是非标准,变得很愚昧,甚至成为黑恶势力的“枪炮”,人们在铲除黑恶势力时往往感到无从下手……

难怪许多公安政法干警直言不讳地说:哪里黑社会性质的恶势力猖狂,那里腐败就严重;“反黑”不和反腐败结合起来搞,“打黑除恶”就别想深下去。许多学者、专家呼吁:打黑必先反腐!关系网、保护伞不破,黑恶势力难除!

“亦官亦匪”,“警黑勾结”,相依相托,是旧中国“青红帮”之流黑社会生存发展的“怪胎”。不可否认,我国在这方面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影响。中央领导同志曾一再强调,反腐败要注意封建传统势力的影响,可能就是考虑到这些方面的消极因素。由此可见,“打黑除恶”并非权宜之计,也非一朝一夕之事。反腐倡廉是党和国家兴衰成败之大计,更是任重而道远!

(责任编辑 程 度)

蔡元培的为人风范

● 崔志海

在中国近代众多杰出历史人物中，蔡元培是一位较为特殊的人物。他既被国民党奉为党国元老，同时又被中国共产党视为战友，称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不久前，在北京新修的皇城根遗址公园中矗立的五四纪念碑上，也镌刻着蔡元培的人像，供人们缅怀、纪念。

蔡元培何以能够声名洋溢，超越党派、阶级和时代，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怀念，请让我们一同追寻他的生平 and 事业，以揭开这一历史谜底。

从翰林学士到投身民主革命

蔡元培号孑民，1868年1月11日出生在历史名城绍兴一个商人的家庭里。少年时代，蔡元培与当时的许多读书人一样，走的也是学而优则仕的科举道路。他于1883年虚龄17岁那年考取秀才，1889年考中举人，1894年27岁时便获得了翰林院编修的功名。

然而，翰林的功名并没有给在科举仕途上平步青云的蔡元培带来常人称羨的高官厚禄，不久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身处京城，蔡元培对清政府在民族危机面前所暴露出来的腐败和颓废深感痛心和愤慨，曾以翰林院编修的身份列名奏请朝廷，反对向日求和、割地赔款，指责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卖国行为，“虽韩、魏于秦，宋于金，不如是之甚也”。出于对清廷的极度失望，1895年秋他便乞假回乡一年，直至1896年12月才回京销假。

戊戌政变发生后，蔡元培反思变法运动失败的教训，开始确立教育救国的思想。他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积弊很深的大国，康、梁等维新志士试图通过皇帝下几道上谕来从事改革，使中国起死回生，这是不可能的；相反，只有从培养人才、开发民智着手，才能自强救亡。因此，他在戊戌政变发生后不到一个月，即于是年的10月告假，携眷离京南下，回到故乡绍兴，出任当时绍兴唯一一所新式学校——绍郡中西学堂总理。

1901年，因守旧势力的压迫，蔡元培离开绍兴中西学堂，转而前往上海担任南洋公学特班生总教习，并从事更为广泛的社会和政治活动。在上海，他曾与好友、乡试同年张元济协议创办《开先报》，后改名《外交报》，并应张元济之邀，兼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负责制订国文、历史、地理三科教科书的编纂体例；又与黄宗仰、林白水、蒋观云等社会人士一道组织成立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女校，并任中国教育会会长和爱国女校校长。

1902年底，南洋公学的学生因不满守旧教员无端开除学生发生学潮，身为教员的蔡元培积极地站在进步学生一边，与中国教育会的其他负责人一道组织成立爱国学社，担任总理，接纳退学学生。在课堂上他公开向学生传授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学说，并带领爱国学社的学生在上海的张园举行演说会，将《苏报》作为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附属机关报，逐日轮流为《苏报》撰写论说，积极参与拒法、拒俄爱国运动。在学界，蔡元培成了当时国内进步青年学生的导师。



蔡元培

1903年6月《苏报》遭清政府取缔之后,蔡元培不但没有被清政府的镇压吓倒,反而以更大的政治热情和勇气从事革命活动。继《苏报》之后,他在上海重新创办出版《俄事警闻》、《警钟日报》,通过宣传反帝爱国,激发人们的反清意识。办报之余,他还每月前往租界西牢轮流探望因《苏报》案而入狱的章太炎和邹容。暗地里蔡元培则亲自参与暗杀和暴动活动,成立秘密反清组织光复会,并任会长,凭借他的声望,将江浙一带原来互不相统属的革命势力联合在一起。1905年8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成立后,蔡元培打破光复会内存在的严重的狭隘地域观念和宗派思想,积极将光复会纳入同盟会的领导之下,并欣然受命为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介绍一大批进步人士加入同盟会。

当然,作为一位翰林革命家,蔡元培与孙中山、黄兴等职业革命家不同。他一方面具有渊博的知识、高尚的道德,但同时也较诸其他革命党人更具有书生色彩。他在从事革命活动中几乎都以教育机构为据点,既没有深入下层会党,也没有深入新军,他可以凭借个人声望动员一部分人加入革命团体,但他并不善于做具体细致的组织工作,其革命手段也都偏重于暗杀,他本人即曾自谓“性

近于学术而不宜于政治”。因此,在暗杀活动连遭失败、革命内部又产生不和的情况下,蔡元培对从事革命活动立刻产生了一些倦意,求学的念头油然而生,1907年6月他便随驻德公使孙宝琦前往德国留学,重新回到求学救国的道路上来。

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到学界领袖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敲响了清朝灭亡的丧钟。蔡元培在德国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以激动的心情,提前结束他在德国西南小镇一所中学所做的心理学实验,匆匆赶回柏林,与当时留学德国的其他中国学生一道,商量如何为国内的武昌起义“稍尽义务”。11月中旬,他便乘火车,取道西伯利亚回国,投身创建民国的事业,积极配合孙中山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12年1月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

在任教育总长期间,蔡元培以丰富的教育经验和择善如流的民主作风,打破党派门户之见,不拘一格,广泛延揽各类人才,组建起一支高效廉洁的中央教育行政机关,为实现由封建旧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化做了大量革故鼎新的工作。他一方面下令废除清末“忠君”、“尊孔”的封建教育宗旨,禁止使用清末学部颁布的旧教科书,废止中小学读经,废除旧时代奖励科举出身的办法,同时提出以军国民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作为民国的教育方针,组织制订和颁布一系列新的教育法令和法规,主持召开首次全国教育会议,确立中华民国新学制,有力地配合了民初民主共和政治的建设。他领导下的教育部在当时即备受舆论的赞许,称“教育部新旧杂用,分司办事,……俨然有建设气象。”因邀出任教育次长的范源濂回忆与蔡元培一道主持民初教育部的情景时这样说道:“在我们的合作期间,部里的人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讨论很多,却没有久悬不决的事;一经决定,立刻执行。所以期间很短,办的事很多。”

在1917—1923年主持北大的六年里,蔡元培以大无畏的勇气,按照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学模式,对旧北大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在管理体制上,蔡元培力图贯彻教授治校、民主办校的原则,改变北大以往校务只由校长、学监主任和庶务

主任等少数几个人独揽的做法,设立由教授组成的评议会,作为全校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在学制方面,蔡元培调整学科设置,坚决主张将北大办成以文、理两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并推行选科制,废止文理分科,实行文理沟通。在大学设立研究所,开放女禁,实行大学男女同校。在校园文化方面,蔡元培积极支持和组织各种学术研究团体,提倡学生自治,引导学生朝德智体美四方面全面发展。在办学方针上,蔡元培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大力提倡学术民主,反对用政治干涉学术,反对专己守残的文化专制主义,主张不因人废言,让学术上的不同流派自由竞争。他指出:“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将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同时,他也坚持“教育独立”的原则,声言:“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予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经过这些改革和整顿,北京大学的面貌焕然一新。蒋梦麟在《西潮》一书中这样描述北大在蔡元培领导下出现的深刻变化:“北大在蔡校长的主持之下,开始一连串的重大改革。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领域一直是由文学独霸的,现在,北京大学却使科学与文学分庭抗礼了。历史、哲学和四书五经也要根据现代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蓬勃一时。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长短。背后拖着长辫、心理眷恋帝制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谑。教室里,座谈会上,社交场合里,到处讨论着知识、文化、家庭、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等等问题。这种情形很像中国先秦时代,或者古希腊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时代的重演。”

主持北大期间,蔡元培还对促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起到了独特的作用。他任北大校长后,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下,排除来自各方保守势力的压迫和反对,大力延聘像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鲁迅、刘半农等这样一些新派学人为北大教员,使新文化运动的力量汇聚到北

大。尤其是他支持陈独秀将《新青年》杂志迁到北大,更是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起了关键的作用。《新青年》迁到北大后,由于北大进步师生的加盟,改变了以前作者多为皖人的局限,宣传内容更广泛,影响也更大,开始真正扎根到“新青年”之中。而在《新青年》的影响下,北大进步师生创办的《新潮》、《每周评论》、《国民》等杂志,又进一步扩大了新文化运动在全国的影响。这样,新文化运动便在北大进步师生的共同努力下,从原来由陈独秀等少数人提倡的文化运动变成有大批青年学生拥护的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而北大也由此成为这场运动的中心。对于蔡元培在新文化运动这一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梁漱溟说过一段十分肯綮的话,他说:“所有陈胡以及各位先生任何一个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必能作,然他们诸位若没有蔡先生,却不得聚拢在北大,更不得机会发抒。聚拢起来,而且使其各得发抒,这毕竟是蔡先生独有的伟大,从而近二三十年中国新机运亦就不能不说蔡先生实开之了。”

在1919年“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中,身为校长的蔡元培十分同情和支持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他不但拒绝接受当时北洋政府开除参加游行示威学生的指令,而且亲自出面,多方营救被捕学生。5月7日晨,他率领北大师生在汉花园红楼前面的文科广场迎接被捕学生归来,对他们备加慰勉。第二天在得知北洋政府决定撤免他的北大校长的职务后,他担心因他个人的进退导致学生与政府的冲突,为了保护学生,便于当日毅然提出辞呈,一人承担责任。蔡元培在学生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忍辱负重的高尚品德,不愧为学界的楷模,深得广大师生的尊敬和拥戴,北京、上海等地的学界立刻掀起声势浩大的“挽留蔡校长”运动。在广大师生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之下,北洋政府只好让步,总统徐世昌不得不签署挽蔡的命令。9月,在五四运动的目标基本实现后,蔡元培在各方的劝说下,返京回校任职。

然而,作为一位教育家,蔡元培并不赞成学生过多的卷入政治,闹学潮。他回北大复职后就一再呼吁北大学生尽快回到求学救国的道路上来。他指出:“现在一般社会也都知道政治问题的重要,到了必要的时候,他们会对付的,不必要学生独担其任。现在学生方面最要紧的是专心研究学问。”

因此,蔡元培对“五四”后北大出现的学潮多持反对的态度。在1922年的“讲义费风潮”中,他甚至与学生发生直接冲突,开除一名带头闹学潮的学生。

五四期间,随着蔡元培将教育文化视为最重要的事业,他的政治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追求国家独立和民主政治中,他不再主张任何激烈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而只赞成和平渐进方式的改良,表现出明显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立场。1922年5月,他与王宠惠、陶行知等16人,联名发表由胡适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希望在军阀吴佩孚的统治之下,在中央出现一个“好人政府”。与此同时,他反对孙中山为护法而诉诸武力,主张南北双方通过和平谈判,实现国家的统一。在与反动军阀的斗争中,蔡元培转而采取一种典型的学人式的斗争手段——不合作主义,即以辞职告退的方式作为与军阀、官僚、政客当权者进行斗争的主要武器。1923年1月为抗议直系军阀和一部分官僚政客蹂躏人权,破坏司法独立,制造“罗文干贿赂案”,蔡元培毅然向总统黎元洪提交辞呈,并发表声明,表示耻于与反动政客为伍,要求辞去北大校长的职务。7月,他便携眷第四次赴欧游学。

党国元老,功在科教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蔡元培虽然他为他早年的特殊身份和经历,同时也由于他当时参与了蒋介石策划的反共清党活动而被奉为党国元老,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历任数职,但他并没有由此迷恋官场,而是始终保持一位学人的本色,把精力主要用在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上。

为实现他的教育独立的夙愿,蔡元培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不久,即以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的身份,着手改革官僚化的教育部,筹划仿效法国教育行政制度,组织中华民国大学院,作为全国最高学术和教育行政机关;同时提议改革地方教育行政制度,在全国推行大学区制,以取代省市教育厅局的职能,由一部分教授和专门研究教育的学者来负责教育,避免学术教育官僚化、衙门化,避免外行领导内行,实现专家办教育。1927年10月蔡元培出任大学院院长后,又提出以科学化、劳动化

和艺术化作为新的教育方针,强调对一切事物,都要不轻信,不盲从,考其所以然,穷究其因果关系,让学生树立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养成科学头脑”,同时打破劳力与劳心的成见,养成劳动观念,培养学生的艺术兴味。由于蔡元培的教育理念与南京国民党政权的“党化教育”多相抵触,他在教育行政制度方面实行的改革在国民党内遭到强烈的非难,不到一年,大学院便于1928年8月遭废止。

大学院制改革失败后,蔡元培即辞去大学院院长及在南京国民政府内的各项兼职,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直至病逝。在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13年里,蔡元培继承民元任教育总长和后来任北大校长时的领导作风,奉行人才主义,知人善任,选贤择能,同时发扬民主,不专权,不居功,使人和机构各尽其能。对于蔡元培的这种领导作风,与他共事多年的胡适曾作过精辟的评论,认为蔡较诸蒋介石更有领袖风范。他说:“我与蔡子民先生共事多年,觉得蔡先生有一种长处,可以补蒋先生之不足。蔡先生能充分使用他手下的人,每委人一事,他即付以全权,不再过问。遇有困难时,他却全身负其全责;若有成功,他每啧啧归功于主任的人,然而外人每归于他老人家。因此,人每乐为之用,又乐为尽力。迹近于无为,而实则尽人之才,此是做领袖的绝大本领。试看他近年用杨杏佛。杏佛是一个很难用的人,然而蔡先生始终得其用。中央研究院的粗具规模,皆杏佛之功也。杏佛死后,蔡先生又完全信托于丁在君(即丁文江——引者注)。在君提出的改革方案有不少的阻力,但蔡先生一力维持之,使在君得行其志。”胡适的这段话,可以说是道出了蔡元培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现代文教界和科学界一位众望所归的领导人的魅力所在。

在如何推动学术研究方面,蔡元培也提出一系列的指导思想。他一方面坚持学术自由,充分尊重各专家的个人兴趣,坚信“学院自由正是学术进步之基础”,但同时也强调学术研究应根据研究问题的性质,有轻重缓急之分,并提出三条标准:第一、一种研究可为其他若干研究提供凭借者宜列在首位;第二、为具有地域性的研究,即我国研究条件尤优于外国人者,宜优先从事;第三、凡一种研究,因其问题特别重要,其结果可为他种相

关工作之标准者,宜尽先从事。

在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两者的关系上,蔡元培主张两者兼顾,不可偏废。他指出,对于基础科学不能完全以一时的功效来衡量,而应看其长远的影响。同时,蔡元培也提出不可忽视应用科学的研究,要求研究人员应加强与原料和生产直接有关的问题的研究,以满足国家和社会的需要。

在开展学术交流方面,蔡元培坚决反对唯我独尊,强调中央研究院应加强同国内各科研单位和大学的平等合作。他明确表示:“中央研究院只能利用他的地位,时时刻刻与国内各机关联络交换,不可以阻止旁人的发展,或是用机械的方法来支配一切研究的题目,这是本院成立以来一贯的方针。”本着这一思想,1935年中央研究院组织成立的全国最高学术评议机关——评议会,除了中央研究院院长和各研究所所长为当然评议员外,另又推举和选择30名学术界的中坚人物为聘任评议员,举凡国内重要的大学和学术研究机关,均有代表当选,使之成为“中国学术合作的枢纽”。

在对外学术交流上,蔡元培一方面鼓励“学欧美之所长”,对正常的中外学术交流持积极态度,尽可能地选派国内研究人员参加有关的国际学术活动,同时又十分注意维护中国的主权。每遇有外国学者来华考察,中央研究院都要与他们订立条例,规定不得从事学术之外的活动,所采集的标本须一律先经本院选聘专家审查后,方可运出国外,并将标本的复本留一份给中国,若无复本,则应将正本留归中国。另规定外人从事考察活动,都须有中央研究院派员参加,这样既达到中外学术合作的目的,也可监督和杜绝个别外国学者借学术研究之名从事不正当活动。蔡元培常常勉励国内学者致力于中国的科学研究事业,维护学术独立地位,以抵御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在文化和科学领域对中国的侵略。

在蔡元培的精心组织 and 领导下,中央研究院的各项研究事业获得蓬勃的发展。至1929年,中央研究院即设有物理、化学、工程、天文、气象、历史、语言、心理、社会科学及自然历史博物馆等十个研究所。各所成立后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在国内学术界分别居于领导地位并提携和培养了一大批科学专门人才,为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晚年忧政,民主抗日

蔡元培一生既是学界中人,同时又是“党中人”。作为党中人,蔡元培在政治上并没有与国民党的官僚们沆瀣一气,而是一如既往地坚持民主和爱国,并由此逐渐走上与南京国民党政权离心离德的道路。

蔡元培与蒋介石国民党政权之间的裂隙,其实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日起即已存在。1927年,蔡元培虽然站在党派和阶级的立场上,参与国民党新右派蒋介石策划的反共清党活动,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但同时他从一开始就在国民党内坚持民主和法制,反对专制独裁统治。在清党初期,他就曾对浙江清党委员会草菅人命、枪杀20余名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提出严厉批评,指出:“我们不能随便杀人!昨天那样办,太荒唐!太草率!太不好了!此后必须谨慎。”他甚至还出面营救可能遭国民党逮捕的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四、五月间暗中分别通知被列入清党对象的朱宜权、韦恂出走,以免遭国民党的毒手;同年8月,出面保释被捕入狱的进步青年史良和同学郑观松。1927、1928年间,他又专门写了一篇题为《追怀不嗜杀人的总理》的文章,劝告国民党当局继承孙中山的高尚人格,以德服人,停止滥杀。

1928年大学院制改革失败后,蔡元培与南京国民党政权的裂痕进一步加深。8月17日,他因不满国民党内官僚政客朋比为奸,公开提出辞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大学院校长、代理司法部长等职,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致力于科学事业。他在辞呈中写道:“窃元培一介书生,畏涉政事。前以全国尚未统一,人才不能集中,备员国府,一载于兹。……顷统一告成,万流并进,人才济济,百废俱兴。元培老病之身,不宜再妨贤路,且积劳之后,俾可小息。……愿以余生,专研学术,所以为党国效力者在此。”对于10月8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推举他为监察院院长,蔡元培也坚辞不就,私下里对胡适说:“这时候哪有监察的事可做?”同时,他对胡适发起“人权运动”,抨击南京国民党政府不保障人权,要求思想言论自由,甚为赞赏,写信予以支持,称赞胡适的文章“振聋发聩,不胜佩服”。

1932年,为捍卫民权,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统治,蔡元培本人直接走上与南京国民党政权公开对立的道路。经过近半年的酝酿和活动,12月17日,他与宋庆龄、杨杏佛、林语堂等在上海联名发表宣言,宣布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同盟成立后,蔡元培作为副会长,与其他同志一道,为实现同盟所提出的任务做了大量的工作:参与营救许德珩、侯外庐、马哲民、罗登贤、廖承志、陈赓、丁玲、潘梓年等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的活动,并对其他一些被国民党非法拘捕或杀戮的政治犯进行声援或昭雪;抗议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非法枪杀《江声日报》经理兼主编刘煜生;亲到上海德国领事馆递交抗议书,抗议希特勒疯狂迫害德国进步人士和犹太籍人民,摧残文化,违背人道;接待英国著名作家、费边社成员萧伯纳来华访问,以扩大保障民权运动在国际上的影响。

对于蔡元培以党国元老和中央监察委员的身份参与组织民权保障同盟活动,南京国民党当局极为恼火,不断加以恐吓、威胁,指责他的行为“徇于私情,曲加保护,为反动张目”,“破坏本党威信,逾越中委职权”,宣布同盟为非法组织。对此,蔡元培进行积极的抗争。2月9日,他在报刊上发表谈话,公开声明,“本同盟组织之目的为保障人权促进法治,宗旨纯正,态度光明,绝对不能谓为‘非法’。反之,凡一切反对本同盟之主张,则恰为非法。”

1933年6月18日,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遭蓝衣社特务枪杀身亡。面对国民党特务的子弹威胁,蔡元培也没有被吓倒。事情发生后,他于当日上午9时即驱车赶至现场,然后前往医院审视遗体,接着开会讨论善后事宜,一面代表家属,聘请律师,进行法律交涉,同时致电林森、汪精卫,要求立即“飭属缉凶,以维法纪”。20日,蔡元培亲自主祭并致悼词。表达他对痛失斯人的沉痛哀悼,并表达了他随时准备为保障人权而牺牲生命的坚强决心。

在追求和捍卫民主的过程中,蔡元培同时坚持反帝爱国思想。1928年北伐刚完成,他就在国民党第二届五中全会上提出《关于外交问题提案》,要求将废除不平等条约列入国民政府的议事日程,把国民革命进行到底。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蔡元培大力宣传抗

日,力促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改变消极抗战政策,实行全民抗日。1933年1月,他在赠给鲁迅的二首七律诗中,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作了严厉的鞭挞,诗云:“养兵千日知何用,大敌当前暗不声。汝辈尚容说威信,十重颜甲对苍生。”“几多恩怨争牛李,有数人才走越胡。顾犬补牢犹未晚,祇今谁是藁相如。”1934年,在赴南京出席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举办的宴会上,他又苦劝汪改变亲日政策,语重心长地说:关于中日的东西,我们应该立定严正的态度,以大无畏的精神,推进抗战的国策,由我们到我们的后辈一直抵抗下去,一定有出路。在写给一位友人的信中,他进一步表达了希望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国共合作、共赴国难的愿望。

由于蔡元培坚持民主抗日的进步立场,他在当时就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欢迎和赞许。1936年9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亲笔致函蔡元培,对他的言行给予高度赞扬,并希望他为促成国共合作、实现全民抗日作出更大的贡献。

1937年上海沦陷后,蔡元培移居香港,仍然十分关心中国内地的抗战,不顾自己年老体弱,继续从事抗日宣传活动。1938年5月,他应邀出席保卫中国大同盟和香港国防医药筹赈会举办的美术展览会开幕式,发表精彩的演说,将艺术与抗战联系起来,指出:美术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宁静和坚毅的精神,不但前方冲锋陷阵的将士不可不有,就是后方供给军需,救护伤兵,救济难民以及其他从事不能停顿之学术或事业者,亦不可不有之;有了这种精神,始能免于疏忽、错乱、散漫等过失,始能在全民抗日中担得起一份责任。1939年12月,就在他病逝前三个月,还用《满江红》词调,亲自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撰写会歌,对中国的抗战事业充满必胜信念,其歌云:“公理昭彰,战胜强权在今日。概不问,领土大小,军容赢诎。文化同肩维护任,武装合组抵抗术。把野心军阀尽排除,齐努力。我中华,泱泱国。爱和平,御强敌。两年来博得同情洋溢。独立宁辞经百战,众擎无愧参全责。与友邦共奏凯旋歌,显成绩。”

然而,蔡元培毕竟年事已高,没有能够目睹抗战的胜利,便于1940年3月5日9时45分在香港九龙寓所溘然长逝,享年73岁。

(责任编辑 庄建平)

周惠在内蒙古推行包产到户

● 储建中

1978年7月2日,饱经风霜和政治劫难的周惠终于出山了,被中共中央任命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和内蒙古革委会副主任。

上任前,中央领导曾与他谈到内蒙古从粮食调出省区变成调入省区的情况。还说:“你周惠是‘老农业’了,要研究一下。”为此,他和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尤太忠通了一个电话,讲明先到基层调查研究,后到自治区党委报到。之后,便打点好行装,从北京直接到了乌盟。

这一年,内蒙古又是一个大旱年。

此刻,周惠站在卓资山一条荒凉孤寂的山梁上,举目望去,虽是盛夏,绿色却很少,灾年已成定局。一路上,他亲眼看到的是农民那一张张菜色的脸、破衣烂衫和青筋暴突的双手以及瘦弱的身躯。良久,他长吁了一口气,仿佛要把胸中的积郁全部吐掉似的,扶了扶眼镜,又搓了搓那两只厚敦敦的手掌,掉过身来,一边走,一边浮想联翩……

内蒙古,幅员辽阔,物产丰富。拥有草场面积10亿亩以上,是国家重要的畜牧业基地之一;拥有河套平原等产粮区,耕地面积8000多万亩,是全国小麦、甜菜、马铃薯的重要产区;森林面积2.4亿亩,在全国居第二位。煤、铁、稀土等矿产资源也极其丰富,可为什么吃不饱饭?

从1957年到1977年,内蒙古全区农业总产值由11.18亿元增到17.97亿元(按1957年不变价格算),增长60.8%,而同期全区人口由936万人增加到1798.1万人,增长91.1%,人均农业产值由119.45元下降为99.98元,下降19.5%。

全区人均粮食产量,“一五”期间453.92公

斤;“二五”期间363.08公斤;“三五”期间298.32公斤;“四五”期间281.62公斤;“五五”期间264.85公斤。

全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从1958年以后一直停滞不前,甚至下降。197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130元,比1956年仅上升22.3%;牧民人均收入236元,比1956年下降83.9%。

土地不肯长庄稼?农民不会种地?……他一边走一边摇头。他逢人便交谈,其中有干部、有农民,有不少人甚至还不知道他的身份。他当然清楚“文革”是一个重要原因,更使他记忆犹新的是“一大二公”那场事。从人民公社化以后,农民种地渐渐没有了自主权,一块土地种什么,怎么种都要由上级指令来决定。从毛泽东主席开始,到生产队长,都讲要因地制宜,但到最后谁也不能搞因地制宜。要让农民多打粮,吃饱饭,就得让农民有自主权,从而才能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否则,有天大本事的领导也管不饱农民的肚子。

使他感触至深的是不少干部习惯于盲目“紧跟”,说空话、大话、假话,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工作,怎么能够解决农民吃饱肚子的问题?!

离开乌盟之后,周惠又到锡盟、包头市等地农牧区调查,一路听到和看到的,结论只有一个字:穷!毛主席说穷则思变。现在怎么变?他又在沉思……

1978年10月10日,周惠接任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与自治区党政领导研究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种粮的人没饭吃,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头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当时规定农区的农民自留地每人只有三分半,自留羊

每户不准超过5只。农村的实际是,集体地小麦平均亩产多年停留在100来公斤,而自留地则在400公斤以上,这样的结果本身就说明了一切。可怎么办?怎么办?……

每当有人同周惠谈到当时农村改革时,他总说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功劳。当年11—12月,中央工作会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先后在北京隆重召开。12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说:“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

坐在台下的周惠,听到这儿时,精神立刻为之一振,包括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虽然都是“原则”、“方针”,但他都视为“尚方宝剑”,觉得大的“底数”已有了,下一步的任务就是如何根据这一精神来落实了。会议还未结束,他的脑子里就开始不断地“过电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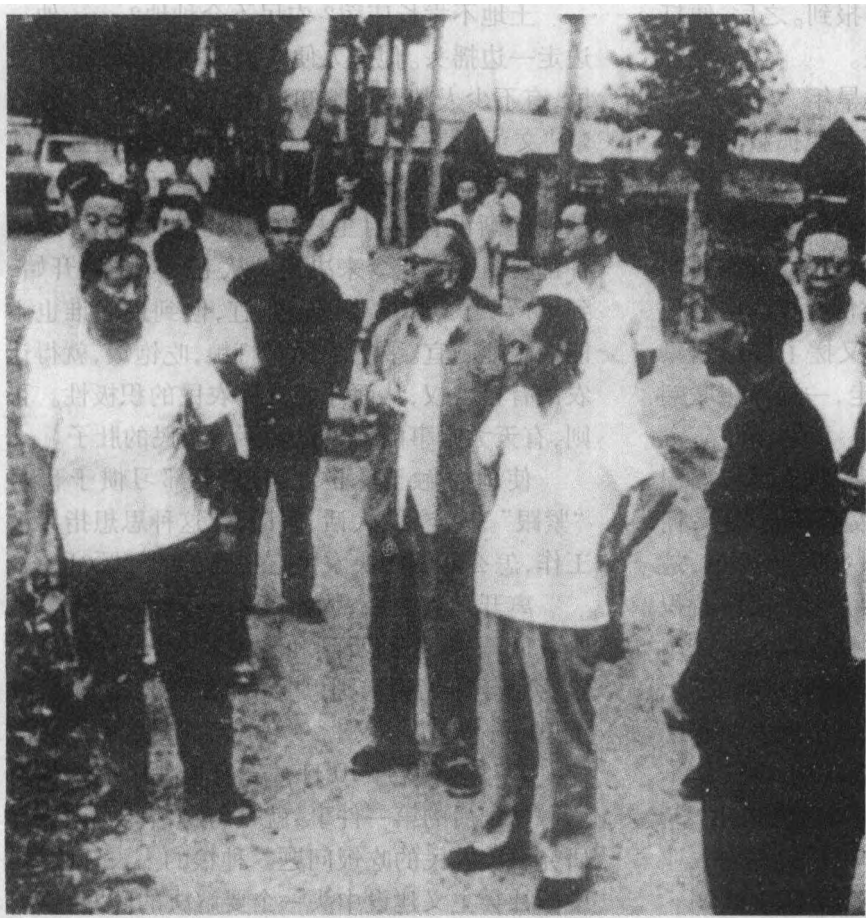
——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农民,由于辛勤劳动……生活先好起来……

从北京开会回来后,周惠立即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及其它有关会议,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在农村改革上他旗帜鲜明、大胆推进。他自告奋勇兼任自治区农委主任,一位副书记和一位革委会副主任任副主任。区党委作了一个《决定》,除了出台扩大自留畜等一系列农业政策外,突出强调了各级干部群众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创新。但正如周惠自己讲的,他也有顾虑,还不敢明确提出“包产到户”。

确实,真理一旦与群众的实践相结合,就会激发出无穷的勇气、智慧和创造力。1979年春天,伊盟、巴盟、呼市等地的部分社队开始出现了不同叫法的“包产到户”,得到广大农民群众和干部的拥护。伊盟原分管农业的副盟长马丕峰,是个有名的“老右倾”。他在60年代初期为了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就曾提出过“包产到户”的主张,结果受到了批判。他由衷地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区党委的《决定》,他对别人讲:“包产到户的政策好,农民有积极性。搞大集体实际是娃娃穿了双大人鞋,鞋磨了,娃娃也累坏了。”

“集体地和自留地就是不一样。不信,你把我领到地里,闭上眼睛光着脚走一回,集体的地是硬板的,自留地却是绵乎乎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1979年春中国农村改革出现过一个“倒春寒”,就是北京有人批农村改革是“资本主义复辟”。这样,有的地方把包到户的地又收回来了,而多数是转入了“地下”,对外叫包到组了,实际没变。周惠和区党委采取默认的态度,实际就是支持。到了秋天,凡是包产到户的队,



周惠(前排右三)与胡耀邦(前排右二)在内蒙古赤峰

农业都增产,农民都得到了实惠,尝到了甜头。如托县中滩公社,把耕地分成“口粮田”、“责任田”来管理,“口粮田”和自留地一样,分给农民自己耕种,收获归自己,“责任田”则承包到组耕种,承担公粮和任务粮。实际效果真正明明白白,由此人们就把“口粮田”比作亲生的,把“责任田”比作后娘养的。

1980年春天,周惠到西部调查研究的第一站就到了中滩公社。公社书记和管委会主任大概是了解周惠的“内心世界”,不仅进一步明确提“大包干”的主张,而且从理论到实践讲得头头是道。周惠一边听一边下意识地地点头,当有人提出疑问时,他马上笑着说:“还是先吃饱饭要紧”。这年夏天,中央开会讨论并发文明确提出了“三靠队”可以包产到户,周惠举双手拥护,可同时好像又在琢磨什么问题,他在院里散步时常常一会儿抬头朝远处望望,一会儿停下来低头静立。在随后传达讨论文件时他对大家说:“和全国各省区比起来,我们内蒙古差不多算‘三靠区’吧。”话不多,但影响不一般。后来,他又多次对党委一班人和自治区政府领导班子成员讲:要把中央文件同内蒙古的实际结合起来,工作才能有创新。在他的这一指导思想影响下,《内蒙古日报》有关包产到户的报道、调查报告等日渐多

了起来,形成了舆论氛围。

1981年春天,周惠到东部调查研究的第一站是乌盟,乌盟“包产到户”的少,又遇大旱,已到五月中下旬,许多生产队人缺口粮、牲畜缺饲料、耕地缺种子。农民要求“包产到户”的呼声很高,但夏田已种下去了。怎么办?周惠听完汇报后和干部群众讨论了“包青苗”的问题。走了一路,周惠强调了一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调动农民积极性的问题。到了秋收,真是“一包就灵”交给国家的、留下集体的、剩下都是农民自己的,都得到了利益。不少干部感慨“神了”,春天提出那么多困难,都被农民自己克服了,感受到了政策的威力。这就是后来人们说的周惠搞的“半路出家,也能成佛”。

1982年初,内蒙古“包产到户”已呈不可阻挡之势。周惠在感到欣慰的同时,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他在全区农村经营管理会上特别强调了“巩固”和“完善”的问题。实际上从此以后“包产到户”便席卷了内蒙古农村,并不断巩固发展,粮食也连年增产。

20年过去了,周惠回忆说,内蒙古农村改革所取得的成绩,是自治区党委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和内蒙古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

(责任编辑 杜 晋)

·
欢
迎
订
阅
·

新 华 月 报

XINHUA MONTHLY

鲜明的时代特色
丰富的信息含量
权威的文献资料
极高的保存价值

《新华月报》是一份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主管、人民出版社主办的大型文献性综合月刊。于1949年11月正式创刊发行。在半个世纪的历程中,《新华月报》真实地记录了新中国成长的历史,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

《新华月报》现设有“每月要闻”、“政治·社会”、“经济”、“科技”、“人物”、“文化”、“环球观察”、“时事经纬”、“文献资料”、“知名人士逝世消息”、“大事辑览”等栏目,在保持业已形成的文献资料性的特色及其所用材料权威、准确、系统的特点的同时,精选了大量反映社会、科技、文化及国际方面的热点的文章,图文并茂,含有浓厚的时代气息与文化蕴味,是一份既具可读性又有可查性的刊物。

《新华月报》为16开本,192页,彩色封面。国内外公开发行,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邮发代号:2-242

国外代号:M6

每册定价:11.50元

本刊地址: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100706

联系电话:(010)65255571 65250495

我的父亲阳翰笙

● 欧阳小华

有的人对阳翰笙这个名字不一定熟悉。但是凡经过“文革”的人一般都知道“四条汉子”。这“四条汉子”就是周扬、夏衍、阳翰笙和田汉，他们都是30年代以来中共领导下革命文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江青、康生一伙以“左”的面目出现，对他们大肆围攻，进行造谣、污蔑和残酷迫害。其中首先遭到冲击的是阳翰笙。那么，阳翰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经受血与火的锤炼

1902年，阳翰笙出生在川滇边界一个“水帘式”的村镇——四川高县罗场，少年时代就参加救国救民活动。1922年，在成都与中学同学自发成立了“四川省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头闹学潮反对军阀当局，遭通缉。1925年在上海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五卅运动”中，阳翰笙作为全国学联代表，参加组织罢工、罢市、罢课的斗争，在第一线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1926年受党组织派遣到黄埔军校工作，公开的职务是政治教官和政治部秘书，同时从事党的秘密组织工作。从那时起，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阳翰笙参加了南昌起义，先后被任命为叶挺领导的十一军二十四师党代表和起义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参加了攻打钱大钧、迎击黄绍竑、保卫汕头、流沙突围等四次战斗，一直打到海陆丰。

南昌起义失败后，周恩来派他到郭沫若创办的《创造社》工作，以加强上海文化界党的力量。周恩来对他说：“在革命低潮中思想工作尤为重要”。阳翰笙服从工作的需要，弃武从文，走上了开创革命文艺事业的道路。

劈荆斩棘笔当枪

阳翰笙遵照周恩来的嘱咐，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建立了中共第一个“文化支部”，任支部书记。他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停止了一些同志和鲁迅的论争（他自己没有参加论争）。由文化支部领导建立了以鲁迅为旗帜的“左联”和“左翼文化组织总同盟”（简称“文总”），他连续多年任党团书记。他写了属于我国最早的一批有影响的马列主义政治与文艺理论著作；以华汉等笔名写了一系列以大革命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他在文学作品中第一个反映了南昌起义；第一个表现了士兵；第一个描写正在进行的工人和农民的武装斗争。他告诉读者，红旗没有倒，革命仍在进行！在没有书店再敢出版左翼书籍的情况下，由宣侠父筹资，他创办了左联唯一的出版社“湖风书局”。他从“文总”抽调大批进步文艺人才支援夏衍、田汉开辟进步电影战线。他自己也开始参加电影创作。他写的《铁板红泪录》和《中国海的怒潮》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表现农民拿起武器进行斗争和第一部反映渔民反帝斗争的电影。阳翰笙说：“革命的需要就是我的事业”。

1932年2月，阳翰笙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书记和中共上海执行局文委书记，同时兼任“文总”党团书记。阳翰笙肩负起了文化界党的领导重任。左翼文化运动在鲁迅和瞿秋白的指引下，在阳翰笙等人具体的组织领导下，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冲破了蒋介石反动政府残酷的文化围剿，形成了一支旗帜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生力军。许多左翼文化

人,在后来的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以及建国时期,都成为党的得力的文化干部。

身遭软禁斗志坚

1935年初,上海地下党组织遭破坏,阳翰笙等一批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者被逮捕。3月18日夜,阳翰笙与田汉同镣同铐被押送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囚禁。阳、田被捕后,上海地下党努力设法营救。国民党逼害著名文化人的倒行逆施受到社会各界的指责。柳亚子、蔡元培、邵力子等社会名流愿意出面为阳保释。国民党迫于外界的压力和当时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政治形势,将阳翰笙由囚禁改为软禁南京,家属被接来作为人质。

阳翰笙在两年半的软禁逆境中,虽在暗探特务的包围和监视下,但始终坚定机智地用自己的笔进行战斗。他与地下党取得了秘密联系;他在南京唯一民营的《新民报》上,以他人的名义出面开辟副刊《新园地》,自己用各种化名一连发表了《养狗篇》、《打狗篇》、《辨奸论》等40多篇匕首式杂文,矛头直指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和各色投降主义分子。他在“编后”里号召大家都来参加“打狗”,由此在《新园地》上掀起了一场著名的“打狗运动”。

他仍然继续创作电影剧本,呼吁抗日救亡。《生死同心》、《夜奔》,经上海进步影人拍摄放映,引起社会轰动。针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和签订对日投降的“何梅协定”,阳翰笙又以话剧为武器,创作了痛斥汉奸的话剧《前夜》和鼓舞抗日锄奸的话剧《李秀成之死》。“七·七事变”国共合作,国民党宣布释放政治犯,阳翰笙才获得自由。阳翰笙这段历史,党组织当时就作了审查,当即就恢复了他的党的组织关系。

统战堡垒“第三厅”

阳翰笙获得自由后,到武汉报到。周恩来和他谈话,安排给他两项重要任务。一项是迅速切实地组织文艺界的抗日统一战线,以扩大救亡运动。阳翰笙因势利导,力争主动,不失时机地在很短时间内,以原左翼文化力量为基础,广泛地团结了文化界各方面人士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

会”(简称“全国文协”),以及文艺界各界的抗敌协会。这些协会,特别是老舍自始至终艰苦撑持了八年之久的“全国文协”,在复杂的政治环境里,发挥了团结抗日力量、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的积极作用,并且成为民主运动的一个据点。

周恩来安排给阳翰笙的另一项任务是协助郭沫若筹组第三厅,这项任务就复杂艰巨得多了。

抗战初期,蒋介石迫于形势不得不做出一点国共合作的姿态: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内由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主管下属第三厅,邀请郭沫若任第三厅(宣传厅)厅长。国共两党在政府机构中控制与反控制的激烈斗争,集中在第三厅的组建工作上。阳翰笙奉命参加长江局有关建立第三厅的一切会议,讨论策略,与郭沫若一起出席参加一系列与国民党针锋相对的谈判斗争。他依靠原左翼文化运动的骨干、沈钧儒领导的“救国会”以及“东北救亡总会”的力量,将各方面的爱国进步人士团结在中共周围,出色地完成了第三厅的组建任务。1938年4月1日第三厅成立,郭沫若任厅长,阳翰笙任主任秘书。第三厅内的共产党组织是绝对秘密的。周恩来、郭沫若、阳翰笙、杜国庠、冯乃超、田汉、董培谦成立特别党小组,周恩来任组长。三厅其余党员成立特别党支部,冯乃超是第一任支部书记。党支部与特别党小组之间不发生直接联系,全体党员单线联系。

阳翰笙、田汉等在周恩来的亲自主持下,利用三厅的合法政权组织成立了10个抗敌演剧队和四个抗敌宣传队,深入到全国几个战区的军队中去,还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战地文化服务站”,在前方和后方进行了广泛的抗日救亡的宣传和统战工作,使三厅成为在国统区领导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核心堡垒。

在白色恐怖下战斗

1939年,国民党推行反动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先后三次迫令三厅人员加入国民党。郭沫若、阳翰笙带领三厅全体进步人士愤而集体辞职,以示抗议。蒋介石为了防止这批文化人去延安,就提出设立非政权性质的学术研究机构——文化工作委员会,但中共决定不放弃这一合法的斗争阵地。周恩来说:“挂个招牌有好处,

我们更可以同它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展开我们的工作。”郭、阳等人受命组建了文工会,郭沫若任主任,阳翰笙任副主任。在党的领导下,文工会吸收了比三厅更广泛的进步文化人士,开展了多种多样的社会文化活动,推动民主运动,特别是组织和发动了有数百文化名人签名的《文化界时局进言》,提出要求建立联合政府、停止特务活动、释放一切政治犯和爱国青年、枪口一致对外等六点政治主张,受到社会热烈拥护,使蒋介石反动派惊恐万状。文工会成为团结广大爱国进步人士的重要活动基地,积极宣传中共“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被誉为“第二红岩”。

1941年“皖南事变”后,得到周恩来同意,阳翰笙建议在白色恐怖下的重庆组织“中华剧艺社”。剧艺社成立后演出了旨在斥责蒋介石“同室操戈”的《屈原》、《天国春秋》等震动山城的话剧;完成了《前夜》、《塞上风云》等七部大型话剧及《八百壮士》、《日本间谍》等电影剧本。这些充满革命激情的作品,紧密结合了革命斗争,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在解放战争的三年里,阳翰笙团结了各方面的力量,在上海建立了中共在国统区唯一的电影制片机构——“上海联华影艺社”,后改组为“昆仑影业公司”,阳翰笙担任编导委员会主任,领导全体人员克服重重困难,拍摄了《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及阳翰笙编剧的《万家灯火》等优秀影片,他还创作了电影剧本《三毛流浪记》。这些电影作品成为推动国统区民主运动的一股强大力量。同时,在中国共产党众望所归的影响下,由于阳翰笙的统战工作,为新中国的电影事业保留了一大批宝贵的电影人才。

鼎力呵护百花园

江青一伙千方百计要整倒阳翰笙,当然不仅是因为阳翰笙在文艺界的群众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威信,还因为自开国以来,阳翰笙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坚持党的正确方针政策,在文艺界尽可能地抵制“左”倾路线的危害。

解放以后,阳翰笙曾多年任周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并长期是周总理和文艺界密切联系的纽带。

阳翰笙自己是搞创作的,十分珍爱文艺人才。他在全中国文联担任党组书记的十年里,为文艺人才体验生活、艺术实践、提高政治艺术素养等创造条件,作了大量的工作。

解放后多次政治运动是从文艺开始的,文艺界成了重灾区。阳翰笙作为老党员,看到厄运将落在文艺家们的头上时,总是不计个人得失,顶住“左”的压力,力所能及地保护文艺人才不受伤害。

在揭批所谓“胡风集团”的运动中,著名老文艺家老共产党员阿英蒙冤遭隔离审查。当给阿英枉加罪名的审查结论送到阳翰笙面前时,阳机智地转呈陈毅副总理审批(因为阿英在新四军工作过),果然不出所料,陈毅当即写了“阿英是好同志”的批示,使阿英免遭劫难。

贺绿汀是文联副主席,反右时,文化部代部长钱俊瑞两次找到阳翰笙征求意见说:“看样子,贺绿汀是保不住了,上海坚持要把他打成右派。”阳翰笙一再坚持地说:“绝对不行!老贺这人我很了解,怎么能将他打成右派呢?《游击队之歌》还唱不唱?”后来又有中央领导同志干预,贺绿汀才未被打成右派。

吴祖光被发配到北大荒后,阳翰笙去探望新风霞。当他得知新风霞因为不肯离婚,剧院竟给她戴上了右派帽子,禁止她上台演出。阳翰笙十分气愤,他向周总理报告了新风霞的情况。不久,新风霞被摘了右派帽子,恢复了级别,又上台演出了。

有些人他无力保护时,就以沉默对待。在批斗所谓“丁陈反党集团”时,阳翰笙在批斗会上始终保持沉默。会议主持者知道他是丁玲的入党介绍人,写条子指明要他发言,他始终一言不发,以严峻的沉默表示对此类“批判”的愤懑。

阳翰笙曾受到党内通报:“中国文联党组织严重右倾。”他依然顶住压力,尽力保护文艺家。

1957年阳翰笙主持文艺界各种鸣放会。他认为有些即使是牢骚话,也可以帮助改进工作,绝不是向党进攻,不是存心反社会主义。开始反右后,上级要根据鸣放材料给人定性。他感到形势严峻,叮嘱有关工作人员,除非报上已经点了名、有关单位来调材料的之外,所有鸣放会上的记录,一律不要外泄,从而保护了一批发言激烈的同志。

反右后,在文艺界一片沉寂的形势下,阳翰笙

组织了14期气氛宽松以谈心为主的小型读书会。被邀请参加的人,老、中、青都有,包括一些背着“历史问题”包袱的人和15位才华出众的所谓“右派”。阳翰笙对他们说:“请大家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通过学习,在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大家团结起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希望大家结合实际,边学边议,畅所欲言。我郑重宣布: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阳翰笙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读书会给文艺家们提供了学习和交流思想的机会,他们感到温暖,受到鼓舞,大大激发了工作的积极性。

砥柱中流迎恶浪

最激怒江青一伙的,恐怕是“广州会议”。

1961年阳翰笙参加了周总理领导下酝酿已久的“文艺十条”的讨论和制定。这是针对开国以来文艺领域里一系列“左”倾观点和错误认识制定出来的文艺工作条例。这年秋天阳翰笙在大连的时候,怀着兴奋的心情,积极向辽宁师范学院全体师生和大连话剧团分别传达了“文艺十条”的内容。他联系实际阐述了对“双百方针”应有的正确理解;批评了把文艺等同于政治的“左”的错误;指出混淆政治问题、思想问题、艺术问题界限之危害等等。遗憾的是,中央虽然于当年6月颁布了“文艺十条”,但随即受到“左”的思潮的干扰,未能贯彻下去。

1962年3月,在周总理领导下,在广州召开了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会议(即“广州会议”)。阳翰笙受命负责筹备和主持会议,任会议党组书记。这是一次批判“左”倾错误,促进创作繁荣的大规模会议。

会上周恩来作了重要讲话,他宣布给广大知识分子“脱帽”(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冕”(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会场顿时掌声雷动,许多人热泪盈眶(剧作者代表中许多是所谓犯过错误,受过批判或者被划为右派的)。阳翰笙在会上作了《为繁荣戏剧创作而努力》的讲话,总结了“左”倾思潮束缚创作繁荣的十条框框。他鼓励剧作家对于“错误的粗暴批评”“要敢于顶住”。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阳翰笙的讲话录音在知识界、文艺界播放,受到热烈欢迎。

在广州会议上制定了“文艺八条”,比起“文艺十条”来虽然有所退步,但是突出了“双百方针”,仍然是可喜的。

广州会议以后,阳翰笙、老舍、张庚、曹禺等一行经福建——浙江——上海,一路上传达和贯彻广州会议精神,阳翰笙的心情非常舒畅。但是到上海以后,阳翰笙得知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严密封锁了广州会议上的讲话,一概不准传达。阳翰笙冲破阻力,与正在上海的江苏话剧团座谈了整整一天,传达广州会议。

在广州会议精神的鼓舞下,戏剧创作和京剧现代剧改革都达到了高潮。但是,正当文艺创作呈现出勃勃生机之时,乌云已经聚集在上空……

就在广州会议半年之后,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存在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此后,毛泽东又作了多次的批示和谈话。随着文艺、学术、教育领域批判的加紧,整个知识分子队伍的大多数再次被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此“广州会议”被打成了黑会。

毛泽东对文艺界的两次批示,特别是1964年批评全国文联和各协会“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使文艺界立刻笼罩在人人自危的紧张气氛中,阳翰笙更是感到泰山压顶。当时他认为,毛泽东的话总是正确的,自己想不通,是自己思想跟不上。他苦苦检查自己的工作,认真地进行整风,他再次要求到农村去深入生活,加紧改造世界观。

这时他尚感欣慰的是,正在上映的《北国江南》受到群众的普遍好评。他写“北”片是认真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深入农村,体验生活,怀着极大的热情反映了农民改变落后面貌的冲天干劲。他着力通过各种矛盾刻画出了几个活生生的人物。而且他认真听从毛主席要抓“阶级斗争”的指示,在电影里编进了阶级敌人搞破坏的情节。可是他万万没有料到,恰恰就是这个《北》片,被康生当众打成了反党大毒草。

1964年7月30日,阳翰笙正坐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总结大会”的主席台上,在周扬做完总结报告以后,康生站起来突然当面向阳翰笙发难,恶狠狠地说:“你们看今天的《人民日报》了吗?《人民日报》对《北国江南》批得好!《北国江南》的女主角共产党员是个瞎子,这就是

骂我们共产党是瞎了眼的!”阳翰笙非常吃惊,全场也为之悚然。阳翰笙当场要求发言,但是被阻止了。

阳翰笙对康生的为人,是有看法的,广州会议前康生在预备会上口口声声反“左”,但后来却出尔反尔,这次他批“北”片也显然是恶意攻击。但问题的关键是批判文章由《人民日报》发表,并加了编者按语。联系到前不久毛主席对文艺界的批示,阳翰笙认为批《北》片显然是中央的意思,所以他十分痛苦。他在日记里写道:“我一片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竟受到这样严厉的批评。只能怪我的创作思想有问题,怪我的思想改造得不彻底。”于是他又苦苦地从自己身上找差距。一个在国统区复杂尖锐的对敌斗争中机敏警觉的老共产党员,出于对毛主席的信任和崇敬,竟然如此天真,看不到党内正在酝酿的诡谲风云。

一时间,一起遭到批判的还有夏衍扶持的《早春二月》、田汉的《谢瑶环》。批“北”片的文章铺天盖地而来,竟达500篇之多,扣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的帽子。后来江青自己说,这场批判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更险恶的厄运正向阳翰笙扑来。

九年图圉志弥坚

1966年6月,中国历史上一场空前的大劫难席卷神州大地,阳翰笙失去了人身自由。他先被关进“牛棚”,每天几场拉出去挂牌示众,低头弯腰“喷气式”,挨斗、挨批、挨打……后来被关进卫戍区,最后被关进秦城监狱。田汉、阳翰笙专案组直接归江青管,连到医院看病都必需由江青批准。康生、江青为了将这位在周恩来手下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共产党员打成叛徒,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指使专案组里的爪牙,对阳翰笙拷问、毒打,每审必打。阳翰笙的身体受到严重摧残,耳骨被拧断,牙齿被打落,吐血、便血……致使终生残疾。专案组还连续几昼夜地实施车轮战术,折磨得他奄奄一息,昏迷不醒。但是阳翰笙的头脑是清醒的,他绝对不说一句不实之词,也绝不在捏造罪名的审问记录上签名。据有记录可查的档案统计,共审问了101次,没有一次有他的签名。1966年冬,他在私下里写的《哭老舍同志》的诗句中慨叹:“笔

力纵横举世钦,竟遭魑魅血口吞;文坛愤洒伤心泪,敢信擒妖必有人。”诗中的“魑魅”、“擒妖”,说明他已经看到是江青一伙在大搞政治阴谋。阳翰笙深知江青30年代的底细,及其心狠手辣的为人,解放后她兴风作浪的所作所为已经表露出她的私心和野心。特别是江青诬蔑解放以来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阳翰笙知道江青是想置他于死地的。但是阳翰笙顾不上考虑个人性命之叵测,他担忧的是国家的命运,伤心的是文艺界所受的摧残。他独囚狱室,四面徒壁,无纸无笔,只有在心中叹息:

滚滚洪流荡九州, 惊雷轰坠百花楼;
鳞伤遍体医何在? 碎叶残枝惹人愁。

(1969国庆节)

他在狱中度过了70岁的生日。江青一伙连续六年的残害并没有能摧毁一个老共产党员的信念和意志:

《七十自寿》

七十人生今不稀, 青松愈老愈雄奇;
铁窗久系心难系, 遥想当年入党时。

(1972年)

1974年,被监禁了8年之久的72岁的老人,疾病缠身,半身瘫痪,但是他忧愤的仍然是国家的命运:

忠良逐杀英豪死, 大地沉沉万马喑。
八年浩劫山河泪, 扭转乾坤岂无人。

林彪事件后,许多干部被陆续解放,一些被发配到外地尚存人间的老干部也陆续回到北京。但是对“四条汉子”,江青却批示“长期关押”。阳翰笙受疾病折磨,生命岌岌可危。江青为了“留个活口”(田汉已被折磨致死),才批准送往医院。

1975年春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被关押了九年的阳翰笙才得以被释放出狱(还未平反)。1975年7月12日他跨出了监狱之门,但是他愤懑的心情并没有因此而变得轻松。他想到灾难深重的国家,悲怆地仰天喟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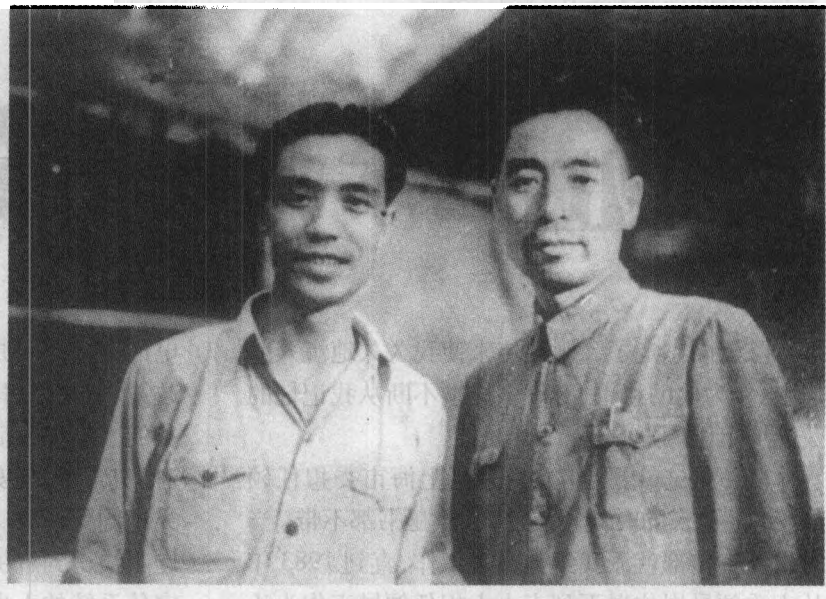
九死一生脱牢笼, 十年面壁愤满胸。
昂首敢向长天问, 因何如此灾难重!

(1975年7月12日)

阳翰笙出狱后,首先打听周总理的情况。当他得知周总理为力挽狂澜,心力交瘁,已重病在身,但还日夜为国事操劳,他痛心极了。一场“文革”

隔断了他们几十年的师生战友情，又剥夺了他再见到周总理的愿望，他只有默默地祷念总理早日康复。周总理在百忙之中，在病榻上也惦记着阳翰笙的安危。1975年9月8日，周总理已病势沉重，还特地嘱咐秘书将阳翰笙要求平反的信件交给当时已全面负起领导责任的邓小平处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颖超同志三次催问阳翰笙的平反问题。最后在胡耀邦的大力支持下，阳翰笙长达14年的冤案终于在1979年2月获得彻底平反。



1941年阳翰笙（左）在重庆与周恩来合影

青松愈老愈雄奇

平反后，恢复阳翰笙全国文联副主席和党组书记的职务，并担任第四次文代会筹备小组副组长，全国政协增补他为政协常委。后他又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他久被禁锢的革命热情又迸发了出来，他曾写下“几经生死几安危，赢得今朝半残身；曙光在前驱暗夜，决把残生当新生”的誓言。现在更是发出豪言壮语：“人生八十岂云老，欲上征途更险峰”。

阳翰笙平反后首先着手筹备田汉追悼会。田汉是文艺界最先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同志。在1975年秋，阳翰笙被专案组定为敌我矛盾第一次被允许向党中央申诉时，他就为田汉的“叛徒”罪名喊冤。他说：“我现在还活着，而田汉已经死了。田汉在南京演戏的实情，我最清楚。我不替他伸冤，谁替他伸冤！”1979年4月25日举行了田汉追悼大会，大会极其隆重热烈。国家领导人都送了花圈，宋庆龄亲自出席，廖承志主持会议，茅盾致悼词。排队等候吊唁的群众人山人海，大家为亡灵获得昭雪、正义得到伸张而欢欣。《人民日报》报道了追悼会的消息，并登载了阳翰笙抱病通宵达旦修改定稿的长篇祭文《痛悼田汉同志》。

阳翰笙自出狱后尚未平反前，还不断地为“文革”中遭受不白之冤的同志写证明材料。

他发现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部门及某些工作单位，一点也不了解解放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政治部“第三厅”、“文化工作委员会”，以及“抗敌演剧宣传队”、“中华剧艺社”、“昆仑影业公司”等机构和单位，都是在国统区由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文化界的统战基地和组织，以致无知地否认许多同志的革命经历，甚至将某些同志打成历史反革命，阳翰笙为此心焦如焚。一位老文联干部杜继昆回忆道：“那时翰老刚获释不久，在病中发着高烧。我扶着他在雪夜里，为原上海昆仑影业公司吴茵等一些尚未落实政策的同志，去找电影局季洪同志（原“昆仑”财务负责人）。我深深感觉到，翰老是要在他有生之年，赶着为所有有关同志落实政策拼老命去奔走。在雪地里，翰老穿一件蓝卡叽布面大衣，脚着塑料底布棉鞋，一步一滑。他拉着我的手，手烧得滚烫。我搀着他在雪夜里步履艰难地爬楼，蹒跚而行。这一情景，使我终生难忘。”经过阳翰老的各种努力，不断地写报告、写证明，终于确立了这些单位的革命团体性质，落实了好几百人的革命工龄。

阳翰笙迫切地感到，文艺界像他这样经历了整个中国革命文艺发展历程的老人不多了。文化战线的很多情况眼下唯有他了解，所以他决心写回忆录。他抱病写的几十万字的重要史料，受到中组部等有关部门的重视。不但成为解决一些同志的历史问题的依据，而且还纠正了某些人对周恩来同志领导下的国统区文化战线斗争所持的不正确看法。

（责任编辑 程 度）

陈沂：凡来找我的都不拒绝

● 刘国尧

陈沂同志走了，噩耗传来使我久久地沉入悲痛中。作为他的秘书，有许多往事不断从我记忆的荧光屏上闪闪发亮。

陈沂同志 1979 年 6 月来到上海市委担任领导工作。他来的时候轻装一人，连秘书都不带。当时市委宣传部就派我到他身边工作，直到 1983 年从市委领导岗位退下到市人大担任领导工作为止共五年时间。然后，我便离开他到另一个单位去工作。现在回忆起来这是个极不平常的五年，令人终身难忘。众所周知，陈沂同志是经过长期革命考验出生入死的领导干部，1957 年后遭受长达 21 年的不白之冤。党的三中全会之后重新走上新的领导岗位，他意志坚定而精神焕发，勇于面对现实，不回避矛盾。尤为难得的是他十分体察民情，关心群众，平易近人。有这样几件事，足可以管窥全貌。

首先是他一到上海，风尘未净，就马不停蹄、席不暇暖，满腔热情地走访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和理论界的许多老同志，结识新朋友，听取他们的意见，了解他们的疾苦，倾听他们的呼声。当时有不少老同志居住条件很差，他就把车停在大路上，然后步行登门拜访，有时还爬上摇晃的楼梯，在小屋内促膝倾谈，使不少老同志十分感动。与此同时，他放弃休息时间，不分昼夜接待络绎不绝的来访者，他亲自关照门卫：“只要我在家，凡来找我的就不要拒绝，请他们进来。”由于他的真心诚意接待每一位来访的人，一时在上海传为美谈。他对我说：“平头百姓，一般干部，要见省市党政领导倾吐委屈，不容易呀！在这方面，我是过来人很有体会。如今，我当了领导，决不能高高在上。和平民百姓保持血肉联系，尽可能帮他们排忧解难，这是党的好传统啊……”每天他都接到许多来信，每信必过目，需要批示的立即作出批示，迅速转有关部门办理，并要我每周向他汇报下面的执行落实情况。当他知道有些事情落实较慢，他马上就拿起

电话直接询问原因所在。有一位老作家，虽已落实政策，但其住房仍被拖占不还，严重地影响这位作家的工作和生活。他要我通知有关部门：街道政府、房管所、公安派出所的领导，就地开会，当场研究把问题解决。因为他的直接干预，拖而不决的问题很快得到解决，使这位老作家十分感动。后来非宣传系统的人也纷纷给他来信反映情况、倾诉委屈。我向他建议：可否由我先对来信的轻重缓急分个档次，有的可以转到别的系统去处理。但他还是坚持，有些信还要亲自过目，该批的他还是提出自己的意见。他说：“写信人的心情我是很能理解的。再说，我也可以更多了解一些情况。”

他到上海以后特别重视对青少年的教育和培养，他建议市委成立青少年教育领导小组。他首创“振兴中华”读书会、上海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他是这些组织的首任领导。他总是亲临第一线，深入实际开展工作。有一次他碰到市少教所的负责人，向他了解当前这些青少年的思想动态和犯错误的情况，并且表示约个时间，他要到少教所去面对面地给他们讲话。我记得在去少教所的路上，陈沂同志和我研究，见面时怎么称呼他（她）们。他琢磨再琢磨……到了少教所一走进会场，气氛十分沉闷，有些人低着头，有些人拉着长脸，有的人显得木讷而面带愠色。但当陈沂同志第一句话——“孩子们”一出口，沉闷的气氛马上打破，会场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一个个的脸上马上起了变化。这一称呼一下子缩短了彼此之间的距离。我看见有不少青少年眼睛里噙着泪水，聚精会神地听着陈沂同志对他（她）们语重心长的讲话。是的，他不是以市委书记的身份而是以家长 and 老前辈的身份和这些一时误入歧途的青少年娓娓而谈……从这些细微处，可以看出陈沂同志对青少年教育问题的一片苦心。

有好多次，他还去上海几所大学，针对当时的



陈沂在上海寓所

一些热点问题向大学生作演讲。他那坚持真理、实事求是、深入浅出的演讲风格,受到大学生们的欢迎。有一次他到复旦大学讲话,一破惯例,讲完之后不从后门走而是从讲台上走下台阶,穿过大学生的人群。于是,大学生们又围了上来和他对话。他站在人群中又和大学生们讲了半个小时。那场面,那情境,既热烈又亲切。

老年人的知心朋友和精神伴侣

欢迎订阅 2003 年《老人天地》(月刊)

本刊为全国综合性老年月刊,光明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办,于 1983 年由离退休老同志为主体创办。本着“社会关心老年人,老年人关心社会”的主旨,重视宣传党和国家老龄工作的方针政策,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内容丰富多彩,文图并茂。

应老年读者要求,从 2002 年第一期起已改大开本(大 16 开),适当扩大版面和容量,版面进行一定改进,内文改用 55 克优质书写纸。

2003 年定价为 每期 3.50 元
半年 21.00 元 全年 42.00 元

邮发代号:2-290

请到当地邮局订阅或向本刊邮购

帐号:北京工商银行王府井分理处 046005-10

地址:北京东四六条 45 号方圆写字楼

邮编:100007

陈沂同志对党组织建设,特别是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十分重视,他曾提出党要管党的“三要”:一是要管,二是要敢管,三是要管好。他以身作则,亲自到工厂讲党课,重点是讲怎样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他去一家国营大纺织厂上党课,不抱本宣科,在上课之前召开座谈会,倾听基层干部的意见和党员群众的呼声,然后再有的放矢地讲。不生硬,不说教,活泼、具体、切入实际。讲完了还要听取反映和党员群众的意见,而后集中起来再去讲。就这样,他一共去讲了三次,在厂里工人、干部中,得到比较好的反映和效果。因为工作太忙。要不,他还要到其他工厂去继续讲党课。

他平时严以律己,生活极为简朴。我左右不离跟他五年,不论到哪里,他一不抽烟,二不饮酒,吃饭也很简单,老习惯是喜欢辣椒炒肉,或者是吃一点地道的宫保鸡丁。饭后惟一的嗜好是吃一点水果,仅此而已。他经常说“节俭兴邦,奢华败德。比起工人农民,我们的生活已经不错了。”他一身清廉,除了应得的薪俸和稿费收入,他几乎是一无所有。在他身上的这些高尚品质,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责任编辑 程 度)

欢迎订阅

中老年保健

不断提高中老年人的健康生活水平是我们时刻关注的课题。

《中老年保健》杂志由卫生部主管,中日友好医院主办,设置“专家谈保健”、“杏林医话”、“药物园地”、“心理咨询”、“自我保健”、“饮食与健康”等 20 多个栏目,特约著名专家学者撰稿,及时介绍国内外最新的医学保健知识。

月刊

每期 3.50 元

全年 42 元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樱花园东街 2 号

中日友好医院内中老年保健杂志经理部

邮编:100029

电话:64206649

邮发代号: 82-221

我们需要再反一次党八股

● 潘家铮

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指出，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并具体化为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其中特别指出要反对因循守旧、反对照抄照搬的本本主义、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可谓切中时弊。政府也在下决心解决文山会海问题。我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再反一次党八股。

60年前，在延安进行整风，整顿文风是内容之一。毛主席还为此写了著名的文章《反对党八股》（以下简称“毛文”），文风为之一正。不幸“毛文”发挥作用的时间好像不长。新中国成立以来，文件愈来愈多，愈来愈长，愈来愈正规，一直演变成文山会海。每一次政治运动都要搞大批判，都需要大部头文章，“文革”时更达到顶峰，党八股就复活甚至“发扬光大”了。而且由于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党八股也随之发展为政八股、社（会）八股，流毒全国，像一座大山压在人们的身上心上，难以招架，无法摆脱。不反掉这新的党八股，要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是无从谈起的。

新八股的内容与老的党八股一脉相承。当然，在新的条件下其表现形式也“与时俱进”，有些创新，但万变不离其宗，最主要的本质就是连篇累牍塞满空话、废话、套话、大话，缺少实实在在的见解和新意。这种文章，好像患了浮肿病的人，看个子，脸圆体胖，但毫无力气，做不来任何事。又如注水猪肉，把水分挤干后，不仅干瘪难看，而且味如嚼蜡，难以下咽。

“长”是新八股的通病。文章动辄上万甚至几万字。作者的目的只有一个，使人读了后面忘了前面。“毛文”中说，斯大林在德苏战争爆发后

发表的演说是很短的。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可以谱成一首歌，唱会歌也就记住了内容。鲁迅先生要人们在写好文章后至少再看两遍，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去掉。这些优良传统现已荡然无存，甚至是反其道而行之，尽量把各种形容词、副词以及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塞进文章里去。我建议作者们今后写作时，先想一想，如果要把尊作谱成一首歌，应该如何写，然后再下笔。

内容少而文章长，就只能尽量写些套话和废话凑数。八股文是有一定格式的，按格式套进去就成。新八股也一样，文章开头总是“三下”（或“四下”、“五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政府的积极支持下，在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助下。……生怕漏掉一个“下”，得罪一方土地。有人在报屁股上总结过“套话大全”，曰：开会没有不隆重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工作没有不扎实的，效率没有不显著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人心没有不振奋的，班子没有不团结的，群众没有不满意的——其实套话何止这些，这14条只能说是“套话精华”或“套话提要”罢了，远远称不上大全。文章中塞满这些套话，读后除使人腻歪外，是会产生其他感受的。

有的作者大概对“反右”、“文革”尚有余悸，生怕被戴上给社会主义抹黑的帽子，所以处处要“一分为二”，要“分清延安西安”。哪怕是批评社会不正之风，前面总得来一大段正面表扬的大文，一定要在描述了成就如何伟大以后，再转到“还必须清醒地看到”什么什么。一分为二当然是真理，但用在这里就有些莫明其妙。把成

绩说得如此之大,岂不要影响人们之清醒?有时为了一分为二,搞得逻辑混乱。前面说,缺点是局部的,问题只发生在极少数人身上,后面又说“蔓延成风”,“要亡党亡国”,怎么也拼不到一块。我不是说文章里不能一分为二,如果是中央文件、政府报告,一篇全面总结或综合评述性的文章,当然应把“成绩说够、问题讲透”,但并非要千篇一律。如果写文章的目的是揭露时弊,就应开门见山,刺刀见红。哪有医生写诊断书时先肯定病人身心如何健康,然后再转到“也要清醒地看到肺里长着个肿块”的?

八股的又一特色就是“毛文”中所称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似乎一篇文章中不面面俱到,便不够完善。当然,新八股在开中药铺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它已不满足于甲乙丙丁抽屉式的排列,而发展为若干光环,环环相扣,有些像奥运会标志,只是更为复杂而已。例如,在许多文章中,我们常会看到下述十分类似的提法:要以某某为指导,某某为基础,某某为动力,某某为保证,某某为目标,某某为中心……首先写出这种话的文章颇有新意,如篇篇如此,又成套话,而且环环越来越多,全则全矣,只是令人读后摸不着头脑,弄不清这许多指导、基础、动力……之间是个什么关系?万一“指导”与“基础”有矛盾,“目标”和“中心”不相容,又该如何处理,是不是有个“优先律”?在实际工作中如何落实?说穿了,这还是在堆砌辞藻,玩弄文字游戏,文章写好,任务也完,并不打算真正去干的。

借势压人,言必称希腊,这也是党八股的惯技。此风至今不戢。在不长的文章中也要处处引马恩列毛的话,而缺少自己的主见。在过去,这样做还能起些威慑作用,因为那时凡是圣贤之言都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辩驳不得。但时至今日,大家都已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不是宗教。马克思主义要与时俱进,圣贤讲过的话——特别是片言只语,不一定都对,有一些话可能根本不符合当前实际。那么在文章里引述那么多的圣贤语录,读的人还得先考查一下,这些话是属于至今适用的原理,还是已经过时的教条,岂不费事?也起不了震慑作用。我也不是说写文章就不能引用前人的话,在合适的地方引用几句经过考验证明是正确的古人名言,确有画龙点

睛之妙,但万不可靠它来压服别人。如果认为自己言之有理,尽可理直气壮地发挥,何必非拖个古人来帮忙呢。

有人说,你这么起劲地反对新八股,想来所写文章一定是尽除陈腐的了。当然不是这样,多少年来,我写的东西可谓多矣,文章也好,总结也好,报告也好,同样废话套话连篇,甚至可选为八股范本。这不是我心口不一,我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哪能不食人间烟火?写文章总想发表,写总结总得大家鼓掌通过,社会风气不改,我何能例外,何况有的文章还可按字数得稿费。但正因为我是写八股老手,才从心底里讨厌它、反对它。我要大声疾呼,不要小看它,这怪物非常可怕,现在已盘根错节,势盛力大,要动摇它谈何容易。但容忍它发展下去,将禁锢人们的思想,耗干人们的精力,折磨人们的心灵,拖延前进的步伐,浪费无法计数的时间、物力和人才,文山愈高,会海愈阔,祸国殃民,莫此为甚,最终将影响民族振兴大业。是以斗胆陈言,愿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责任编辑 程 度)

欢迎订阅《炎黄纵横》

《炎黄纵横》是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省侨办、省侨联联合主办的综合性文化刊物。是以弘扬中华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为宗旨,有鲜明的闽、台、侨特色,可读性、忠实性强。

本刊国内外公开发行,刊号:CN35-0054/Q。需要者可直接汇款到本社发行部订阅。国内全年(6期)订价24元(含邮寄费);港、澳、台地区全年订价12美元,国外全年订价24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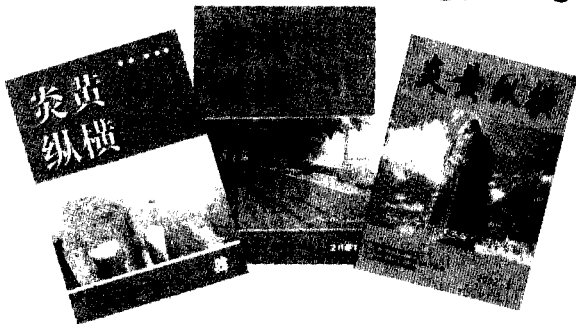
炎黄纵横杂志社

地址:福州市柳河路18号

邮编:350001

电话:(0591)3718304

炎 黄 纵 横



恩格斯勇于否定自我

● 冯东书

《炎黄春秋》2002年第7期吴江老师写的《重新找回马克思》一文,引了恩格斯1895年3月6日为马克思著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注一)一书写的导言中的一段话,使人很受教育。这段话是:

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雾,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965年人民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595页)

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思想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经济发展状况还远远没有成熟到可以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这个经济革命自1848年起(1848年正是《共产党宣言》问世的一年)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初次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把德国变成了一个真正第一流的工业国——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有很大的扩展能力。(《炎黄春秋》印刷中引文页码有误,应为引文同上,597—598页,不是697—698页)(注二)。

恩格斯和马克思是一起在1848年共同写作著名的《共产党宣言》的人,他在《共产党宣言》发表47年后,研究了欧洲新的发展,对自己过去的一些重要观点作了反思,勇敢地作了自我否定。他本来是伟大的人物,这种求实的态度就显得更伟大了。

如果我们把1978年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改革,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以及苏联和东欧各共产党执政国家发生的变故,与

恩格斯讲的话联系起来细细琢磨,就可以发现恩格斯讲得多么有预见性!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提出要剥夺资产阶级的一切生产资料,消灭私有制。经过47年工人运动的实践,恩格斯却说确立了大工业的“欧洲经济发展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说“这个基础(资本主义基础)在1848年还有很大的扩展能力”,说“我们(他大概至少是指他自己和马克思)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思想的人,都是不对的”。吴江在文章中还说,恩格斯特别说明,1848年2月在巴黎所宣布的“社会革命”带有浓厚的冒进色彩。

多么巧啊!我们不是在1956年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全国基本上完成了对私人工商业、个体手工业者和个体农民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宣布基本上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市场经济、消灭了市场竞争以后,现在又在改革中恢复发展民营经济了吗?不是在“合作化”、“公社化”二十几年后,又不得不按农民的要求,把土地分开,承包给农民,让农民自主经营了吗?这不是正好说明,恩格斯说的社会“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是多么正确!我们不这样改革行不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看看全世界哪一个坚持走苏联模式的国家是行的?彻底消灭了私有制经济,也就消灭了市场经济,消灭了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文革”中甚至要“革私字的命”,要消灭“知识私有”,表面上“革命”得不得了,好像很平等,大家吃大锅饭,搞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连“按劳分配”都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还不是真正的平等。结果呢?使整个社会

经济发展失去活力,在“形势大好”的不断宣传中,问题却越来越多。我们中国要是没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等人起来勇于否定过去的“极左”做法,那全国人民现在还会在粮不够吃、肉不够吃、油不够吃、衣不够穿的境况中过穷日子。要不是改革以后,民营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外资企业的引进,有了市场竞争,我们的国营企业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危机感,不会下那么大的力气去进行技术改造和体制改革,整个社会也就不会像今天这样争着在那里学习新知识、新技术。没有这场大改革带来的经济、科技、教育的大发展,这几年也就谈不上有钱来修那么多高级公路、铁路、海港、机场、医院、住房、高科技开发区。要是老让人饿肚子,老在人民内部搞“阶级斗争”,那甚至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大问题。

恩格斯是107年前讲的这番话,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创造出苏联模式开始,到1978年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破除过去的迷信,进行大改革以前,60年的实践,证明我们走的是一条弯路。而中国大改革以后20年的实践,又证明了恩格斯的先见之明十分正确,证明了社会规律是最有权威的,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我们应从恩格斯的科学认识上和上百年正反两方面的实践中学到点什么呢?那就是我们永远也不要脱离社会实际,我们的思想一定要跟上社会实际的发展而发展,要与时俱进,及时地勇敢地否定自己过去认为很正确但在实践中证明行不通的观念。试想,我们如果真正走群众路线,尊重民意,不强制农民“自愿”搞“合作化”、“公社化”(如果合作社是在群众真正自愿的基础上搞,当然是可以的,那就只会有一部分人搞,不会全国都“化”),会给国家造成那么大的困难吗?革命是一场大试验,就是开始时我们按苏联农业集体化搞了中国形式的“合作化”、“公社化”,而实践证明效果不好,农民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包产到户”,要求自主经营,农业生产始终搞不上去,中央领导层里也不断有人反映农民的呼声。毛泽东早在1937年的《实践论》中就讲过“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既然这样,当时我们就应该尊重一下实践,不要用“阶级斗争”的大棒去乱打击意见不同的同志和群众,从实际出发,勇敢地否定一下自我,改过来,那该多好啊!要是那样,中国不

是能早争取到20年的大发展时间吗?

实际上,早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伊始,在没收了国民党的官僚资本,政府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以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领导人就曾向民主党派讲过新民主主义阶段要搞15年到20年。新民主主义是在国营经济发展的同时允许资本主义有一个发展的。要是当时能够言行一致,不就可以少走弯路,可以和夺取政权斗争一样,在实践中摸索出有中国特色的,不同于苏联模式的建设道路吗?当然历史不能假设。现在我们只能说,我们要吃一堑长一智,要学习恩格斯,以后我们的思想一定不要再脱离实际,一定要与时俱进,勇于在发展中否定自我。

注一:《法兰西阶级斗争》是《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零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简称。

注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共50多本,我国只在196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过一次。

(1981年我在中央党校学习,吴江是副教务长,给我们讲过课,所以他是我的老师,不是谦虚。——作者)(责任编辑 李文)

请订阅《海内与海外》杂志

《海内与海外》是中国侨联主办的社会性、涉外性、文化性综合月刊,国内外公开发行。主要栏目有:《本刊专稿》、《龙的传人》、《侨情大观》、《史海钩沉》、《华人社团》、《典型巡礼》、《出国指南》、《神州风物》、《域外见闻》、《蓝眼睛》、《大千世界》、《经济论坛》、《人间真情》、《艺坛之星》、《法律咨询》、《养生信箱》等。

阅读《海内与海外》,您将结识许多在海内外有较大影响的中华儿女,特别是著名的侨界政治家、科学家、文学艺术家、企业家等等;您可以观察世界各地华人华侨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现状和走向以及全国各地侨乡在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您可以了解华侨、华人的历史以及他们对祖国、对侨居国所作的贡献;您可以浏览唐人街风光、异域风情,开拓视野……

《海内与海外》是一本高品位刊物,是广大归侨、侨眷、侨务工作者、统战工作者和海外华侨华人必备的参考读物,也是社会上广大读者的益友。

《海内与海外》为16开本,72页,图文并茂,印装精美。定价:每册人民币4.80元,全年57.60元;海外订阅:港币15元,全年180元;美元2.40元,全年28.80元(均含邮费)。

本刊实行自办发行,请直接向本刊订阅。

汇款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新桥三条甲1号《海内与海外》杂志社;邮编:100007

电话:010—64056553

郭影秋临终口述： “文革”亲历记

● 郭影秋口述 王俊义整理

整理者前记

郭影秋(1909年9月—1985年10月)原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名誉校长,“文革”初期曾任北京新市委文教书记。他是一位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投身革命的老共产党人,也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学者和诗人,更是我十分敬仰的师长和前辈。我曾有幸协助他整理过回忆录,并为此于1984年5月至7月在其病榻前与之朝夕相处两个多月。此间,他曾抱病向我口述了一生的经历,从其童年时代讲到革命征战,直至“文革”时的遭遇。这次口述的内容曾于1986年出版过《往事漫忆》一书,但由于当时各种条件的制约,该书的时间下限仅至1957年,他辞去云南省省长到南京大学任校长为止。他已经口述过的此后的许多内容,特别是有关“文革”时一些鲜为人知的内情,都尚未整理与出版。现依据郭影秋的口述录音,将其在“文革”中的亲身经历,予以整理,公诸于世。

亲身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之后,我常常在思考,那场所谓的大革命,实际上是一场大恐怖、大灾难、大浩劫、大噩梦。其造成的恶果,对整个党和国家来说,几濒临党亡国毁的局面,对个人来说也常造成家破人亡的厄运。因而,无论是全党或者是个人,都应对之进行严肃的反思与总结,应当把当时的各种阴暗与丑恶,统统暴露在阳光之下,以使这种悲剧永远不再重演。好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

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对“‘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作了深刻的总结。《决议》明确指出:“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的内乱。”我个人在“文革”之初曾被中央调到北京市委担任文教书记,并代表华北局列席“中央文革小组”的有关会议,很快又被撤销职务,长期遭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可以说是“文革”初期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见证人。我想把自己当时的亲闻、亲见、亲历做些追忆,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说,也许人们还可从中取得某些借鉴。

一、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时, 我被调到北京新市委

记得是1966年5月初,当时我正在京郊海淀区苏家坨公社参加农村“四清”运动,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赵汉突然来找我谈话,开门见山便通知我说:“中央决定调你到北京市委做文教工作。”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决定,我毫无思想准备,略作沉思后,就对赵汉同志再三表示,请转达中央有关领导,最好免调。我当时申请免调的主要理由和内心的想法是:

其一,我从1965年9月便来农村“四清”,开始担任苏家坨分团党委书记,后来又任海淀区总团党委书记,当时这一带的“四清”运动,正处于收尾和总结阶段,工作确有些脱不开身。

其二,在乡下已经有大半年的时光,对于北京市委的情况不了解,也很少和城市里各机关接

触,消息不灵通。而当时的形势已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自从1965年11月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以来,形势急骤严峻,1966年初罗瑞卿已遭批判,接着批邓拓的《燕山夜话》、批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批彭真领导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起草的《二月提纲》,接着中央又批发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此后,报刊上又陆续发表了高炬、何明的文章,火药味都很浓,且都已明确指出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而且还要揪他们的“黑后台”,一场大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我对面临的形势吃不准,看不透,惟恐做不好新的工作。

其三,虽未向赵汉同志多讲,但却是最为重要的想法,是我不想离开人民大学 不愿离开教育工作岗位。就个人的思想深处说,我人生的理想和追求目标是愿作一个大学的好校长。我常常向人说:“我是个教书匠,我也乐意当教书匠,而不想当官。”但革命形势与党的工作需要,却长期把我推到党、政、军的领导工作岗位。所以,我曾在一首词中说:“学剑不成书误了,脱胎未净神难肖”,反映的就是这种心情。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我在1957年请求辞去云南省省长之职,而主动去南京大学当校长。还有1958年陈毅副总理希望我出任驻德意志人民民主共和国大使,我也推辞了。此外,1962年周总理也曾要调我到国务院做副秘书长(实际上是代替习仲勋同志做秘书长工作,因需在新一届人代会通过),我也婉言辞谢。此后,周总理又要调我到中国人民大学给吴玉章校长做助手,我才不得不到人大来,好在与南京大学一样,都是教育工作。到人大后吴老对我十分信赖,非常放手,而且对我的工作一再过誉和肯定,1964年2月10日他曾写信给我说:“学校的工作你来了以后,各方面都有健康地前进,我很满意。但你还缺少在群众中比较有威望的教务工作助手,这件事在适当时机总得要解决。”吴

老当时已88岁高龄,他对我确有知遇之恩,我不能放下人大的工作,也和对吴老的感情有关。再说到人大后这两三年,所做的主要工作还是擦屁股、处理各种遗留问题,如何把人民大学建设好,我已逐步形成了一些规划,还未及实施。

但不久,我的免调请示未被采纳,中央明确通知一定要调。这样,我不得不在5月中旬到北京市委报到。当时,中央正在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此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揭发批判和处理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问题。彭真同志领导的北京市委,已是众矢之的,呈现“人人自危,乱作一团”的局面,虽然尚未公布撤销彭真的职务,而实际上已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我报到后不久,李雪峰找我谈话,交待工作: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主管文教工作,同时兼北京市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并代表华北局出席“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有关会议,这实际上就是顶替邓拓那一摊子工作。在正值“文革”发动的形势下,文化部门,首当其冲,朝令夕改,瞬息万变,工作局面之复杂与艰险,可想而知,这实在是“受命于危难之际”。我一听自己将要承担的工作,顿时就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之感。但不管如何,既来之,则安之,也只能根据事态发展,凭借多年的党政工作经验,并随时请示汇报,因势利导,去开展工



郭影秋(中)陪同周恩来总理(右)和贺龙元帅(左)在云南

作。但事后想来,我当时的思想准备远远不足,对形势的复杂性更是大大估计不足。

我到北京市委不久,5月18日就发生了邓拓自杀事件。邓拓当时是中共中央华北局候补书记、北京市委主管文教工作的书记,他是党内著名的秀才,早年参加革命,曾任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晋察冀分社社长、人民日报社总编辑、社长等职,又是新闻学家、历史学家、书法家、诗人,是我国和我党不可多得的杰出人才。他对当时横加在自己头上的莫须有罪名,不能接受又无法申辩,而不得不以死抗争,终年才54岁。应该说按常理看,他的死是件很不寻常的事,应引起重视和警惕。再说,这样一个老干部因被揭发有问题而自杀,也可能会在同类老干部中引起骚动和不安。因此,北京市委曾就邓拓之死,给中央写了报告。事后,李雪峰曾传达过中央对此报告的批示,在有关批示中,毛泽东主席的批示似乎对此事很不以为然。我听了这一传达后,顿时不寒而栗。我参加革命以来,对毛主席可以说是出自内心的无限崇敬、无限热爱、无限信服,而他对邓拓之死的批示,却使我大感意外,怎么能如此铁石心肠,对待一个已经死去的、多才多艺的,即便是犯有错误的党内高级干部呢?由此,我也进一步引起思考,此后的“文革”会如何发展?将引向何处?实难以想像!

二、一次极不正常的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966年5月中旬我到北京市委工作时,中央正在北京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由于会议进行过程中我才到北京市委,所以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会议的有关情况我很快就知道了。因为当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市委书记处书记的万里同志参加了该会,而我与万里是相识相交多年的老同事、老朋友。早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就同在冀鲁豫区工作,那时他是区民运部长,我是敌工部长。同时,又都喜欢打网球,解放以后仍常互相往来,现又成为北京市委的同事,日常互相交谈较多,他自然向我转达会议的有关情况。事后我也从正式渠道得知实情,这次会议是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的,整个会议过程中毛主席都在

外地,由他委托少奇同志主持,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其一,传达通报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其二,揭发批判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其三,讨论通过由陈伯达起草,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因5月16日通过,即所谓《五·一六通知》)。万里同志还向我透露了一些会议的细节。当时,我们两人在互相交谈时,相互间还有些同感,都隐隐约约地感到这次会议极不正常,主要表现在:

其一,因为毛主席在外地未参加会议,由少奇主持会议,中央其他几位副主席也都出席了会议,而且这几位副主席都排名在林彪之前。然而,围绕会议主题作主要讲话的却是林彪、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而且,会议的有关情况也由康生向毛主席请示汇报。会议开始的前两个半天,首先由康生向会议系统传达毛泽东关于批判彭真、陆定一及解散中宣部、北京市委的有关指示;介绍和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的起草过程及毛泽东对《通知》的修改意见,以及毛泽东在此前后几次谈话的内容,这就为会议定了基调。接着由张春桥在会上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彭真、陆定一“对抗文化革命路线”的情况。陈伯达在会上也讲了话,他提出对彭真要“新账老账一起算”,尤其是“要揭发他的历史问题”。林彪在会上更是出尽风头,充分地表演,他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大谈古今中外的所谓政变(按:即被称之为“政变经”的《5·18讲话》)。他在这篇讲话中,肆意诬陷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就是要“搞政变”、“搞颠覆”、“要篡权政变”。与之同时,他又肉麻地吹捧毛泽东,不遗余力地大搞个人崇拜,什么“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一万句”之类的话语,就是他在这次讲话中提出的。我们从这次会议的安排中感到作为此次会议的主持者的刘少奇与其他几位副主席似乎都不能主导会议,整个会议实际上乃由毛泽东一个人在幕后指挥,再由他信赖的林彪、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在前台表演和主导。按照党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这岂不是极不正常吗?!

其二,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对彭真、陆定一等人所谓的问题后,展开对他们的揭发和批判,批判的调门定得极高,欲加的罪名都大得吓人,都

是按毛泽东那段有名的论断：“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我们的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林彪又进一步直接演绎说：“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要搞反革命政变，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的老婆就是一个，罗瑞卿就是一个，彭真的手段比他们更隐蔽、更狡猾。”其他与会者的揭发也不得不按既定的调门跟着附和。对被批判者横加罪名，无限上纲，却不允许他们自我申辩。会议虽然安排了彭真、陆定一检查，但彭真在大会上仅仅讲了五、六分钟，他说：“至于搞政变，颠覆中央，里通外国等罪名活动，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康生随即摆出一副打手架势，强词夺理地反驳说：“你这个讲话就是反对《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说：‘这些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了’，这段话就是毛主席特别加的，是最要害的，是《通知》的主要内容。林总昨天特别发挥了主席这个思想，你怎么回答呢？你尖锐地同党、同主席，同林总对立。”这完全是蛮不讲理，仗势压人。陆定一在检讨中说：他“主观上绝没有想变天”，林彪则毫无根据地反驳说：“你天天想在变天！天天想在变天！”这哪里有一丝一毫的党内民主气氛。另外，会上决定成立审查委员会，对彭真等四人进行专案审查。但与此同时会上又决定撤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及杨尚昆的候补书记职务；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及市长职务；撤销陆定一的中央宣传部长职务。这几位参加革命几十年，在全国党、政、军中有很高地位、很高声望的老同志，就这样轻率地被撤了职。按常理说，组织处理应根据审查的结果，怎么能在专案审查尚未进行时，就作出撤职的组织处理呢？我感到这些都是违背党章、不按组织原则、践踏党内民主的极不正常的做法。

其三，更为不正常的是林彪在会上抓住陆定一的妻子严慰冰曾写匿名信的问题，揪住陆定一大吵、大闹。陆定一曾就严慰冰写匿名信问题在会上检查说：“我不知道，她既没跟我商量过，也没有给我看过，我本人也没有发现过。”林彪则毫

无根据地反问，“你老婆的事，你怎么能不知道？”陆定一说：“丈夫不知道老婆的事，不是很多吗？”林彪听后更加恼羞成怒，咬牙切齿地指着陆定一的鼻子叫嚷：“老子我恨不得一枪毙了你！”另外，更令人厌恶的是在陆定一做检查的那天会场上，每位与会者的桌面上，还放了一份由林彪签名的复印件，上面写了：叶群和我结婚时是处女；老虎、豆豆是我与叶群的亲生子女之类的内容。我感到这些都实在不像话，在党的政治局扩大会上，一个身为党的副主席的人，对于另一位党的高层领导，为了个人私怨竟然如此歇斯底里大发作，这在以往的党内会议、党内生活中，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严慰冰写匿名信固然不妥当，但其写的内容毕竟是属于个人恩怨与猜忌，属于家庭琐事，不涉及政治内容，怎么能搬到党的政治局扩大会上，大吵大闹，纠缠不休呢！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显然把个人间的矛盾与忌恨上升到政治斗争，欲置人于死地。这就使我感到不仅这次会议极不正常，而且也感到，“文革”一开始就很不对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以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这次极不正常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三、在派工作组问题上康生 陈伯达的鬼蜮伎俩

在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的同时，江青一伙秘密组织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擦亮眼睛，辨别真假》、《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等煽风点火的文章连续发表，火力越来越猛，“文革”的形势在社会上也迅猛发展，特别是各高等学校都已造成声势。5月25日在北京大学出现了聂元梓等七人联名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直接点名攻击北

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党委副书记彭珮云，并扬言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张大字报出笼后，立即遭到许多北大师生的反击。因在此之前党中央、国务院曾发出过关于张贴大字报的指示，诸如“内外有别”，“遵守纪律”等。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贴出后，中央又重申了原来的规定。同时也严肃批评了聂元梓违反中央有关规定的错误。我们在市委还召开了各高校负责人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有关规定和指示。但6月1日下午我们正在市委开会时，突然接到“中央文革”的通知说当晚中央广播电台要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当时，出席会议的人都感到意外和震惊，北大的校长陆平和一位副校长也在会场上。稍时李雪峰、吴德让我通知北大的陆平等人立即回校，说是要做好准备。

6月1日的当天晚上，我又赶到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那里开会。我不是“中央文革”成员，而是代表华北局列席“中央文革”会议。我到北京市委时，“中央文革小组”的名单已经定下来了，中央还决定各个大区派一名代表列席，华北局是我、东北局是郑季翘、中南局是王任重、华东局是张春桥、西北局是杨植霖、西南局是刘文珍，后来参加会议的就是这些人。我进入会场时，

已经有几个人在座，因为都听到了聂元梓大字报的广播，自然都围绕北大“文革”的事在议论，听说中央决定要派工作组到北大，人选也定了，组长是张承先。正在这时，陈伯达来到会场。我和陈伯达过去虽见过面，说过话，但无任何个人交往，这时才算是第一次正式认识。他听到大家议论向北大派工作组的问题，就走过来拉着我的手说：“张承先这个人不大理想，我和他一起做过救灾工作，他身上老是挂着药瓶子，身体不好。最好能有一个人，大家都知道，做完这个工作就能留在北大工作(当校长)，这样的人最合适。我看要是你能去最好了，你去北大最好。”我则随即回答说：“我不能去，北大的情况我完全不了解，再说北京市刚成立文革小组，这摊子事也不少，我还有人民大学的事。”我和陈伯达说话过程中，康生也已步入会场落座。大家议论的结果，还是决定派张承先去为好。这样，张承先就带工作组到了北大。

那天晚上，李雪峰及国务院外办的张彦，还有我和市委的一些人都到了北大，李雪峰与张彦还先后讲了话，从北大回来已是后半夜了。

据我所知，在派张承先去北大的前一天，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还在5月30日向在外地的毛泽东请示：拟派工作组由陈伯达领导到人民日报社，毛泽东当天就指示：“同意这样做。”所以，5月31日以陈

伯达为组长的工作组就已进驻人民日报社。6月1日晚在钓鱼台研究向北大派工作组时，康生、陈伯达及“中央文革”其他成员也都在座，没有一个人反对派工作组，大家似乎都认为派工作组是顺理成章的事。

北大的工作组派出去之后，各方面的情况都紧张起来了，各个学校都动起来了，而且各个学校都要求派工作组，一两天内，北京市委和华北局就抽调



郭影秋(前排中)在病中为人民大学复校奔波

了40多位干部,包括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及其他中央各部的正、副部长,分别到各个大的学校去。我记得孙有余(一机部副部长)是6月4日到北师大,叶林(经委副主任)到清华大学,其他各高校也陆续派出。因为派工作组大都经过我的手,需要的人很多,级别也都比较高,需要与各方面磋商,时间又紧迫,最紧张时,我就是使尽浑身解数,也难以派出。而陈伯达和康生处,却不顾一切反复打电话催促:“要快派”,“尽快派”,我万般无奈,也只好向他们说明难处与苦衷。他们则不依不饶地逼迫说:“派不出去也得派,要么你就自己去!”当时,康生的老婆曹轶欧还给我写过信,希望我能增派她到北大工作组任副组长,我也曾回复她说:“北大工作组副组长不是我个人能决定的,请予谅解”。这些事实都说明,康生、陈伯达一伙人,当初知道派工作组是经过毛泽东同意的,他们不仅不反对派出,还积极对工作组的人选出谋划策,百般催促,甚至毛遂自荐,想方设法往里挤。只是,后来风向变了,才摇身一变来了个180°的大转弯。不管怎么说,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工作,各个学校、各个单位都派出了工作组,似乎可以舒口气了。谁知,树欲静而风不止,哪知更复杂、更尖锐的斗争还在后面。这一方面是一些学校的工作组与所在学校的“造反派”发生了矛盾和斗争,“造反派”制造事端,不服从工作组领导,有些工作组在处理这类问题时也出现不周、不妥之处;另一方面则是中央最高领导层在对工作组问题上逐渐产生了分歧。康生、陈伯达一伙利用分歧,在暗中唆使“造反派”闹事,由于这两方面的矛盾互相交织,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由于工作关系,我自己在不知不觉中被推到矛盾的漩涡之中。

工作组与“造反派”的矛盾,突出反映在北大、北师大、清华等有名的高校。6月18日,北大的一些“造反派,擅自揪斗了几十名干部和教师,采取了抹黑脸、戴高帽、挂牌子、设斗鬼台、打人、罚跪,甚至污辱女性等各种违反政策的错误做法。工作组闻讯后,赶往现场,予以制止,并于当晚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张承先在会上发表讲话,明确指出不经过工作组乱批乱斗的做法是错误的,容易被坏人利用,“六·一八”事件本身就是一场复杂的阶级斗争等等。此后,工作组将此

事件写成《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简报》。刘少奇批准转发了《简报》并有批语:“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但是,聂元梓等“造反派”却认为“六·一八”事件是革命行动,工作组的做法是镇压群众。我事后得知,远在外地的毛泽东就认为“六·一八”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革命事件。他还将这一看法迅即传给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这伙人闻讯后,欢喜若狂,并通过各种渠道传播给各校的“造反派”。与之同时,北师大也发生了“六·二〇”事件。具体情况是6月20日该校的造反派头头谭厚兰等人贴出大字报——《孙友余把运动引向何方?》强烈反对工作组。对此,孙友余针锋相对地发表了广播讲话,对大字报列举的事情予以澄清,并指出反对工作组是错误的,是对运动的干扰。如此一来,矛盾越来越激化。在此过程中,我曾到北师大做过调查,看过大字报,同时也应围观的师生员工要求在露天的场地上讲过话,大意是:希望北师大的师生员工按照中央的部署,在以孙友余同志为首的工作组领导下,摆事实,讲道理,把文化大革命搞好,对工作组有意见,可以批评,可以帮助。但也要提高警惕,防止少数人混水摸鱼,扰乱阵线,把运动引向邪路。不料,我这个讲话,也被“造反派”批判为是“镇压群众运动的宣言书”,还有人给我贴出大字报《郭影秋是什么人?》北师大的“造反派”之所以如此嚣张,我事后知道背后也有康生及“中央文革”的支持与煽动。曹轶欧等人就曾到北师大就“六·二〇”事件进行过所谓“调查”,幕后为“造反派”撑腰打气。

由于有毛泽东对北大“六·一八”事件视为“革命事件”的批示,已经使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特别是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畅游长江回到北京后,形势更加急转直下。据知,毛泽东回到北京后,首先听取了江青等人的汇报,在此期间内刘少奇也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于7月19日至23日主持召开了“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会”。我曾参加过一次,会上对于是否派工作组有明显分歧。陈伯达、康生、关锋等人不主张派,而少奇、小平、薄一波、李富春等主张派。小平同志说:“党的领导被打倒了,下面的组织瘫痪了,没有党的领导,

运动怎么进行。因而,应该派工作组协助党委、党组织进行运动。”周总理这时插话说:“我们年轻时搞运动,也没有什么组织领导,学生自己可以搞运动。”意思不是很明确,似乎是不主张派。少奇马上针对周总理的话说:“学校运动起来了,发生那么多问题,谁能办得好呀,让你去也解决不了。”会上自始至终对于是否应该派工作组,一直争论不下。

接着又开中央扩大会议,包括华北局的书记、北京市委的几个书记,李雪峰、吴德、我及高扬文、马力等都参加了。会上又发生了很大的争执。陈伯达在会上大发脾气,他说:我陈伯达没有派过一个工作组,我派到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局的都是学习组,不是工作组,我是请他们去学习的。他这么一说,包括当时了解情况的李雪峰等人都不好再讲什么了,都不说话了。会上还就是否撤工作组问题引起争论,有人主张撤,有人主张不撤,即使是认为有问题的可以撤下来,再派另外的人去。就在这时有人写了个条子交给康生,康生看后交给黄志刚,黄看后又交给我和吴德。我看了这张条子是曹轶欧写给康生的,上面写道:“我和戚本禹同志都建议北师大罢孙友余及翁世功两人的官,伯达同志同意”,陈伯达也在字条旁边写了“我也同意”。我与吴德把这个条子又交给李雪峰,李雪峰又在条子上批了一行小字,意思是“还要考虑派人到北师大工作的问题。”为此,会后,北京市委又开会研究北师大的问题,李雪峰通过电话联系,经磋商再派人到北师大,人员由三方面的人组成,一是北京市委,二是国家经委,三是教育部。而对于罢孙友余官的问题,李雪峰却没有明确布置。他还指示我去对从三个单位抽调的人员进入北师大之事做动员。我因下午还要到中宣部开会,就让他叫黄志刚去动员。但下午我正在中宣部开会时,吴德又急如星火地打来电话,让我立即回去,他在电话中说,“康老很有意见,请你快回来。”我一听知道事情大了,立即赶回市委,与吴德见面后话都没有说,立即上车赶快到康生那里。到后,果然看到康生大发脾气,主要是对处理北师大孙友余的问题有意见,责怪北京市委没有执行他的指示。他声色俱厉地对我 and 吴德说:“孙友余的问题老是解决不了,是为什么?我看孙友余有后台,有后台!后台

之后还有后台!”他的话很明确,明显的他把我也指责为是孙友余的后台,而且还不止是我。我想他发那么大的火,说不定要拿我开刀。这次谈话在极不和谐的气氛中就结束了!

另外,就在康生为孙友余问题大动肝火,严加指责前后,他还通过一些人转告我,曹轶欧从没有参加北大工作组。同时,还曾指示过我:“派工作组是错误的,都是刘少奇背着主席决定的,你要揭发刘少奇。”对此,我真是感到莫名地惊诧。我大惑不解康生为什么要如此说假话,曹轶欧明明在北大工作组里面,而且曾经要求当副组长,在我婉言回绝后,还收到过她的信,信中说:“我不能做工作组副组长,请把我的名单从工作组撤掉。这次工作组的改组我确实不知道,对于您的安排我也觉得确实不恰当。”倘若,那次把曹轶欧安排上副组长,她也绝不会要求退出。而且,她的退出也说不定是听到什么风声,玩弄的脱身之计。这件事使我发现,康生这个人竟然能随口说假话,就像陈伯达一样,他明明派了工作组,却说从来没有派过工作组。可见,这些人专门搞阴谋诡计,什么假话、鬼话都可以说。关于康生指示我就工作组问题揭发刘少奇,我心里也很明白,因为少奇同志从来没有就派工作组问题对我有过什么指示。反之,我派的工作组大都是经过康生、陈伯达等人指示、催促、逼使的。我怎么能昧着良心去揭发刘少奇呢?

大概是7月24日、25日,毛泽东先后召集中央常委和“文革小组”成员开会,又曾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文革小组”的成员,先后严厉批评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才镇压学生运动,并指责规定“内外有别”等,都是定框框,要把运动引入邪途,又说工作组“对运动起坏作用,阻碍运动”,要撤销工作组,罢工作组长的官。虽然事先康生曾指示我要在工作组问题上“揭发刘少奇”,但我在参加所有有关的会议上,在中央高层对有关工作组问题的激烈争论中,我没有说过一句对少奇同志不利的话。我心中明白这样的表现,肯定会得罪康生,但人各有志,只好听之由之,由他去吧!也就是在此前后几天内,江青、康生、陈伯达及“中央文革”的那些大员们纷纷到北大、北师大等高校讲话。江青在北大万人大会上声嘶力竭地喊:“要撤

销工作组”；“要罢张承先的官”。老奸巨猾的康生也跟着阴阳怪气地说：“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有派！”他们这伙人，真是两面三刀，出尔反尔，玩尽了鬼蜮伎俩。

北京市委在雷霆万钧般的压力下，于7月28日作了《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并于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由李雪峰宣布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同时，他还在大会上宣布撤销我的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当我听到对我撤职的决定时，心头涌起莫名的愤懑与苍凉。

四、耸人听闻的“二月兵变” 纯粹是为陷害而捏造

就在宣布撤销我职务的前两天，康生就曾于7月27日在北师大的群众大会上信口雌黄地说：“在今年二月底，三月初，彭真这个大黑帮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变成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计划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各驻上一个营的部队，这件事是千真万确的。而且在北大、人大都看过房子。这件事包含着极大的阴谋，陆平知道，人民大学的郭影秋也完全知道。”康生这个大奸大恶自己也知道，他讲这番话并无根据，但为了达到某种政治需要，为了附和林彪“五·一八”讲话中宣扬的“政变经”，给其寻找证据和注脚，便毫不负责地对彭真栽赃陷害，捏造他搞了什么“二月兵变”。同时，他似乎是随意地说：“人民大学的郭影秋也完全知道。”实际上则是别有用心要把我端出来，因为自“文革”开始以来，他曾多次对我拉拢、“指示”、训斥，我却始终没有买他的账，致使他记恨心头，早就想伺机对我进行打击。我心中明白，他这样对我落井下石，施以陷害，决非是出于无意和偶然。特别是关于“二月兵变”一事，我和康生在此之前就有过对质，我已向他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早在1966年5月中下旬，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和北师大相继就“二月兵变”贴出过大字报，甚至指名道姓地质问：“郭影秋是什么人？”我知悉有这样的大字报后，一笑置之，根本不当成什么事。不料，在一次“中央文革”的会上，康生突然向我发问：“关于二月兵变的大字报你知

道不知道？”我说：“大字报我虽未看过，但我知道这件事。”康生又进一步说：“你知道，为什么不汇报？”我又说，“我认为大字报揭发的事是不可能的，是没有的事，所以没有汇报。”当时，康生冷笑着“嗯”了一声，随手从包里拿出个材料给我看，原来是他的联络员给他写的一个汇报。材料中说：北大某某大字报揭发北大、人大都曾有过驻军，是要搞兵变。康生用红铅笔在材料上划了大杠杠，还指着说：“‘二月兵变’明明是有的嘛！”为此，我不得不把事情的经过与原委向他说明。

这件事本来是很清楚的，1966年初我正在海淀苏家坨搞“四清”时，北京卫戍区曾派人到人民大学借过房子。据来人说是中央军委为了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决定北京市新建一个团，归卫戍区建制。该团组建后，一时没有营房。为此，卫戍区先后到各处找房，均无结果。后来海淀区武装部向他们介绍说，海淀区有几个大学的学生都下乡搞“四清”去了，有些空房，是否可去联系暂时借用。当他们到人民大学联系时，在学校的同志表示可以安排些房子暂时借用。学校的同志也向我汇报过此事。但是，后来卫戍区政委刘绍文同志认为部队住在学校不一定合适，决定不在学校借房，而住到郊区的一个靶场。从这件事的前后经过看，怎么能得出是彭真想搞兵变的结论呢？不料，康生却未由此而善罢干休，他于7月27日在北师大的群众大会上讲了那番耸人听闻的话。这不明明是凭空捏造，有意栽赃陷害，且趁机打我一耙吗？！

康生讲了所谓的“二月兵变”的第二天晚上——7月28日，人民大学的“造反派”就兴师动众到市委去揪我。当晚十点多，吴德到我的房间说：“经与李雪峰商量，看形势你还是回人民大学吧！”就这样，未经任何组织手续，我就被“造反派”押回人民大学。那天晚上还下着大雨，我的车刚进入人民大学的大门，就被人从车上拽下来，不由分说地推到一个会场进行批判，其中被质问的一个重点问题，就是让我交待“二月兵变”，我只好再原原本本予以说明。我之所以被“造反派”揪回学校，直接导火线就是由于康生捏造了“二月兵变”，并无中生有地指控我“也完全知道”。

直到1966年8月2日,在人民大学召开的关于我的问题的辩论大会上,邓小平同志斩钉截铁地说:“什么‘二月兵变’,根本没有这回事,告诉你们,我们的军队,彭真调不动,我也调不动。部队到人大联系借房,不是搞兵变嘛!”这件耸人听闻的栽赃、捏造和陷害,才算告一段落。但是康生在这一问题上的丑恶表演,确也使我进一步认清他的真面目,他包藏祸心,为置人于死地,真是阴险毒辣,不择手段。由此,我还进一步想到康生这伙人所制造的政治斗争,真是无诚实可言。

五、无休无止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康生7月27日在北师大的群众大会上诬陷我完全知道“二月兵变”之后,第二天夜晚我被入大的“造反派”揪回学校时即遭到拳打脚踢,随后又被拉到批斗大会上,低头弯腰,做“喷气式”,连续批斗长达四个小时之久。被批斗完之后,又被拉到一间学生宿舍中,手脚都被捆绑起来,完全像一个罪犯囚徒。从此便开始了无休无止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所受的蹂躏折磨,真可谓九死一生。

一开始,在人民大学的师生员工中,对我有两种截然对立的分歧看法,相当多数的人是持肯定和“保”的观点;另有一部分则是主张打倒的,在这部分人中有少数干部和教师,多数是受蒙蔽的青年学生。两派之间越争论,反对者对我的斗争越激烈。1966年8月2日在全校关于我的问题的辩论大会上,小平同志发表了对我带有保护性的讲话:“对郭影秋同志我们还是比较了解的,他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是好的,解放战争中的表现也是好的。到人民大学后的情况怎么样,我不很了解,但是,大家可以和他的前任比较一下,是否有进步和变化呢?”然而,随着“文革”的深入发展,对小平同志的批判诽谤越来越升级,他日益处于自身难保的处境。他对我那些保护性的讲话,反而成为“造反派”把我看作是“刘邓司令部的人”的把柄。将我的问题和“刘邓路线”联系起来,使我的问题一步步升级。

1966年8—9月,海淀区苏家坨的农民知道我被打成“走资派”遭受批判斗争而不理解,因为我在农村“四清”时,和当地农民结下深厚感

情,他们对我留下较好的印象,因而自发地成群结队地到学校来,表明对我的看法,还与“造反派”辩论,甚至发生争执。对此,我事先毫不知情。“造反派”却又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诬陷我“调动农民保自己”,“挑动群众斗争群众”,并捏造材料,上告中央。当时,全国其他城市也可能发生有工农群众围攻学生的现象,以至于引起毛泽东于9月7日在给中央领导的一封信中说:“近来,长沙、西安等地,都有工农围攻学生的事件发生”,而且提到“在北京也有中国人民大学调动700多农民进城保郭影秋”;又说“组织工农反学生,都是错误的。试以中央发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再发社论告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为此,中共中央即发了指示:“不准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动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人民日报》也就此发了社论。在当时情况下,毛泽东主席的话,都是“最高指示”,他明确点到“中国人民大学调动700多农民进城保郭影秋”,而且,此后这样内容的大字报、小字报贴满了全校园和大街小巷。“造反派”依仗这一“最高指示”,很自然给我扣上“组织挑动农民进城保自己”、“挑动农民斗学生”的罪名,连续召开质问、批判、斗争大会,我稍有申辩、说明,就被指责为对抗、反对“最高指示”,“罪该万死”。

到了1967年2月,中央的一些老师老将不顾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的淫威,在怀仁堂仗义执言,痛斥这伙人迫害革命老干部,反党乱军,破坏国民经济的反革命罪行,这本来是大快人心事。不料,那一伙祸国殃民的败类,采取恶人先告状的无耻手段,反咬一口,诬蔑这些老师老将反对“文革”,搞“二月逆流”。在全国又掀起阵阵反击“二月逆流”,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黑风恶浪。在此过程中,由于人民大学的师生经过一段“文革”运动的实践后,又重新发表了一些对我持肯定性的观点。为此,我又被诬指成是人民大学搞“二月逆流”和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又是接二连三的轮番批判、斗争、游街示众。

特别是1967年3月,“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戚本禹窜到人民大学,在群众大会上宣布“人民大学的敌人是孙泱、郭影秋、胡锡奎。”我一下子成了“钦定”的、全校的二号“敌人”。随之而

来的是更惨酷的斗争和打击,被关押在“造反派”总部的地下室里,完全失去人身自由。批判斗争也进一步升级,不分白天黑夜,随意审问,甚至还煞有其事地举办“审判法庭”,弄一些假证据,强迫我承认;甚至扬言:“你不承认,也可以宣判,可以开除你的党籍。”他们有时又大搞疲劳战术,连续十几个小时质问斗争。如此无休无止的斗争和打击持续了好几年。真是无休无止,批斗个没完没了。在连续几年的批判、斗争、关押过程中,我经常遭受殴打。有时开质问会时,“造反派”坐在对面桌子旁,上面与你谈话,下面不时用皮鞋踢我的腿,直踢得腿上流血。其中,打得最厉害的一

次是批斗学校的几个主要领导,包括我、孙泱、胡锡奎、李培之,批斗会后,把我们拉到会场旁边的一个小屋子里。一群打手,疯狂地扑向我们每个人,大打出手。我直听到孙泱同志被打得“唉”了一声,便倒了下去,过了十几天他就死了。打李培之也很厉害,她是王若飞同志的夫人,一个老年妇女,一伙人把她打倒了再拉起来,拉起来再打倒,如此折腾了几次,实在令人惨不忍睹。打我时,专打肋骨和后脊骨,一下把我打得眼冒金星,昏靠到墙上,突然,又来一拳,打在太阳穴上,当时就昏迷了。令我奇怪的是这些打手都很有打人的经验,似乎是有预谋的专门雇来的职业打手。如此毒打之后,又被拉出来游斗,那次我被打得无法走路,游斗中在地下躺了半天,醒来还认不清东西南北,找不到自己住的房子。

在批判斗争中,对人肆意折磨蹂躏,进行人格侮辱,尤其令人难以忍受。折磨蹂躏的手段,花样百出,竟至无聊无耻,让人难以启齿。如有时游斗时,他们事先唆使些不懂事的孩子,往你脸上抹稀泥,然后再拉着你在路上跑,身上还挂着大牌子,一边跑,一边斗,喊着各种各样的口号,让你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直到晕倒在地,不省人事。这时,又让一群孩子,围着嬉笑辱骂,再往脸上抹稀泥,把人折磨蹂躏得简直不堪忍受。更为阴险毒辣的是,他们还故意给你创造条件,诱惑你自杀。譬如有时晚上,看守我的人全都去看戏。临走



万里(中)吊唁郭影秋

前,把门从外面锁上,屋里放着斧头、砍刀、绳子、通条,什么都有,我想这是干什么呀!我怎能上他们的这种圈套,怎能不明不白地去自杀呢。即便是在如此险恶的处境中,我对党、对未来仍抱有坚定信念,正像我当时写的一首小诗中所说:“风狂天地暗,早晚见阳光。”

我本来是一个农家子弟,又打过游击,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都曾带兵打仗。解放后在党政部门和教育战线工作时,仍坚持锻炼,常打网球,体质本来很好。但在“文革”中长时期遭受批判斗争,折磨蹂躏,健康的体格逐渐垮了下来,而且在有病时,又得不到及时治疗。有一次,在连续遭受批斗后,我实在支持不住了,不得不昏沉沉地躺在床上。结果,他们只好请来大夫,当时大夫一试体温,惊叫起来:“40.7℃这么高的体温,要死人的,你怎么还躺在这里呀。”结果不得不把我送到医院。实事求是地说,我在“文革”后期因病长期住院,最后不得不锯去一条腿,弄得终身致残,确与“文革”中的折磨、患病拖延不治及误治误诊有一定关系。

回首“文革”那段时间的经历,真好像是一场噩梦。我把当时的情况记述下来,为的是不忘这段历史。我坚信,从这场噩梦与浩劫中走过来的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一定都会从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中汲取沉痛教训,绝不能让这种历史悲剧再在中国大地上重演。(责任编辑 程 度)

追思孙犁老师

● 徐光耀

孙犁的去世是在意料之中的。因有精神准备,说不上很悲伤,但心里真疼啊。我非常崇拜孙犁。我对他的崇拜也有点小名气,毛泽东讥讽延安早期的文人“言必称希腊”,我不懂希腊,自己没学问,就言必称孙犁,常在会上拿他的话当我的话。其实,我与孙犁接触很少,我崇拜他主要出于作品。

我跟孙犁相交 50 年,总共只见过三次面。

第一次是 1951 年,当时在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改讲习所)学习,刚刚出了长篇小说《平原烈火》,领导重视,有点风头,大概为了鼓励,便让我以作家身份参加了“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苏联。这是桩很了不起的荣誉。团长由冯雪峰担任,副团长是曹靖华、陈荒煤,而孙犁、李季、柳青、胡可、魏巍、马加……等十几位都是成员。我是最年轻的。当时第一次见孙犁的面,心想,哦,这就是孙犁!细高的个儿,有几分清秀,不大说话,随和却不喜入群,也不爱掺和事儿,每有记者照相总躲到别人背后去,对人对事似乎都保持着距离。我最先读他的作品是《荷花淀》,特别喜欢,文字那么流畅,意象那么精致,真美呀,那才叫文学呢!近年读到他的《劫后十种》,更觉醉人,每一翻阅,立觉清风搔拂,净水浸泡,很快便进入审美浓郁的梦乡了。访问苏联那次活动近两个月,但不记得跟孙犁说过什么,我不善交际,他不爱说话,即便说过,也只几句寒暄而已。日后听人说,孙犁与人谈到我去苏联时,只说了一句话:“徐光耀这个小伙子啊,咳。”印象似乎并不怎么好。“咳”着些什么,我也不知道。

1958 年,我被打成右派,一个跟头从云彩里栽下来。1959 年,从保定农场摘“帽儿”分到保定市文联,当一名普通“工作人员”,连干部都不

是。

1961 年,孙犁大病一场,休养一段时间后,天津市委派了一辆吉普车,让他到想去的地方转转。保定是孙犁少年时上学的地方,留有很深的印象和记忆。他先到了白洋淀,而后来到了保定。保定市文联领导一看大作家来了,就问谁认识他,我见无人答应,便说与他有过一面之交。于是文联派我去陪他,为他指路,认门,逛逛。当时我想,往日在苏联,大家并肩比齐儿。如今我成“孙子”了,他会拿什么眼睛看我呢?哪知他一见我,喊声“光耀”,手就伸过来了,不但亲切如旧友,也不见任何大作家的架子。

在之后的时间里,我领着他到处转。带他去看我曾采访过的一位在洪灾中涌现的很活泼的女劳模李桂花;又去了一亩泉、抱阳山,并在抱阳山的托山树下合影留念。我非常珍视这张合影,不在攀高枝,是让我看见了一个不嫌弃如此褴褛(细看可见我身上的补丁)和背晦的右派的孙犁,在我近年出版的《昨夜西风凋碧树》中,特意将它印入其中。也正是这张照片,引发了我们的通信。

他回天津后,我将照片洗出寄给他。他很快回了信:“今日即收到寄来之照片,欣赏一遍,非常满意。李桂花那个人物,确能做一部作品的主人公,略其弱点,突出其舍身为人的精神,确实是很能感动人的……明年春季我们去白洋淀转转吧。”话语平易,不居高,不摆谱,根本不提右派的事,连句勉我努力、给我鼓动的话也没说,说明他眼里的我与一般人没有任何差别。

这是我们的第二次接触。

一晃十几年过去,“文革”结束了。我的右派获改正,恢复了党籍、军籍和级别,并出任保定市

文联主任。为了解决我夫妻几十年两地分居问题,我于1981年底调入河北省文联。

大约是1986年前后,我读孙犁新出的集子,才知道他在“文革”中两次自杀,哎呀,太震惊了!他一生不曾与人正面冲撞,他的忍耐力是很大的,怎么会走到这条路上去?差一点这个人就没了!当然,这十几年,我一点不了解他的情况。但看他的文章,进入新时期后,孙犁更阔大更深邃了,语言也更精炼,目光更宽广了,给人一种新的犀利、新的开掘感。但又感到他的情绪仍不甚昂扬,甚至有时还陷在自杀的心境中。我很担心,于是就写信:从文章中看到您曾自裁,非常吃惊,我乞求您再不可这样做了!人们喜欢您,是离不开您的。您也是我不可缺少的人,是我的精神支柱之一。我请求您一定设法把自己救拔出来,好好生活下去,写作下去……

这是中断了十多年后的再次通信。信中我称他为老师,我是看他的作品长大的,一直把他认做老师。可他回信说:我们是一辈人,是朋友,你无论如何不能叫我老师。又不无幽默地说:“我自己还没有精神支柱,怎能当你的精神支柱?”当然,他承认我的信很善意,答应将尽力按我说的去做。我一方面感到安慰,一方面再不敢叫他老师了。再叫,他会不高兴的。

1993年,天津文艺界为梁斌庆80大寿。梁斌是我的前任省文联主席,我也去参加了。我去祝寿更想借机去看看孙犁。此前,孙犁知道为梁斌作寿,一定会有很多各地老友来参加,也会有不少人顺便来看他,于是放出话来:谁也不见。但我和韩映山及林业部的段华还是一起开小差,贸然跑去探望。我们进门就声明,只坐半小时,忙忙地各自说说自己想说的话,照了张相,没有时间涉及其他话题。

那次作寿,北京的贺敬之也去了,并对我说打算那天下午去看孙犁。所以当孙犁招呼保姆为我们切西瓜时,我就说:“西瓜留给贺敬之吧,他下午来。”孙犁也就对保姆说:“那你拿回去,留着吧。”保姆也就真把西瓜抱走了,这可笑吗?我只觉我们心与心是直接见面的,一点不觉得有什么做作。同时,他也很尊重保姆,他们的关系十分融洽。保姆是他家的第一道关卡,去看孙犁必先经过他的保姆。

这是第三次见面。

1995年,他给我写信,说不想写文章了,身体、情绪都不允许了。我回信说,您还是写吧。从文章看,您写作时一定情绪高昂,精神愉快,有很好的心境,这能使身体更健康,更容易战胜各种疾病。即使单为保障身子骨硬朗,也应坚持写下去。他回信说,你的话固然是至理名言,可惜我做不到了,确实太困难了。当时我不懂,觉得他那么多极具思辨的文思不写多可惜。现在我一生病,才懂了身体真是工作的本钱,没有力气,强打精神也是打不起来的。

到1995年的六七月以后,孙犁突然与外界一刀两断,断得异常果决,几乎与所有的人割断来往,进入了与世隔绝的状态。此一举,若不说它骇人,至少是很难使人理解的,我读到过一些解释此一现象的文章,但觉得未能解除疑惑。



作者与孙犁(右)在抱阳山

到此为止,我总共收到过孙犁 48 封信。

2000 年,天津有个活动,好像就是纪念孙犁的什么多少周年,有的人趁机去看他。前头说过,孙犁是不喜欢人去看他的。有个人未经保姆同意,硬闯了进去,结果孙犁一句话都没有,让人非常难堪。孙犁就是这样,极有个性,非常本色,身处大千世界,坚决维护本心之自由纯净,简直够得上一个伟人,但他的不曲容苟世,很不近人情,也是很难让人理解的。我对他是同情的,仿佛也能略略理解一二。我自己有些怪脾气,大约也由于受了他的感染。近日梅洁写文章,说有人提到,徐光耀为了正直,到了不择手段的程度。这种毛病,我自己知道是很吃亏的。

孙犁在个人生活上几乎是不能冒犯的。他维护他的格调,他的脾气,维护他自己的小窝窝里的自由,营造他“个人自由发展”的小天地,宁可“躲进小楼成一统”,也绝不让人去随意干扰。为了排除这干扰,他会不计代价,拼尽全力的。古语云,上善若水。但水是流动的,自在的,一遇阻遏,也会发怒,激流似箭,自然不免伤人。我想,这跟他的文学观有着很大的关系。他视文学为神圣的事业,态度极为严肃,决不人云亦云,随着大流瞎跑。他曾长期战斗在敌后根据地,经受过血与火的严酷考验;他留驻过延安,受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影响几十年,对党的文艺方针和政策有着极实在的实践和体验。毫无疑问,他对党的政治大方向是一贯忠诚拥护并身体力行的,是十足的革命文艺家。但他对某些文学的具体问题,在经过认真地体验、比较、深思之后,是有着自己的看法的。而这些看法的独特性,即使在 50 年代,也常常一不经心便流露出来。

举个例子:孙犁是文艺现实主义最坚定最虔诚的信奉者和实践者。但他对给现实主义加上种种“帽子”,什么“革命的”、“新的”、“社会主义的”、“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之类,一律默然而不予认同。他以为,现实主义是随着时代生活变化前进的,可有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者是顽固守旧或反对革命的吗?上述那些限制词,本都是现实主义主旨中的应有之义,格外硬加些花色“佐料”,除了把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逼窄,起不到别的什么作用。而在现实主义创作实践中,孙犁很重视人性,强调个性,强调真善美,格外注意

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但这些认识,当时他只能藏于内心,或在作品中战战兢兢流露一些而已。

所以,他的作品尽管很美,广受欢迎,却不大人时,老有人嫌他过于温情,跟形势不紧,不够激进,不大“左”得可爱,因而不便激发人的阶级斗志,以奋力去推翻旧的政权。以此,在“文革”前,他的文章常被视为小道或偏道。总是处在被批评或不批评的边缘,致使孙犁每有“大道低回”之叹。

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个“谜”来:约在 50 年代中期,我的老上级侯金镜从华北军区文化部副部长的位置上调到《文艺报》当副主编。他曾特别把孙犁邀来北京,兜里揣着孙犁的作品,二人在颐和园盘桓了相当一段日子。然而,却无结果而终。侯金镜是个工作节奏很紧凑又很严肃的文艺评论家,他不会把孙犁邀来北京只游山逛水、或扯扯“老婆舌头”吧,他应该是有使命的,但他们有过哪些交流、切磋、甚或交锋,应是有篇大文章的。但二人都没有文字发表,这很奇怪。后来,侯金镜在“文革”中因说了一句“林彪像个小丑”,被人告发,成了“现行反革命”,很快惨死在湖北咸宁。如今孙犁仙去,他们这段本来友情深笃的颐和园交往,便成为无头案了。但正因其“无头”,才更耐人寻味。

孙犁的不入时,还表现在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看法上。很早他就说过,文学应该离政治远一点。这话,当时看,大胆极了,一旦揪住,非倒大霉不可。但他有个很重要的前提:文学又是离不开政治的。他说,生活中自有政治,当权者的政治、政策,必会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各方面去,并产生广泛的影响,哪儿也无可遁逃。现实主义文学要反映生活真实,必然会触到政治、政策的深刻影响和后果,你怎么离得开呢?他之提倡“离政治远一点”,说白了,不是要人脱离政治,只是对“配合任务”,图解政策,以及猖獗一时、成为公害的概念化、公式化的不耐烦罢了。同时他也认为,文学反映生活,从现实中考察政治的利弊得失,完成自己为人生的审美天职,也就够了,不必去“干预”政治,文学家是当不成政治家的。

孙犁还有一个著名的论调,他不止一次地说:“文人宜散不宜聚”。“文革”后的那次文代

会在北京举行。十年洗劫,文艺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这次文代会就是要重新组织队伍。我去时就想要看看孙犁。到北京后,河北省的代表恰好与天津的代表住在一起(总后海运仓大院),我很高兴,跑了去一问,说是孙犁没来。我问他是否病了,答说没病;再问出了什么事儿,回说没事儿。没病没事为什么不来?人家说:就是不来。

我轰的一下悟出来了,孙犁高啊!大家聚在一块儿,发发牢骚,扯扯闲话,为主席、理事什么的唧喳一阵子,有什么意思?文学创作在生活和书桌上,不在文代会上。孙犁一辈子踏踏实实写文章,把出入大宾馆,上下领奖台,从不放在意中。特别对“花别人的钱,替自己造声势”,极不愿为。更耻于拉帮结派。由于他这个态度,使有些人热心闹了一阵子的“荷花淀派”,也弄得若有若无了。孙犁天然是个“不当头”的人,他既不愿“赶浪头”,也不愿凑热闹。

孙犁不是一个单纯意义上的作家,特别让我敬重的,是他思想的深邃、睿智。他有着很强的社会科学素养,对马列主义有过认真的研究。他研读过中国史、外国史,读了大量社科类书籍和领域广阔的杂书。记得在解放后不久,弗洛伊德学说被视为是当然的反动,是受严厉批判的。那时孙犁便说过一句话:“弗洛伊德也是值得研究的。”很了不起。我想他那时已对弗洛伊德下过某种功夫了,并有着自己的理解。而当大家都说弗洛伊德了,他也就不说话了。他对现实社会的运动发展变化,也都有着主见鲜明的独到看法。

此外,他的博学也超乎一般人的想像。举凡书画,戏曲,文玩古籍,以至某些传统的民间工艺,他都保持着一定的兴趣和学养,说拿便拿得起来的。但他含而不露,从不炫耀。他是个最不爱自炫的人,曾屡屡告诫同仁及战友,在文字中自诩自能,卖弄多才,是文章家的大忌。

进入晚年的孙犁,文学审美观又有相当大的变化,尤其是思想,时常闪出锐利的锋芒。他对现实世界的关注、呼唤、呐喊,虽然温文婉转,但更本真而血性了。可谓隐锋芒于敦厚,藏讽劝于蕴藉,对时代风潮、社会利弊,每于字里行间作善意而痛切地鞭笞和扬弃。惜乎他的微言大意,常被“懦弱”的文风遮掩,不能激发更大的反响。然而,孙犁毕竟是孙犁,阅读他的作品,使我时常想

到:一个作家必须是思想家,至少是半个思想家,否则成不了真正的作家,更别说大作家了。孙犁是崇拜鲁迅的,一辈子熟读鲁迅,连《鲁迅日记》也烂熟于心。凡鲁迅读过的书,或鲁迅文字中提到过的书,孙犁见到了准买。他一生取法乎上。

孙犁几乎没有个人的私利,他歌颂世上之最美,让人们净化心灵;他爱祖国,爱人民,为使人民素质提高、活得更健康更美丽,他舍得付出生命。他为此而精心打造自己的人格和文格,把文字锤炼得真正称得上是珠圆玉润。他能背诵自己的许多文章,包括长篇小说的某些章节,这下的是何等的功夫!可是,当《孙犁文集》刚刚印制完成,他从窗口看见出版社同志抱着纸箱来给他送新书时,他却想:他们抱的那纸箱多像我的骨灰盒啊!

孙犁是最纯粹的人,最纯粹的作家。

有什么人不喜欢孙犁吗?也许有,我不知道。孙犁是丰厚而渊沉的,凡读过他作品的人,灵魂就会有被盯、被追之感。我对孙犁的认知,很是皮相,不过是“瞎子摸象”式的片面感触而已。真正对孙犁的全面评价,还有待于大方之家。我省作协党组书记李刚同志去参加了孙犁告别会,他回来说:鲜花有那么多,连孙犁的宅院都快叫鲜花湮没了。他说,真做了人民的代言人,人民是绝不会忘记他的。我完全相信他的话。但我也相信,孙犁生前也许并没有想到会这样,他大概也不太在乎这个。而人民毕竟是有眼睛的,他们心仪孙犁本是一种自然。送花致哀的人也可能有不认识他的人,就像鲁迅当年,有很多“局外”人参加送葬,这才是真正的作家应该得到的。

附言:

孙犁逝世的工夫,我刚从医院出来,动便喘息,没有力气写悼文,心中甚感惶愧。谢谢《家庭百科报》的记者赵梅锦同志,她找到家来与我聊天,并很快整成一篇文字,在她的报纸上以我“口述”她“整理”的形式发表。在此后的一个多月中,我的身体渐有恢复,便在“口述”稿的基础上作了些补充和添改,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惟一目的,是对孙犁老师表寸心中的感念。昨日还音声相应,转眼间便成阴阳愁隔,恩泽所被,岂是这区区数千字抵偿得了的?只略减深心中的歉疚而已。至于谬误之处,还望读者指正。

2002年8月26日温塘——自拔斋

(责任编辑 徐 孔)

“好婆婆”——莫艾

● 周建英

把领导比作“婆婆”，这恐怕也是中国的一个“小发明”。在两三代人合居的家庭中，婆婆是“管理干部”。她要有管理才能，有领导艺术，有令有禁，有慈爱而不能如母亲般娇宠子女那样，有礼数而不能像岳母待婿般一味客气。而为儿媳者，一生的大部分时间要在婆婆的指挥、教导下度过。这么一想，便觉得这个比喻，也人情入理。

但是，作为革命家庭中的“婆婆”，其职、其权、其修养、其责任，当远远超过千家万户的婆婆，这是革命“婆婆”的光荣！

我们动不动告状

莫艾同志，是我1953年从复旦大学毕业，踏上第一个工作岗位——新华社西北总分社时的“大婆婆”。所以这么称呼，因为他是总分社社长，下辖新疆等六个分社，同我们小记者打交道相对少些。那位采编主任则是顶头上司。说来有趣，50年代大学生似乎于人情世故方面，比当今的青年幼稚得多。我们从大都市带着初学的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的自由、民主意识，似懂非懂进入革命队伍。结果，在许多小事上与当地干部观念习惯相左。初生之犊，哪能怕虎？我和两位男同学——胡越、孙传镐（半年后又来了姚宗仪），动不动就去告状。说白了，越过采编主任，直接找莫艾同志诉说委屈。

报到的次日一早，我们三人端了脸盆去找冷水盥洗。当时西安还没有自来水，东寻西觅，在伙房找到一大缸清水，三个人嘻笑着往脸盆和漱口缸里舀水，冷不丁背后一声嚷：“这甜水是人喝的，不是洗脸的！”

“那么洗脸水在哪里？”

“在井里，自己去打！”

我们像犯了“罪”似地不声不响端走脸盆……当天下午有人通知我们三人到莫艾办公室去。当年的大学生，国家一再说是“宝贝”，我们坦然去见社长。社长身材高大，精神奕奕，三十多岁，和蔼地要我们坐下。

“你们从上海来，西安的生活肯定有许多不习惯。西安的水井分苦水井和甜水井，其实甜水也不甜，是指可以喝的淡水。苦水可真又苦又涩。我们总分社几眼井水都苦，每天要去电台那一眼井买一车甜水来，烧开水，做饭用。苦水只能洗涮用。再说，西安的木桶很大，井很深，你们也打不动。今天早上你们用甜水洗脸了，不要紧，我已让管行政的同志从明天起，一天拉两车甜水，你们洗脸洗衣服都随便使用好了。”

一车甜水，约半吨，一角五分钱，可以买五根油条。今天看来真廉价，可当时西安人吃一根油条也有点奢侈。于是，三个大学生每天洗涮洗掉五根油条，给人有了点特殊化的印象。

又一次，我取下房内5瓦的电灯泡，要去同管家换个40瓦的。他瞪大了眼：

“40瓦？你要这么亮干啥？”

“看书。”

“农村还用油灯呢，你用了电灯还不知足！”

“我已经近视眼了，这么暗，会加深的。”

“家家都是这瓦数，就你们闹……”他嗓门越来越大，我拿了灯泡转身就奔莫艾同志家。老莫当时久久地盯着我看，一声不响，我有点心虚了。次日莫艾召集总分社同志开会，其中提到灯泡：

“新来的年轻人，晚上要看书，是个进步行动。我们要支持，马上换高瓦数的灯泡……”大概这件事也有点特殊。不过，莫艾同志当时威望很

高,谁也不敢嘀咕。

于是,我们就有了吃哑巴亏的时候。当时食堂米饭和白面馍按比例供应。西安人爱吃馍,一盆米饭总有剩的,我们暗暗高兴。不料,才高兴两天,米饭首先被盛光了。当然,这次没有去告状。

“唉,你们这些娃娃,以后可要注意约束自己啊!”一位江南籍姓沈的中年编辑悄悄对我们说:“要学会体谅。这里许多同志是从延安来的,对上海的大学生不了解。莫艾同志给他们不断解释,你们也要懂事。”

这以后,我们不再告状了。既有渐渐明事的一面,也有不好意思的一面。

婆婆的品格和脾气

挑剔点讲,有点架子,有点傲气,有点脾气的是莫艾这位“大婆婆”。但这些脾气是伴合在他的宽厚、恳切、讲民主和雷厉风行的作风里。

我们有怕莫艾同志的时候(他当面批评人,毫不留情),但更多的是不怕他。因为他很重感情,极富情趣。

在西安那个古城,夏天的太阳要21点才下山。吃罢晚饭,莫艾就带我们打排球,打羽毛球。晚鸦归巢时,几百只飞过我们球场上空,莫艾双手抱头下令:“快快,蹲下,下炸弹了!”我们在嬉笑声中已落着了不少鸟粪。

当时刚建国不久,莫艾来自延安,但他身上有种与众不同的“洋气”。打球时,他会脱口喊出“My ball!”(我的球)。签名时他用“M”代表姓名。这可能同少年时在上海当学徒,或者延安时与众多名牌大学出身的革命者共事有关。而我们敬佩他的是另一种“洋气”——老学新东西,老出新点子,老提新要求,我们老跟不上。

一般的稿子,他很少看。有一回心血来潮,把我的一篇消息拿去了,十分钟后匆匆走到我桌前:“味同鸡肋!再去采访4小时,写出色、香、声、味来!”

稿件一次两次通不过,是常事。1959年莫艾担任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时,我又有幸在这位“婆婆”手下,当了十年的“媳妇”。这时已渐渐明白,由于稿子主题好,他才让记者不断返工。有位业务相当好的同事,一篇稿子锤炼了七遍,终成精

品。他为此写一篇心得,题为《七擒孟获》。

“原子弹,总有一天会引爆”

莫艾的才华,从延安到北京,从总社到云南分社,人皆赞叹。而莫艾另一个高尚之处是:爱才。

他爱才,但不偏爱。他爱才、用才更注意育才。在他手下干事,确实不无慌乱和紧张。你听,走廊里响起小步急促足音,闻者个个知道那是谁,同时也在心里嘀咕:是退稿吗?是稿子顺利Pass吗?是要返工吗?是写出了严重错误要批评吗?

每个行业都会有出稿的高潮和低潮期,“媳妇”们也不能个个聪明伶俐、得心应手。记者自己都有自卑或气馁的时候,但我们这位“婆婆”却不把人“看死”。有一次难得有闲,在我们工业组办公室里他坐了十几分钟,先指着一位年轻的记者说:

“枪毙几篇稿,不要哭。你现在是冬笋,埋在土里,到春天就破土而出,到夏天就成了高高的楠竹了。”他又指着另两位说:“你们都是原子弹,一旦爆发,威力无穷。但得靠自己努力,才能爆炸。”那两位“原子弹”难为情地笑笑,似有所悟,自我感觉好转(20年后,他俩都是北京市很出色的人物)。

嗨,有时我们“婆婆”的运筹,也要失灵。“文革”前那时期,计划经济高度严格地运行,财贸稿件上不去。分工财贸的那位记者也觉得老虎吃天,不知从何着手。莫艾指挥了几番,见效不大,那也绝不甘休。于是提倡记者写采访日记:“不要写流水账,也不必写私事,就把你们一天采访的、碰壁的、想不通的,想得通的,都写进去,我要抽查!”这不是吓唬,确是抽查过,他要通过日记本来帮助记者“淘金”,分析记者采访的思想,观察事物的方法,摸清记者的知识面和写作能力,以便对“症”下药。当时好些记者养成了写随笔、做日记的习惯,财贸报道在“婆媳”协力开拓下,逐渐也有了起色。

我们的“游击队长”

我第二次在北京当莫艾的部下,确有十年苦斗的感觉。为了赶稿,超指标、竞赛、争插红旗

(《人民日报》在1958、1959年给好稿插红旗),随时应对“婆婆”的各种智力测验,北京分社记者在办公室里睡地铺、卧沙发、躺写字台,是家常便饭。有一次,我三天没回家,丈夫来电话说孩子病了。赶到家里,只听丈夫在哼《宝贝》哄小女儿。他改了歌词是:宝贝,你妈妈正在前方打游击战呢……我啼笑皆非,可没怨言。因为莫艾自己也日夜以社为家。

常常是晚上10点以后,一天稿子发完,莫艾以急促的脚步来到记者办公室门口,喊走一个,答辞去!我当时采访首都文艺界,有一次被他点上。

“我现在要请你当文化部长,兼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他一本正经向我宣布。我瞠目结舌,无言以对。因为他既不喝酒,也不常开玩笑。

“请你考虑,社会主义时代的文化艺术如何能超过18世纪的欧洲和19世纪的俄国文艺?能不能?请你再考虑,像人艺这样目前中国艺术水准最高的话剧院,应该给观众什么样的精神粮食?应该出什么样的艺术大师?”

当然,我既没有当部长,也未兼任院长,而是在答辞之后,奉“婆婆”之命,住进人艺蹲点去了。人艺当时红得发紫,名演员于是之也红得发紫。话剧界有人去观摩还不易排上队,我这个小记者如何钻得进去?莫艾深知此情,他亲自为我与剧院领导说情,一进去就住在于是之家隔壁的女演员李滨的家。要访于是之,堵他房门就是。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莫艾不仅自己与编委们运筹帷幄,还培训记者胸怀大局。既要做出采访本行业的总体设计,又要你深入下去出色地完成一个个战役。

一日为师,终身为师

可以想像,“文革”十年,莫艾肯定受冲击。

犹记1969年我回沪探望父母。老父亲深夜向我严正叮嘱:不管莫艾同志是不是黑帮,你不能为难他。一日为师,终身为师。这样的好领导,叫他吃苦头,要遭天雷打。

我告诉老父,北京分社同志通情达理,我们批斗莫艾不让他挂牌,不让人动手,不让他弯腰。但不开批判会在当时是不允许的。父亲就放心了。

记得进驻分社军宣队有个刘政委,政策水平

较高。他一来就问大家,几位关在黑屋里的头头定性没有?既未定性,不作专政对象看。“八一”联欢晚会,要他们一起参加。

晚会上,我和摄影记者顾德华被摊派上一个节目。我舞《北京的金山上》,她伴唱。因人到中年骨头僵硬,我一不留神,跳着跳着跪在地上起不来了。全场大笑,有人还从椅子上笑着掉到地上。这时我面前的一位同志用两手挽我,还问:“跌痛了吗?”仰面一看,竟是莫艾!这时的莫艾也已经笑出眼泪,这个笑容我们已经几年没有看到。我迅速爬起,与顾德华两人捂着笑痛的肚子,奔去厕所换装。我们直起身来,异口同声悄悄说了一句:“你看见吗,莫艾也笑了!”没有说出的一句是:“我们多希望他愁云散去,开心一番啊!”

前面说过,这位“婆婆”有点傲气。经过岁月和政治生活的洗礼,我相信自己已看得清清楚楚:他实质上是一种傲骨!在不认识的事理面前,不随声应和!在冤屈的命运前,坚信党的正确路线必胜!他有此傲骨,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大!然而,一个共产党员为追求真理连头颅都可抛,莫艾同志尽管受折磨,但肯定不会为他的金子般的品格悔恨一丝一点。

他有三份深深的情

在昏天黑地的十年“文革”中,采访时,面对凶恶、血腥、野蛮、无耻种种平时还算是自己人的表现,我痛苦极了,矛盾极了。“难道无产阶级对自己的同志就如此无情吗?难道做革命人就得那么冷酷凶残吗?……”

两三年后,情况不断变化。忽然,军宣队要我们“革命群众”同“走资派”个别谈心,以便解放一些好同志。记得那天是从晚上七时多同莫艾直聊到清晨三点。我毫无顾忌地向莫艾直白了自己想不通的种种问题,他以一个早年入党的老同志的政治经历,向我剖析路线斗争的道理,而且坚信做过了头的事,党是会纠正的。……当然,我只是向军宣队汇报了些冠冕堂皇的话。没有多久,莫艾去了总社,后又去新华社云南分社当社长了。……

当然,人无完人,莫艾焉能例外。为教我懂得“组织”纪律对一个记者的重要意义,讲及他自己在延安时一次“目无领导”而受批评的故事。但我

想,后来他是否又矫枉过正?“文革”行将结束时,身为《光明日报》社长的他,唯命是从地登载了不该刊出的坏文章。为此,他是何等痛悔!退休后我们去拜年,他正捧着《共产党宣言》说:“我要重新学习啊!”

“冬裘夏葛相催逐,垂老光阴速似飞。”30年流去,连我自己都已退休,写此文时莫艾已经84岁。这几年他病卧医院,然而,我是想去看望又不敢看望。

因为我只希望他那青年时的英俊潇洒,中年时的朝气蓬勃,老年时的持重深邃,永留我脑海。

我时不时想到这位“婆婆”,想多了,思路集中到一点——莫艾是个感情深挚的好同志!

他执着地深爱着党,他纯真地爱护同事和部下,他绵绵无绝期地爱他的亲人——尤其是他的夫人李蕴辉同志和两个儿子。

这三份深情,我还要浅绘几笔。

莫艾伉俪情深意笃,一生如一日。凡识者与知者、闻者,莫不如此赞叹羡慕。我在西安初见李蕴辉,便被她典雅的风采、亲切待人的气质所折服。原以为八路军女将个个叱咤风云,原来并非如此。当时她肩任陕西分社和西安分社社长,日理千机,却总见她温和耐心地处理一切,可见才华和修养之出众。当时她的两个儿子——小明和小安,一个8岁,一个才4岁,都是需要费心照料的时期。可任何时候,我见李蕴辉总是装束整洁,容貌端庄清丽,绝没有被家务拖累的样子。如今她也80多岁了,华发虽添,可记忆仍好,谈吐入情入理,耳聪目明。更为惊人的是,莫艾住院两年多来,她天天上午到医院陪伴,不论老莫在长时间的昏迷状态或清醒时刻。也许,正因夫妇间如此深挚的爱情,可以击退一切病魔和衰老。

莫艾那么喜欢小孩子,也是我年轻时觉得很不好理解的。

故事的叙述,再回到西安时期。一个三伏天的晚餐后,好不容易洗去汗水躺在床上看小说。莫艾派了一个4岁的娃娃来喊我:“叔叔叫你去,一块儿听故事!”

到院子里一看,莫艾手摇芭蕉扇,六七个娃娃坐在小板凳上正津津有味地听着呢。我走近时,才知道是在做智力测验:

“天上有几个月亮?”

“一个!”

“苹果有几根小辫子?”

“一根!”

我听了啼笑皆非,正想走开,他一声唤住:

“坐下,坐下。小朋友,我们现在要考阿姨了。”

“我们陕西省有几个正副省长?叫什么名字?文化局正副局长是谁?”我未被他考住。

“这个礼拜内有个国家发生了政变”?我冒汗了。他又问:“你读过《资治通鉴》吗?”我摇头。“那咱们考《水浒》……”我求了饶,因为我连这本名著当时也未看完。莫艾有些的不悦,我更尴尬,他说:“那你回去休息吧!”

次日上班后,莫艾果然叫我去他办公室,十分严肃而恳切地说:“我首先向你道歉,昨天当着那些孩子的面……不过,你们读完大学开始工作了,不等于书可以不读了。读了书不记住,不等于读过书了。报上的国内外大事也要记住,否则白看报。”他递给我一页稿纸,上面列了十几本书名(其中有《资治通鉴》和《水浒》),笑着叮咛:

要反复看《聊斋志异》,学习作者如何用最精练的文字写出动人的情节和人物;要细细读《福尔摩斯探案》,有助于我们写稿注意逻辑和推理;要常常翻契诃夫的作品,你看他写的都是普通人和平常故事,但每一篇的开头都不落俗套。我们写导语也应这样。

我如获至宝,谢完要走,他唤住,幽默地说:“可别当耳旁风啊,半年后,再考!”

不到半年,西北总分社随西北大区撤销,我同我的第一位“好婆婆”分了手。但以后漫长的岁月中,我枕下是常有这些书的。莫艾同志,我是时时准备你再考我的啊,即使考不出,也甘愿挨批评。

如今,我多么愿意沉入早年的回忆。由于我的幼稚、浅薄和天真,与您们——我的“婆婆们”热忱、正面、激情交融着,绘出了共和国初期我们新闻圈里真实的一角。

“早岁哪知世事艰”——如今,且吟陆游诗句,有说不尽的体会和滋味!好在,这二十多年来,我们又过上了好日子,像当初那样,可以坦诚、正直、深情地做人!

莫艾同志,深信我们都会健康而快乐地活着。

(责任编辑 程 度)

张学良说：

杨虎城是西安事变主角

——美国所藏档案新发现

● 杨天石

在西安事变中，杨虎城是张学良的亲密合作者。我在美国阅读张学良的口述史及其相关档案资料时，杨虎城是注意的重点之一。结果，发现部分新资料，有助于西安事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陪衬？主角？

1956年12月，蒋命张学良回忆西安事变时，曾特别指问杨的情况。当时，张学良的回答是：“平心而论，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但是，到了上一世纪90年代，在回答张之丙姐妹的访谈时，张学良却说：“西安事变就是杨虎城，当然我们两个人，那是杨虎城不平啊。”又说：“那西安事变……那可以说他是主角哇，不过名义是我，我是主角了。当然由我负责任。”从“陪衬”到“主角”，反映出张学良晚年对杨虎城在事变中的作用有新的估计。

根据张学良所写《西安事变反省录》，在事变前，杨虎城曾两次向张学良进言，希望张对蒋介石有所行动。

第一次在1935年。当年10月初，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一一〇师何立中部自延安回防甘泉途中，在大小崂山受到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部伏击，全军覆没，何立中等被击毙。同月2日，蒋介石在西安建立剿匪总司令部，蒋自任司令，以张学良为副。10月9日，蒋、张命杨虎城以所部主力在宜川、洛川一线设防，阻止红军向南发展。当时，杨虎城已对“剿共”持消极态度。他向张学良

陈述，无钱又无补给，并且发牢骚说：“剿匪”等于“无期徒刑”。“以中央军之数量，东北军之精锐，皆未能消除共匪，区区如彼之军队，能何为乎？”同年11月，东北军第五十七军一〇九师牛元峰部在陕北直罗镇受到为毛泽东指挥的红军围攻，被俘5300人，缴枪3500余支。这两支部队先后被歼，编制也就失去，蒋介石并不从兵员、财政上给予补充。张学良觉得这是蒋介石借剿共消灭异己，曾向杨虎城透露“倦于剿匪”的心情。杨虎城所部在“剿匪”中也受到过相当损失，同样得不到补充，对蒋介石也有怨气。1936年3月，高崇民等在西安出版题名《活路》的小册子，提倡东北人与西北人合作，联合抗日。杨虎城同意高的主张，便向张学良建议：向蒋公进言，停止剿匪，团结抗日，节省东北军和西北军的消耗。

第二次在1936年12月初。当年11月，蒋介石飞抵洛阳，进一步策划“剿共”。张学良于12月2日只身飞洛，向蒋介石进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要求释放上海救国会七君子。双方发生尖锐冲突。张指责蒋“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蒋严厉表示：“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匪不剿完，决不抗日。”在阅兵时，蒋甚至声色俱厉地声称：“主张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蒋的顽固态度使张学良“有如凉水浇头”，对蒋绝望。回到西安后谈起有关情况，向杨问计，有何方法可以停止内战。杨在张立誓抗日后，对张称：“待蒋来西安时，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

侯’之故事。”杨的这一想法,已经包含了武力扣押的内容,可以说,西安事变的计划已经成形。后来的西安事变基本上是按照杨的这一思路发动的。

对杨虎城的建议,张学良的最初反应是“愕然”,可见,此前他从未有过类似的念头。直到张学良向蒋介石进言,一再碰钉子之后,才采纳杨议,“决行强谏劫持之谋”。在《西安事变反省录》中,张学良称:假如自己当时与何成浚或张群共处,就不会有西安事变发生。可见,杨虎城“造谋”的重大作用。张学良晚年之所以称杨为西安事变“主角”,当是基于这一考虑。

二 杨虎城的“小家伙们”

“挟天子以令诸侯”虽出自杨虎城之口,但是,张学良认为杨虎城出身草莽,不会懂得这一历史掌故,因此,在1957年所写《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一文中,又进一步补充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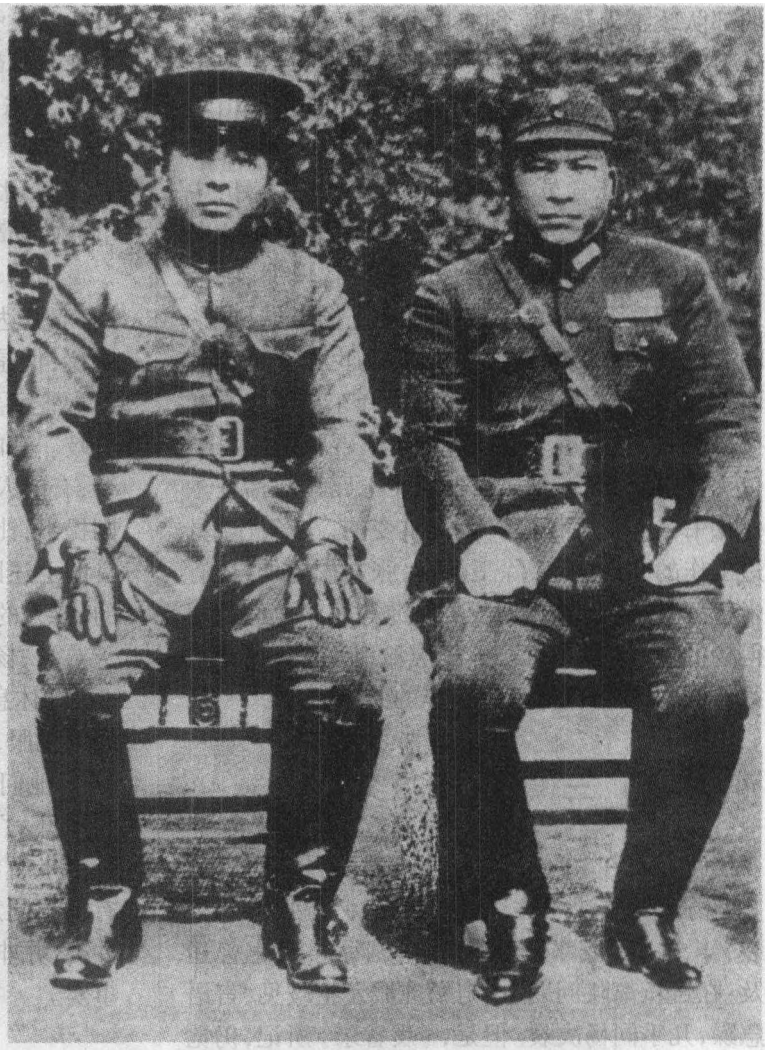
在另一方面,我西安剿匪一位重要的伙伴——陕西绥靖主任杨虎城将军……他非常热衷抗日而不愿剿匪。这是由于他有两种心情:一为保存实力,一为趋向时髦。我们两个人虽非故交,短时间却结为好友,彼此间无话不说,无事不谈。在当时,他已竟(经)被共匪渗透,是利用他另作一个角色——关于这个问题,我并没有确实的证据(我写这篇文章,尽力的十分忠实,除非我记忆上小有差错。我准备任何人向我挑战……)现在我已晓得,中共的重要干部,他的伪大使王炳南,当时是在杨的幕中。我在洛阳归返西安之后,同杨虎城相谈之下,彼此大发牢骚。某一日,又谈这个问题时,我问计于他,他沉吟了一下说:“我那些小家伙们(这是指他的智囊团)倒有一个计策,等待蒋委员长来西安时,我们不使他离去,我们来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请注意,他一开口就说“那些小家伙们”。

那证明他背后已有人鼓动他,是利用他来推动我、试探我。

根据张学良的这一回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创意者不是杨虎城,而是他的“那些小家伙们”,张学良怕别人不明白,还特别加了一个括弧,说明“小家伙们”就是杨虎城的“智囊团”。这是张学良前此在任何场合都没有谈到过的。

杨虎城的“小家伙们”是哪些人呢?张学良只谈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任波兰大使的王炳南。王的父亲原系杨部高级参谋,与杨私交极好。王在日本、欧洲求学,经费均由杨提供。1936年4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委派王到西安,与杨商谈停战抗日问题。此后,王就住在杨的公馆里。

张学良在和张氏姐妹的谈话里,进一步谈到



西安事变前夕的张学良(左)、杨虎城

了杨虎城和中共的关系。他说：

杨虎城要紧的是王炳南。杨虎城手底下一定比我手底下厉害。不但是文人，还有新城的一个师，差不多都是共产党。他自己实实在在，他的太太是共产党。我判断他的太太就是带着任务来的……就是当年他的政治部主任……那时候在新城，共产党的几个都是女的。

王炳南实实在在的名义就是杨虎城的秘书……杨虎城很听他的话。

张学良声称，杨虎城“新城的一个师，差不多都是共产党”，显然夸大了，但是，杨虎城的夫人谢葆真确系共产党，在杨军政治部工作。她是在1928年1月，经中共党组织批准，和杨虎城结婚的。

杨虎城和中共的关系比张学良所知还要密切。早在1927年冬，杨虎城就要求加入中共。他的部队政工人员中，即有中共党员16人。1928年10月，杨虎城在日本东京期间，中共中央决定批准杨的入党要求，指示东京市委办理，但由于杨很快回国，未能办理相关手续。1934年，杨部警卫团有共产党员200余人。1935年11月，中共北方局南汉宸委托杨的驻北平代表申伯纯向杨传达中共的《八一宣言》。1935年12月，毛泽东、彭德怀派汪锋携亲笔函件会见杨虎城，商谈联合抗日事宜。同月，中共北方局也派王世英到西安和杨虎城会谈。1936年，毛泽东再派张文彬携函见杨，达成互不侵犯、建立军事联络等三项口头协定。此后，张文彬即以十七路军政治处主任秘书名义长驻杨部。西安事变前，在杨虎城身边工作的共产党员，除王炳南、张文彬等外，还有米暂沅、宋绮云、王菊人、申伯纯等人。他们都深得杨的信任，参与机密。杨虎城所称“我那些小家伙们”，显指在他身边工作的共产党人。

三 张、杨冲突

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载，12月24日夜，“闻杨虎城坚决不主张送余回京，与张争几决裂”。在《西安事变反省录》中，张学良也曾述及：在送蒋离陕问题上，与杨虎城发生歧见，言语急躁，几乎同杨决裂。但是，《反省录》所记，仍觉语焉不详。关于此事，张学良《敬告世人》书有更

详细的叙述。

张首述杨虎城幕中激烈派的态度及杨所受影响：

杨虎城的反对蒋委员长返京，那不是出诸他自己，而是出诸杨的幕中渗透分子煽动杨，说我出卖他。所以当时杨虎城对我说：“你是受了蒋夫人、宋子文、端纳情感诱惑，有反初衷，你犯了温情主义，你是同蒋宋两家有私谊上的关系，可以和平了结。我杨某可是不肯作断头将军的，要干就干到底。

张继述本人的“气怒”：

我说：“这样的国家大事，岂是私情问题，我们不顾一切的行动，是为了发动要求蒋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今日已确知抗日前途有着，那么我们还要蛮干下去，必使内战扩大发生，而使蒋委员长失去领导，而走向相反的方向，那才是真的有反初衷呢！你怕死吗？你若是怕死，何必要发动这种大胆的叛变行为？我将只身护送蒋委员长入京，上断头台我一人承当，我决不牵连任何人。”

杨、张之间的这一段对话，不见于其他记载，可补西安事变史乘之不足。

端纳、宋子文、宋美龄等到达西安后，经过谈判，双方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改组行政院等协议，但是，蒋介石只同意以“领袖人格”保证，不肯签字。这样，在放蒋问题上，西安方面就出现分歧。有的人主张继续扣蒋，命蒋在西安发号施令；有的人同意放蒋，但坚持蒋必须签字；还有人则提出，让蒋在西安对全国作广播讲话。从张学良的上述回忆看，杨虎城最初是反对无条件放蒋的，二人的冲突即由此发生，并且迅速激化。

张、杨激烈冲突之际，周恩来在场。他劝张“小加休息，容他们会议商讨商讨”。其后，经周恩来说服，杨虎城同意放蒋。关于此，张学良回忆说：“他们的这一番争论，经周恩来一说之下，即为平息。”

米暂沅的《杨虎城将军传》称：“一时盛传有杨不同意放蒋的说法”。上述资料证明，张杨冲突，并非只是“盛传”，而是的确发生过的事实。

（责任编辑 吴 明）

邓拓收购名画的风波

● 苏双碧 王宏志

上世纪 60 年代初，北京有关邓拓买走一幅苏东坡的《潇湘竹石图》的事，闹得纷纷扬扬。传闻之中，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苏东坡这幅画的真假问题，文物商店对这幅画拿不定主意，征求专家意见时，大多持否定意见，而邓拓独具慧眼，断定画是真迹，并出巨资买走这幅画；二是邓拓不该买这幅画，认为这是国宝，应由故宫博物院收藏，并因此引起非议。这件事虽是相隔 40 年的旧事，谈清楚了也还很有意思。邓拓的儿子邓壮以及其他一些作者，对此虽都写有专文，但总感到有些事还可以谈谈。

《潇湘竹石图》为白坚夫老先生所收藏。白坚夫原是北洋军阀吴佩孚的秘书长，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他在北京风雨楼的古玩店中买走了苏东坡的两幅传世珍品：一是《枯木怪石图》；一是《潇湘竹石图》。前者是风雨楼主人从山东收藏者手中买来的，后者则是风雨楼的藏品。白坚夫早年留学日本，太太是日本人，他把《枯木怪石图》卖给日本人。这样一来，剩下的《潇湘竹石图》就更珍贵了。1961 年，白坚夫由于经济困难，为弥补生活，决定把《潇湘竹石图》卖掉。为此，他曾经专程到上海，没有把画卖出去，后来又来到北京。他找到熟人、国家文物管理局文物处处长张珩，因为张珩能识别文物。白坚夫把《潇湘竹石图》拿给张珩看，希望能给他开个价钱。但是，有位鉴赏家认定这幅画是赝品。白坚夫一气之下，卷起画就走了。此时，白坚夫正处在无可奈何之中，听说沈阳故宫博物院的杨仁恺先生在京开会，杨是白坚夫的四川老乡。杨仁恺听了白坚



1962 年邓拓摄于寓中

夫关于卖画周折的事，就向他推荐去找邓拓。白坚夫很高兴，他说：“只要能找到个识真宝的知音，钱少我也愿卖。”

苏东坡原名苏轼，自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州眉山，我国古代最重要的诗人之一，是北宋词坛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但他在政治上长期失意，生活坎坷，虽胸怀大略，却壮志难酬。他是个大诗人，同时又是个著名画家。史书记载他画过《枯

木怪石图》和《潇湘竹石图》。八百多年的历史变迁，以及苏东坡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确立，他的画作自然也显露出自身的历史价值。邓拓研究过画，自己也作过画，他对画不但爱好，而且懂得鉴赏。邓拓对苏东坡淡泊仕途，疾恶如仇，非常崇敬，对他的画自然更怀有深厚的感情。邓拓抱着这样一个态度：苏东坡的画迹，从来只见书载，不见画卷。苏氏的真迹肯定是稀世珍宝，不管是真是假，都应当弄个究竟。正在这时，画家周怀民告诉邓拓，他家有一本日本出版的画册，其中印有苏东坡的《枯木怪石图》，邓拓喜出望外，立刻和周怀民赶到周家。邓拓仔细地端详着一张不足一尺见方的珂罗版印刷品，被这幅画吸引了。他一边观赏，一边听着周怀民介绍苏东坡绘画的特点：苏东坡的画“枯木枝干虬曲，石皴硬，枯笔飞白不拘工整，笔力跌宕，想见苏氏当时心境，大有屈子离骚情怀。”“苏东坡所绘墨竹从地仰首向上，而且少有竹节。米芾问：‘何不爱节兮？’苏氏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两位书情画友深情地探讨着苏东坡绘画的风格。邓拓经过亲自观赏苏东坡的《枯木怪石图》，以及和周怀民先生对苏东坡画的探讨，对苏东坡画的特点有了一定的认识，于是就更加响往了。

一天，荣宝斋的画家许麟庐带白坚夫及《潇湘竹石图》来到邓拓家。白坚夫听过张珩的对邓拓的推荐，对邓拓先有一个很好的印象。但是，60年代初正是一步一步推行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因为白坚夫曾经事过吴佩孚和日本侵略者，历史有问题。许麟庐只介绍画，并不介绍卖画的主人。邓拓展开画卷，“隽逸云气扑面而来，画面上一片土坡，两块怪石，几丛疏竹，左右烟水云山，涉无涯际，恰似湘江与湘水相合，遥接洞庭，景色苍茫，令人心旷神怡。徘徊凝视，不忍离去。”这一段是邓拓观画时的意境，写在《苏东坡〈潇湘竹石图卷题跋〉》一文之中，颇有凌逸之气，照抄下来，让读者领受邓拓观赏苏东坡画时的情景。

邓拓鉴赏良久，才兴奋地对白坚夫说：“你这幅画我也不能辨别真伪，但从目前情况来看，这幅画的珍贵是毋庸置疑的，很有研究价值。我虽然十分喜欢，但是囊中也很羞涩，老先生你看准备要多少钱？”话音未落，白先生激动地说：“这是我的心血，由你保存我就放心了，关键在

于我庆幸地遇到了知音。”邓拓谦虚地说：“在中国古代绘画鉴赏的造诣上，我不过是个学生，完全是为苏东坡的艺术成就和他的气质所感召，入迷而已。再说，有古书记载苏轼流传在世的画迹就只《枯木怪石图》、《潇湘竹石图》两幅。若我能有幸珍藏一幅，乃我的幸事。”

由于邓拓对这幅画的看重，也由于白坚夫认为邓拓是画的“知音”，价钱很快就谈妥了，双方同意作价5000元。当时5000元不是一个小数目，邓拓虽然有些稿费收入，但倾全部储存也凑不足这个数目来。于是，邓拓答应当即付给白坚夫2000元，其余3000元三天内全部还清。为凑足这笔钱，邓拓请来荣宝斋的经理和画师，忍痛从个人已有存画中，挑选出24幅，经画师作价，凑足了3000元。

邓拓收藏了这幅画后，就进行了认真研究，他以观赏研究苏东坡不同年代的书法艺术入手，并对《枯木怪石图》的用笔特点，以及苏东坡所用过的金石印鉴，总之，凡是可能和苏东坡画有关的，他都进行了认真研究。为较准确地判断这幅画的真伪，邓拓还请来许多画家、书画鉴赏家来一起研究和辨别。但是，树大招风，一幅苏东坡的《潇湘竹石图》由邓拓收藏，一些政界的大人物，如陈伯达、康生，还有许多著名画家如吴作人、黄胄等以及邓拓的熟人萧劲光、傅钟等也赶来观赏。但是，邓拓买画的事，却得罪了一位权威，在王力的反思中记录了这件事。他说：这个“权威”指使一名不懂文物的支部书记，出面检举邓拓搞文物投机，引起了轩然大波。少奇同志批示严肃查处，几乎所有中共中央常委和其他领导人都划了圈，北京市委也不敢保。最后传到一位了解情况的、当时的大人物那里，他用硃笔批了一大篇，说邓拓在此问题上不但无罪而且有功，说有的专家不仅武断，还仗势欺人，企图借“四清”打倒邓拓，以挽回自己的面子，长期把持文物阵地，不让别人插足。这位当时的大人物还派人查清此事，并由荣宝斋的王大山写成调查报告，送给刘少奇。少奇立即表示同意这个报告，从而弄清了邓拓买画的风波。在这过程中，邓拓受到的压力很大，但他心地坦然，现在问题搞清了，他可用更多的业余时间对《潇湘竹石图》进行认真研究。随后写出了《苏东坡〈潇湘竹石图卷题

跋》一文，邓拓引用苏东坡题《惠崇潇湘芦雁》一诗：

惠崇烟雨芦雁，坐我潇湘洞庭。
欲买扁舟归去，故人云是丹青。

邓拓说读了此诗，再看此画，“恍惚置身于潇湘洞庭之间”。邓拓再举“东坡曾题《宋复古画〈潇湘晚景图〉》三首”为例，其中第一首写道：

西征忆南国，堂上画潇湘。
照眼云山出，浮空野水长。
旧游心自省，信手笔都忘。
会有衡阳客，来看意渺茫。

其他两首意境也很好，例如“落落君怀抱，山川自屈蟠”，再例如“自说非人意，曾留入马蹄。他年宦游处，应话剑山西。”这些诗句叫人心旷神怡，会使人如入潇湘景色一样，叫人迷恋。

所以，邓拓认为这三首诗，“其中许多诗句，用来题咏东坡自画之《潇湘竹石图》，其实也无不可”。可见，邓拓观赏《潇湘竹石图》感受之深。

邓拓说，苏东坡的学问、事业、文章、品行及一生遭遇，“彰彰垂于青史，人所共知”。但东坡之画却流传很少。邓拓找到宋代何遵的《春渚纪闻》所记，苏东坡不但时常作画，还有许多动人的故事。故事之一，说苏东坡戏笔作枯木竹石，在给朋友的手帖上写有“本只作墨木，余兴未已，更作竹石一纸同往。”故事之二，是说苏东坡卖扇，“公取白团夹绢二十扇，就判笔作行书、草圣、及枯木、竹石，顷刻而尽。”因卖扇者刚出府门，“而好事者争以千钱取一扇，所持立尽”。两个故事都谈到苏东坡作竹石画的事，而且是随手拈来，自成一格。邓拓认为从《潇湘竹石图》可以看出，东坡画法具有极大的创造性。东坡画石用飞白笔法，画竹用楷书及行书撇、捺、竖、横等笔法，而稍加变化，画烟水、云山、远树则用淡墨点染，气韵生动。邓拓认为黄庭坚说的，“东坡居士作枯槎、寿木、丛筱、断山，笔力跌宕于风烟无人之境。”诚非虚言。邓拓就苏东坡画史及特点，进行了认真而周密的研究之后，判断这幅画是真的。他说：



1961年邓拓(右二)与廖沫沙(右一)等参观北京平谷海子水库

此画寓意深远，尤为难得。想见东坡当时心境，大有屈子离骚情调。卷末题“轼为莘老作”五字。莘老与东坡际遇有相同之处，堪称同调。五字题款语句简练、亲切，与东坡文章风格一致。字体古朴、浑厚，一见而知其为真迹无疑。

邓拓判断，此画创作时间当在11世纪后半期。当时北宋画院尚未成立，以苏东坡为代表的文人画派，运用直接观察的方法，概括客观事物特征，自由写意，不受拘束，在中国画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幅画历经九百年历史，辗转至今，藏主多有题跋，邓拓对这些题跋作了认真分析，十分有趣，摘其部分抄录于下，与读者共赏：

九百年来，如此伟大作品，辗转保存至今，历代收藏家之功，固然不可抹杀，而此画左下角及其后幅有历代题跋文字三千余言，凡二十六家，更足为研究画史者之重要参考资料。

邓拓对诸家题跋进行了认真研究，并考证出这些题跋，其中有些是名家所题，为今人所罕见的。他例举福建十大才子郑定的题词：“苏老才名重古今，人间遗墨若南金。山云挟雨溪头过，石上琅嶠起夕阴。”邓拓再举明初高让，曾任翰林院编修，他的题跋是：“香毓峨眉，文鸣韶武。永

叔齐名,与可为伍。竹比翔鸾,石如蹲虎。适兴一时,清风千古。”而明初的吴勤,曾被召入史馆,门生满天下,他的题词对竹石画评价更为直接,他说:“坡仙昔在黄州时,居闲每仿孙莘老。竹石曾将写赠之,遗墨到今真是宝。”此外,还有明代著名学者杨慎等的题跋,杨慎在长篇题跋中写道:“琅嶠落纸珠生唾,画绝名兼诗实和。未论名价重三都,先遣风流惊四座。仙翁去后几百秋,江光清澈鱼龙收。”这些题跋十分难得,是研究《潇湘竹石图》的重要参考资料,其它许多题跋不能一一例举。但邓拓认为,二十六家题跋都不是泛泛应酬之作,都是针对东坡《潇湘竹石图》立论的。如叶铤的题跋中,就有:“百年翰墨留真迹,应写潇湘雨后枝。”而李焘题跋即有:“好似湘江烟雨后,令人不厌倚蓬看。”而明朝任工、户、吏三部尚书的夏邦谟,更将潇湘景色作了形象的描写:“东坡逸迹天下奇,竹石点染潇湘姿。恍惚二妃倚薄暮,林间或有泪痕垂!”

根据以上分析,邓拓当然认为这幅画属苏东坡之作无疑,但邓拓非常谦虚,他在文章的结尾说:

现在东坡作品已经摆在大家面前,就此进行多方面分析研究,还是刚刚开始,有待于文物鉴赏家、艺术评论家、国画家、收藏家及其他热心人士,共同努力考证、解释,更进一步接受这一份珍贵之文化艺术遗产。

邓拓收藏字画不仅是一种爱好,更主要的是为保存祖国的文化遗产不使流失,这颗赤诚的心,却常常为一些小人所诽谤,企图用他们的流言蜚语涂抹邓拓这颗光明磊落的心。但历史是不容歪曲的,历史是是非曲直的见证。早在60年代初期,邓拓就表示,如果专家们证实《潇湘竹石图》是真迹,他将无偿地送给国家。但是竹石图的真伪还在争论之中,邓拓只好继续研究这幅画的真伪。在这之后不久,邓拓邀请荣宝斋画家帮助他在藏画中挑选出144件,在邓拓押上“邓拓珍藏”的收藏印之后,无偿地献给了中国美术家协会。这批藏画有苏东坡的《潇湘竹石图》,有我国古代十大画家之中的徐文长、八大山人的作品,还有明代四大家沈石田、文徵明、唐伯虎、仇十洲的作品。他捐赠这批藏画中有手卷、有册页、有立轴、有中堂,都是出自名家之手笔,有些还是

邓拓十分喜爱的珍藏本。邓拓收藏和捐献文物,当然不是从60年代初才开始,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邓拓就很注意收集文物,在平津战役之前,他把自己收集的文集20多本,全部交给华北博物馆筹备处。现在许多博物馆还可以看到邓拓捐赠书画的展出。1963年,他听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要编辑《中国甲骨文合集》,就将自己收集储藏多年的甲骨文片,提供给历史所。这样一位对祖国文化事业忠心耿耿的学者,怎样说得上是和国家抢购文物呢?

十年浩劫之后,1984年春,国家文物局组织了一批文物专家,其中有谢稚柳、启功、杨仁恺、刘九庵、徐邦达等,对《潇湘竹石图》进行鉴定,确认邓拓保存并捐赠的《潇湘竹石图》是苏东坡的真迹。邓拓为党、为国家、为民族保存珍贵文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981年,中国美术家协会在中国美术馆隆重地举办了《邓拓藏画、书法展览》。展览的“前言”,肯定了收藏家的活动对于各国人民的文化和学术事业,“直接发生积极的影响”。“如果有一批民间收藏家,随时随地注意收藏革命的、历史的、大大小小的各种文物,贡献给国家,那就方便得多了。”邓拓就是抱着这种对历史负责、对国家的文物事业负责的精神,来收藏字画的。“前言”的这段话,本来是邓拓在《燕山夜话》中的话,被“前言”节录于其中,成为美术家、书法家们的共识。

邓拓喜欢书画,也懂得书画,会鉴赏,也会鉴别。他自己画过画,发表过评画的文章,并为准备写一部《中国绘画史》作过许多努力。可惜他昼夜忙于工作,又要在广泛的领域,如历史、经济、哲学等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研究,又要抽出时间写《燕山夜话》,写《三家村札记》,他不可能有更多的时间研究绘画史,这是他一项未遂的心愿。当然,更主要的是,因为他过早地被迫害致死,英年早逝,原本想要为祖国为人民做的许多事,成了壮志未酬,这对于祖国的文化事业来说,当然是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失。

(本文写作时参考了邓壮:《邓拓和〈潇湘竹石图〉》、邓拓:《苏东坡〈潇湘竹石图卷题跋〉》、王力:《王力与文物》等文章)

(责任编辑 程 度)

辛亥革命时期的“上海新舞台”

● 李仲明

“新舞台”建立的背景

自 1867 年(同治六年)北京、天津两地京剧艺人大批赴上海演出,上海逐渐成为中国南方的京剧艺术中心。

京剧初入上海,立即风靡全城,“沪人初见,趋之若狂”。短短 30 年,京剧在上海的发展形成南派京剧的艺术特点:表演动作身段夸张、强烈;唱工灵活、流畅,适应上海观众的欣赏要求和趣味;传统剧和文明戏并重,追求戏剧的情节性和趣味性;舞台布景运用近代科技,追求新奇。

这期间,以上海为中心的南派京剧,曾一度被贬为“外江派”、“野狐禅”,排斥于“正统”京剧之外。上海名演员、“新舞台”创办人之一的夏月珊批评了这种偏见,认为:“京朝派唱戏一板一眼,海派唱戏也不能一板四眼。”海派并没有逾越京剧的艺术规范,而只是追求艺术风格上的发展。

“新舞台”的前身是丹桂茶园的夏家科班,由首批来沪的京剧艺人夏奎章等教戏,主要演员(学员)除夏月珊等兄弟外,还有小保珊(朱惠元)等 20 余人,他们于光绪初年登台献艺,极受观众欢迎。光绪中期以后,夏家科班改由夏月珊掌管,这一时期入科学艺的有小连生(潘月樵)、小旋风(盖叫天)等。

随着京剧改良运动的兴起和时装京戏的大量涌现,特别是 1904 年上海《二十世纪大舞台》创刊前后,时装京戏演出成为当时文艺改良运动的重要形式之一,戏剧界编演了《玫瑰花》、《秋瑾》、《徐锡麟》等等。

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十月,京剧演员潘月樵、夏氏兄弟和上海信成银行协理、曾任同盟会干事的沈绂云等集资,在上海十六铺创建“新舞台”。发起人有沈绂云、姚伯欣等 16 人,“新舞台”首创将带柱方台的旧式茶园改为半月型镜框式舞台的新式剧场,并试用灯光布景,形成戏曲舞台美术的新流派。

“新舞台”的演员与剧目

“新舞台”的演员阵容颇为整齐,是当时上海多个京剧表演团体中的佼佼者,如老生演员潘月樵、武生夏月恒、青衣毛韵珂、花旦周凤文、老旦小桂芳。

著名演员欧阳予倩、刘艺舟等,也先后参加“新舞台”的演出,推动了上海的戏曲改良运动,使“新舞台”成为辛亥革命前后宣传革命,编演新戏的一个重要场所。

潘月樵是“新舞台”最主要的演员之一。潘生于 1869 年,艺名小连生,江苏甘泉(今扬州)人。9 岁登台,16 岁时入上海天仙茶园,一度与汪桂芬齐名。他的表演文武兼长,做工颇佳,擅演《四进士》、《群英会》、《打渔杀家》、《九件衣》、《明末遗恨》、《汴梁图》等剧。苏雪安认为潘月樵是清末民初南派京剧老生的主要代表演员,“就上海来说,在 50 年中的做功老生中,他可以名列前茅。”在表演上,周信芳受其影响最大。

演戏之余,潘月樵在上海创办榛苓学堂,在苏州创立菁莪学校,专收贫家子弟,不取学费,后因经费拮据而解散。

1904 年,潘月樵离开天仙茶园,应夏月珊兄弟之邀,加入丹桂茶园,进行京剧改良活动,排演了很多针砭社会的时装新戏,他是辛亥革命前后最富于革命思想的艺人之一。

《海上梨园新历史》一书曾评论潘月樵、夏月珊,指出:伶界杰出之士,纷纷倡议,以改良戏剧,为开通社会之先声。小连生、夏月珊者,是中之哥伦布也。夏氏兄弟也是“新舞台”的主要骨干力量。夏氏兄弟之父夏奎章是同治前后到上海的著名京剧演员,工武老生,擅演《反西凉》、《冀州城》、《赚历城》等,有“活马超”之誉。夏奎章有五子,除长子昌彝外,月恒、月珊、月润、月华皆为演员。其中,尤以月珊、月润创办“新舞台”,排演时装新戏,在清末民

初的上海京剧界享有盛名。

夏月珊,原名昌树,夏奎章第三子,丁文武老生及文丑,曾任上海伶界救火联合会会长。夏以靠把戏《独木关》、《定军山》等尤为拿手;又擅编演讽刺社会的时装新戏,如在《黑籍冤魂》剧中,他扮演大少爷,从翩翩少年变成鸬形鹄面的鸦片烟鬼,最后家产荡尽以拉黄包车为生,其表演生动、逼真,剧中一次拉车发现坐车的妓女竟是自己的亲生女儿,于是感慨万千,演得真切动人。

《黑籍冤魂》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受鸦片毒害的真实现状,引起上海烟土商人的仇视。“新舞台”收到多次恐吓信和炸弹警告,夏氏兄弟毫不退缩。夏月珊登台时向观众表示:不怕威胁,“戏要演,毒要抗,决不退让”!

夏月润,原名昌泗,夏奎章第四子,谭鑫培的女婿,丁文武生。曾任上海伶界联合会会长。月润演武生,兼演红生,武生戏曾得到谭鑫培的传授和指点,其中马超戏亦得家传,长靠、短打均较擅长;红生(关羽)戏宗王鸿寿,表演规矩大方。

夏月润曾请王鸿寿编演《走麦城》,王以有辱关公形象为由未允,月润于是自己编排,未料初演那天戏院隔壁面馆失火,延及戏院,烧成一片瓦砾。当时有人说这是“关公显圣”,不能唱关公背运的戏,夏氏兄弟认为是迷信,集资在原址上重建戏院,开锣之日仍演《走麦城》,结果演出后大受欢迎。

“新舞台”建立后,夏氏兄弟与潘月樵等排演新戏。夏月润赴日本,经著名歌舞伎演员市川左团次介绍,约请日

本布景师到上海,布置新式舞台布景。当时上海搞舞台美术较为知名的张聿光也曾向他们学习,新的半月形舞台和布景转台,都是“新舞台”在上海戏剧界开的先河。

冯子和,字旭初,号春航,江苏吴县人。“新舞台”主要演员之一。幼年随父冯三喜学青衣、花旦,后入夏家科班,拜夏月珊为师;亦向时小福、路三宝等问艺。12岁正式登台演出,因其扮相、声音与当时著名青衣演员常子和相像,乃得艺名“小子和”。民初在上海与孙菊仙合演《三娘教子》,曾有“上海第一花旦”之誉。冯子和受夏月珊等影响,具有民主、爱国思想,1909年参加南社;辛亥革命时曾与潘月樵等人参加攻打“江南制造局”的战斗;1919年五四运动时,上海民众声援北京爱国学生,发动罢市、罢课,冯子和首先罢演,并创办“伶界救国十人团”,在上海伶界大会上慷慨陈词:“我辈伶人同为国民,则扶倾危之时局,挽既倒之狂澜,责任所在,万死不辞……”

冯子和一生主张戏剧应以改良社会和进行通俗教育为己任。除了他擅演的传统戏《三娘教子》、《贵妃醉酒》等以外,他排演许多时装新戏和古装新戏,如《杜十娘》、《孟姜女》、《薄命汉》等。

“新舞台”的传统京剧剧目近两百出,有时亦演出连台本戏,很受观众欢迎。他们编演的改良京戏,据苏移、胡冬生、蓝凡、汤草元主编的《中国京剧史》上卷的统计,约在50种以上,经常演出的主要有:《潘烈士投海》、《黑籍冤魂》、《新茶花》等。

在这些改良新戏中,尤以反映戒烟赌、改良社会陋习的《黑籍冤魂》,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清政府腐败无能的《潘烈士投海》和《新茶花》、《明末遗恨》、《波兰亡国惨》等剧深受观众欢迎。

陈伯熙在1924年出版的《老上海》一书中对“新舞台”的京剧改良剧目评论道:“(新舞台)排演节目,或为名伶手改,或求文豪编造,颇有宜雅宜俗、可泣可讽之作,而菊部子弟,一跃而尊称艺员矣。兹略举最著名而脍炙人口诸戏,列述于次。戒烟则《黑籍冤魂》;劝赌则《赌徒造化》;《明末遗恨》,激排满也;《潘烈士投海》,厉爱国也;言监狱之黑暗,则有《刑律改良》;放女界之光



夏月珊在《黑籍冤魂》中的三个扮相

明,则有《惠兴女士》……

高梨痕在《忆京戏革命先驱夏氏兄弟》的手稿中,评论夏氏兄弟与潘月樵等对改良京剧的贡献:

夏氏在演出方面,大胆突破,不是专演传统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也演时装戏,时事戏。清末政治腐败,外患日亟,有潘姓学生愤而投海,夏氏在丹桂茶园因排演《潘烈士投海》,由当时的唱工老生潘月樵演潘烈士,演来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同时有一名黄勳伯的市民,因奋勇捉贼而牺牲,夏氏为表扬他见义勇为,即排演《黄勳伯》;鸦片战争失败,烟毒遍及全国……他们排演《黑籍冤魂》,轰动一时,久演不衰,对于戒烟运动起了良好作用。

夏氏不仅演时事戏,在新舞台时期,也演外国戏,演外国名剧《黑奴吁天录》,演自编的法国历史戏《拿破仑》,在京剧舞台上演西洋戏,当时确是创举。

“新舞台”成员攻打江南制造局

舞台上编演改良京剧,舞台下积极投身革命活动。潘月樵与夏氏兄弟都参加了上海民族资产阶级革命党组织——商团,是上海伶界商团的负责人,冯子和是南社成员,与爱国艺人刘艺舟等和著名南派戏曲家欧阳予倩等曾在“新舞台”合作演出过,这些主客观因素促使“新舞台”成员普遍具有较为强烈的爱国热情和艺术创新精神。

1911年4月8日,上海商团联合会在“新舞台”召开代表大会,2000多人与会,会上颁布商团的章程,推荐李平书为会长,沈缦云、叶惠钧为副会长,虞洽卿为名誉会长。

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革命热潮迅速影响江浙及上海。清政府十分恐慌,乃令陆军大臣荫昌督兵赴湖北,大理院正卿岳柱臣、鸿胪寺正卿英杰臣等送行时祝他得胜还朝。荫昌却无奈地引用《战太平》里华安的戏词说:“又道是,母子好比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

清王朝的京师尚且如此惊慌,那么距离武昌比较近的江浙两省及上海的清朝驻军更感到岌岌可危。潘月樵与夏氏兄弟组成的伶界商团,参加了进攻江南制造局的战斗。

梅兰芳在《戏剧界参加辛亥革命的几件事》一文中说:

夏月珊、月润兄弟就沿墙根绕到制造局边门,看见旁边有一间木匠住的房子,里面堆着许多刨花碎木。夏氏兄弟就想用火攻,马上派表弟薛寿龄骑马到附近烟店买来两箱火油,由夏月润亲自动手倒在刨花堆上,顷刻间燃起熊熊烈焰。为了防火势蔓延,他们还准备了救火员,以便到适

当时间救火。商团看见火光,就四面八方呐喊起来,声震天地。这时,有一位商团总部的基本队员范耕莘扶墙摸壁地走到制造局的铁栅门边,从一个小洞里钻进去,用大石块砸开铁栅门的锁,大声嚷道:“我们得胜了!”局里的总办、会办等,在火光冲天、杀声四起时,以为外面的火力很猛,被这种声势吓慌了,就仓皇登舟逃往浦东,卫队亦纷纷散去,商团一涌而入……

参加攻打江南制造局战斗的“新舞台”成员,还有潘月樵、夏月华、冯子和、张顺来、马飞珠、邱治云及潘月樵的儿子小黎青、小六子和潘的兄弟潘小棠等人。

友人胡恨生追述了潘月樵11月4日黎明前在南市毛家弄商团司令部的情况:

潘月樵正在向司令朱少沂、参谋高一涵等报告前方战况。他的装束很特别,黑布包头,身穿黑缎袴衣,耳边挂两条白彩绸,外罩黑斗篷,腰佩指挥刀,就像戏台上太平军的装束一样。他口讲指划地述说攻打制造局的情况,口齿清楚,精神饱满,很能吸引大家。他说完了,向司令等立正行军礼,就走出大门,纵身跳上一匹白马,又到前方督战去了。后面许多人追着看他,他回过头来扬鞭对大家说:“你们等着听好消息吧!”少时,小南门钟楼上钟声大作,大家拍手欢呼,上海宣告光复。

由于战功显著,潘月樵被上海革命军政府授以少将军衔,委任他为上海军政府的调查部部长。民间传说潘月樵还参加了攻打南京的战役,为此受到孙中山的表彰,并亲赠潘“现身说法”匾额一幅。

但据《申报》1911年12月6日第二张第三版载,潘月樵在致沪都督陈其美的信函中,谓:“九月十三之役,月樵亦亲历战火,稍尽义务,偶为敌弹伤足,不得不杜门养痾。但每读日报,见江宁战事,殊有身欲奋飞病在床之憾。今喜全城光复,灭此凶残,所谓天心、人心,无二致也。月樵既未能身历戎行,以尽国民之职,而毁家助饷,岂肯让美于前人?”潘月樵与毛韵珂向上海军政府各捐1000元,又联合商团票友在“新舞台”义演筹饷。陈其美曾回信向潘月樵、毛韵珂道谢。

“新舞台”成员在辛亥革命前后,成为改良京剧和光复上海的先锋,对辛亥革命运动作出了贡献。而正是由于他们对革命的高度热忱,促使他们在京剧改良运动中积极进取。诚如戏剧家欧阳予倩所说:“辛亥革命,潘、夏诸人一齐加入工作,去攻打制造局,他们又组织救火会、义勇军之类,很能取得社会一般的称道,而伶人的人格也因此提高,新舞台本身的基础也就格外的巩固了。”

(责任编辑 庄建平)

龙江剧创建者白淑贤

● 曲润海

1990年9月,我从山西调来北京,赶上了中国戏剧节。好戏连台,名角荟萃,其中就有一台黑龙江省的龙江剧《荒唐宝玉》,有一个主角儿白淑贤。此后就不断地看她的戏,逐步形成了对龙江剧对白淑贤的一些认识。

2002年2月6日,哈尔滨举行了“白淑贤与龙江剧艺术研讨会”,总结白淑贤的艺术成就和龙江剧的发展历程,研究在新世纪龙江剧艺术如何繁荣,我也参加了,还听了白淑贤的总结性发言。

十分有趣,白淑贤初登舞台演出的第一个戏叫做《登高望远》。40年的艺术实践,40年的剧种建设,正好像登高望远,步步前进。白淑贤有一段经验之谈,她说:“有人看见峡谷就想到深渊,而我看到峡谷就想架设一座桥梁渡过去。”这种登高望远、见谷思桥的进取精神多么可贵!人有精神支柱才能生存得硬气,才能有创造的勇气和智慧。白淑贤和她的同志们就是在这个精神支柱支撑下,拼搏创造了40年。她们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共走了三步:从不自觉的尝试,到有意识的探索,到打开思路加快步伐全面建设,终于使一个具有鲜明的黑土色彩、现代风韵和高超技艺的新兴剧种,跻身于中国戏曲艺术之林。

从“四不像”到“八面锦”

白淑贤清楚地认识到,今天建设新剧种,要适应今天的观众的审美情趣,要在刻画人物形象上,体现新时代的气息,体现黑龙江的地方风格。她说:

作为创建新剧种的队伍中的一员,在选择自己的剧目时,在考虑自己的行当时,在研究自己的唱法和身段时,都应该有这种雄心,这种见地,这种很高的立足点。一名演员,特别是参加新剧种创建的演员,不能只埋头于自己的一招一式,一唱一念,还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博采众长,才能使自己的剧种不断丰富,不断发展,成为适应时代需要的大剧种。

龙江剧在白淑贤和她的同志们的共同创建中形成了,而且形成自己的表演程式。然而,就像一切新生事物一样,并不能立即得到承认。有人挖苦说,这种表演是“四不像”。之所以这样说,是他们拿京剧、评剧等一些老剧种、大剧种的尺子来衡量的。那么,老剧种、大剧种是从哪里来的?哪一个老剧种、大剧种开始的时候不是“四不像”?京剧是由徽剧、汉剧、昆剧、梆子戏融合而成的,不是典型的“四不像”吗?可是现在被尊为国粹、国剧。评剧是在“蹦蹦儿”基础上发展成大剧种的,现在不是成了东北的“老二”了吗?越剧原是浙江嵊州的曲艺“落地唱书”,现在成了全国的大剧种。如此说来,“四不像”倒是剧种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必经的过程。白淑贤说:

创建并形成龙江剧自己的表演程式的起点,不应是其他剧种原有的历史起点,而应该是它(龙江剧)所诞生的时代的起点。龙江剧应该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应该兼收并蓄众家之长为我所用。

龙江剧兼收并蓄谁家之长呢?又是如何兼收并蓄的呢?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为什么要创建



白淑贤

剧种,为谁创建剧种,创建怎样的剧种。按照白淑贤的说法,就是要创建家乡戏。她说:“既为家乡戏,就不能离开她的母体——二人转和拉场戏,一定要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她之所以这样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是她基于对二人转和拉场戏这种植根于黑土地的民间艺术的了解和挚爱。她认为,黑土地文化是多种文化的综合体。它在本地原始文化、中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相互撞击、相互融合中形成了动态文化的心理特征。这种文化心理的外化,则是敢爱敢恨,敢喜敢怒,在艺术表演形式上载歌载舞,不仅唱,而且用形体的各部位舞蹈化动作,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黑龙江的观众喜欢这种火爆、热烈、夸张、优美、开放的秧歌舞步和情调,看到它倍觉亲切。新创建的龙江剧就应该适应黑龙江人民的审美情趣。这就自然得出结论:龙江剧必须以二人转和拉场戏为母体,必须是强烈的动态艺术,必须有浓重的黑土豪情。正如著名导演艺术家李紫贵先生说的:演员在台上要动起来。也如导演张玉超要求的:要尽量往地方风格上靠,要动,要扭起来。

说龙江剧艺术个性已经形成,还表现在它的音乐上。龙江剧建设中没有回避在音乐上与吉剧和辽南戏同源于“二人转”这个客观事实,而是也像选剧目时那样,从剧种建设出发,为我所用。

有了吉剧、辽南戏,还可以有龙江剧,各搞各的,相互竞争,相得益彰。龙江剧在音乐唱腔的创作中,广采博纳,因剧目和人物需要,创造了新腔。《木兰传奇》中追思悼念金勇的大板唱腔,显然与轻快的小曲不同,是创作成分比较大的,然而它不失黑土艺术的特色。

白淑贤们是有文化品位的,他们不是为土而土,他们对民间艺术不仅选择,尤其进行了加工提炼。对于传统戏曲表演程式的继承和改造,更是不言而喻的。白淑贤是评剧科班出身,基本功扎实,称得上运用自如,但是在运用时进行了选择和改造。白淑贤还对舞蹈、武术加以吸收、运用。这样,民间的,传统的,姐妹艺术的精华加以综合,“四不像”变成了“八面锦”,横看竖看都称得上精品。无论是刘金定、贾宝玉、花木兰,都成了龙江剧的人物,黑龙江的人物。

刘厚生先生说,“这是传统程式的发展、突破和提高”。龚和德先生说,“这种‘土’具有新鲜感、现代感”。郭汉城先生由此提出:“如果按照这条道路走下去,新剧种可以发展得更快一些,少走一些弯路。”

一剧之本,为我所用

在剧种建设中,剧目建设同表演程式的创新是密不可分的。而在剧目建设中,剧本的创作是基础,即一剧之本。要创建龙江剧种,对剧本不能没有要求。近二十年来龙江剧的“三部曲”是龙江剧剧种建设的重要成果和标志。《双锁山》是龙江剧的奠基剧目,《荒唐宝玉》、《木兰传奇》是走向成熟的两座里程碑。他们所以要选这几个戏,完全是从龙江剧剧种建设考虑的。这几个戏给龙江剧艺术创造的余地大,他们就大胆地选来,为我所用。

白淑贤为什么决定在浩如烟海的历史题材中选取花木兰?红云先生有一篇《谈白淑贤艺术的新成就》的文章,论述《木兰传奇》创作中白淑贤的思想和作用:

白淑贤最了解自己,也最了解观众,她知道选个全新的题材,观众缺乏比较;选个历史依据

十分充分的题材,常又在创作中打“历史”官司;那么,比较适合自己又能为作家广开联想的,则以民间文学《木兰辞》所提供的花木兰甚有优势。

这里所讲的“自己”,既是白淑贤本人,又是龙江剧。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对于战争的胜负,指挥员的决策至关重要,对于艺术建设,带头人的作用也事关成败。对于原著的爱国主义主题,花木兰的性格基调,都是必须坚持,不能改变的。但是,如何展现花木兰的爱国主义和她的性格特征,却可以取一个与众不同的角度:开掘花木兰的心理层面!这正是诸多《花木兰》所没有的,也正是龙江剧创新、突破,给花木兰注入新的生命的契机。

白淑贤并没有到此为止,她参与了创作的全过程。这里我们再转引剧作者张兴华的一段话:

到夜阑人静,我才与白淑贤在电话里交谈看

法,拟订提纲,之后,去挥毫疾书。一个本子,并非一次就能写成,每当卡了壳,不管是凌晨,还是夜晚,我就跟她电话联系,念段子,改句子,交流意见,讨论章节,修改场次。……有时,电话一通,就是个把钟头。

岂止写本子时如此,在投入排练以后依然如此。白淑贤不断请专家提意见,只要觉得有不顺的地方,决不放过。1993年7月,我受黑龙江省文化厅之约,参加全省艺术创作会,会议期间就参加了《木兰传奇》剧本的座谈。以后进行彩排,我被请去观看,我对一些唱词提了些意见,白淑贤便要我干脆写出来。由此可见,白淑贤抓剧本创作是如何的认真,说她在剧本创作的全过程都浸透心血,是毫不夸张的。《木兰传奇》的剧本,为综合的二度创作打下了基础。

一身绝技,几尊形象

戏曲剧种一般都是以演员为核心形成的。他们身上有程式化的高超技艺,剧本也是为他们写的。龙江剧的核心自然是白淑贤,在她身上荟萃了龙江剧刀马花旦已有的全部技艺。这些都不是天赋的,而是排戏演戏,特别是演人物的过程中逐步创造积累的。

白淑贤演戏,不是一般地照着葫芦画瓢,而是演人物,演感情,演生活。白淑贤说:

我以为当一代演员具备并掌握了一定的艺术技巧和功力的时候,再提高则要靠自己对所从事的剧种的艺术规律的理解,靠对剧本所提供的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刻的剖析,靠对生活的认识和挖掘。

白淑贤确实是靠掌握龙江剧的艺术规律,剖析她所演的每一个人物,把他们放在黑土文化生活氛围之中,塑造成一个个东北味的龙江剧形象。

刘金定性格热烈、豪放,充满激情,甚至有些任性、野性。她敢于不遵父命,自贴招婿榜,她真像个北大荒丫头!然而,她的内心世界又是柔媚的,多情的。演贾宝玉,重彩之笔落在“荒唐”二字上。但这“荒唐”不是闹剧的荒唐,而是悲剧的荒唐,在荒唐的故事中揭示严肃的主题。因此把握贾宝玉的思想脉络是关键。他是个封建礼法的



白淑贤在《荒唐宝玉》中扮演贾宝玉

叛逆者,在“正人”、常人们看来荒唐的举动,在宝玉看来却并不荒唐。他敢哭敢闹,敢爱敢恨,敢在大人物面前展露才华,敢和下层小人物接近,甚至敢和戏子演《猪八戒背媳妇》,他既有憨气、傻气,又有才气、胆气,他的性格的不同侧面,反差很大。白淑贤正是把握住了贾宝玉的这些性格特征,充分发挥了龙江剧特有的艺术风格,把一个黑土地的贾宝玉塑造在舞台上。演花木兰则是着力于开掘她的思想深层面。花木兰从不适应在男人兵阵中生活,到她成了个“男人”,成了三军统帅,按常规来看,花木兰形象的塑造似乎已经完成了。白淑贤与众不同,她的戏恰恰是从这里开始的。韩梅求爱、金勇醉酒、梦里出嫁,到得胜哭坟,挥毫明志,又真实地告诉人们,她不但是个统帅,她依然是个女人。她有情有爱,但是在战争环境中她不可能如愿以偿,她只能在梦中表现,而当战争胜利之后,可以如愿以偿了,与她相处了12年的金勇却永远离开了她。这是不是悲剧呢?当然是。这是不是对战争的控诉呢?不是。花木兰个人爱情的悲剧性和民族战争的正义性之间有矛盾,但又有统一性。花木兰用个人的牺牲和奉献换得了国家民族的和平安定,成全了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幸福,是她的一腔“兴国安邦赤子情”,这就更加深化了爱国主义的主题。至于她个人的悲剧,则是“荣誉得失身外事”了。这就是白淑贤的花木兰的价值和感人之处。

塑造这样一个花木兰,白淑贤依然调动了龙江剧的诸多艺术手段,特别是在“梦嫁”一场,运用“单出头”的表演手段,一个人扮演三个人物(金勇、婆婆、邻家二嫂),表演得情趣横生,淋漓尽致;施展绝技,双手正反挥毫抒发情志,由此看出龙江剧的表演程式更加成熟,白淑贤的绝技更



胡耀邦接见白淑贤

加高超。然而,我认为《木兰传奇》中白淑贤的唱,更有特色,是她塑造花木兰与塑造刘金定、贾宝玉手段的最大不同之处。在哭坟时,她没有过多的动作和身段,也没有要什么特技,只是静下来祭奠,追忆,诉说,招魂,明志,因此唱腔不能零碎,而是把观众熟悉的龙江剧的各种板式组成一个大唱段,一气呵成,荡气回肠,催人泪下。

剪发加肥,一心三用

白淑贤在勤学苦练方面,也是青年演员的榜样。创建一个剧种的表演程式不容易,用这些程式演好演活人物也很不容易。领导给提供条件,导演老师指教,专家出主意固然重要,但代表性演员的勤学苦练更重要。为了龙江剧的建设,白淑贤真有一股“我不领班谁领班,我不吃苦谁吃苦”的大无畏精神。

她说:创造,是神圣的工作,要靠天才,更要靠勤奋,要吃别人不能吃的苦。她甘当小学生,向京剧、评剧、舞蹈界的老师学,特别向二人转的艺人学,向同辈学。学,但不是照搬,而是“为我所用”。她原本是学青衣的,却要练成刀马花旦,

其难度可想而知。已经过了练幼功的年龄,却还要从头练撕腿、吊腿。至于二人转的扭、耍、抖的绝功夫,那是更要拿到手的。凭着她的决心、诚心、恒心,她终于练成了一身技艺。人们说,白淑贤演戏“忙乎”,人老是动,“不动不能说,不动不能唱;不动不能演”,十分确切地概括了白淑贤的演技。她在《双锁山》、《荒唐宝玉》、《木兰传奇》中边唱边舞边双手写字,甚至反面写字,“一心三用”的绝技,使观众专家无不叹服。

人们看戏,既要演员,又要看演员演的人物。白淑贤演了不少人物,这些人物大都是跨行当的,其中的贾宝玉离她原来的行当更远。白淑贤接这个任务时,已经42岁,而出场时的贾宝玉才十五六岁。富贵子弟体胖脸圆,白淑贤却“太瘦了”。体形怎么办?改造自己!她毅然剪掉了一头长发,变成一个小伙子。她加大饭量,填鸭子一样使劲吃,终于使自己肥胖起来,成了“富家子弟”。演人物,真是将她改造了!

筑基建塔,栽树乘凉

龙江剧有了自己独特的程式,独创的剧目,代表性的名演员,剧种形成了,在戏剧界,在全国都有了较大的影响。白淑贤两度获得文华表演奖,两度获得梅花奖,还获得上海白玉兰奖,可以说是功成名就了。那么,龙江剧下一步该怎么办呢?专家看到并且提出:龙江剧已经创造的程式,尽管不只是刀马花旦的,相关的武行、丑行、彩旦行也相当精彩,其他行当则弱一些;已经有了几个成功的戏,有一些精彩的折子戏、小戏,但对一个剧种一个剧院来说,积累还嫌少;白淑贤现在已经年过半百,与她同台的演员也多数年龄不小,后面的青年演员怎么样呢;省龙江剧院的建设有了成效,全省还有第二个龙江剧团吗?这些也正是白淑贤正在思考并且要着手解决的问题。她说:

要有一群“人合心”的有志之士共同奋斗。传统戏的表演程式也是经过一代一代的艺术家不断努力,才最后形成的。我们这样年轻的新剧种,就更必须集思广益,必须有这么一班人,志趣相投,抱成团儿,朝一个目标去想,使劲,才能成功。

白淑贤在龙江剧院带起了领导班子和创作班子,抱成了团儿,继续奋斗。他们从抓剧目生产入手,“一箭双雕”,解决继续创造程式和培养青年演员的问题。白淑贤选定了《梁红玉》,作为攻坚目标。她没有在戏里担任角色,而是把她的学生推了出来。“一箭双雕”,可以调动创作人员、老师和演员几方面的积极性,成功了便是三丰收:剧目、人才、技艺。白淑贤说:“要加强演员的素质训练,培养能文善武的优秀演员。作为一个剧种,既要有自己的剧本,又要有自己的音乐,更要有自己的导演,而最重要的要有自己的演员。如此说来,在今后的剧种建设中,一定要加强演员的素质训练,从而培养出我们自己剧种的青年尖子演员。”现在,龙江剧在剧种、剧院、剧目、人才、表演程式诸多方面都踩出了路子,树立了榜样,能不能产生龙江剧的“第二团”呢?对这个问题,白淑贤不但有所考虑,而且正在着手解决。在龙江剧院改革和建设的时候,考虑如何发挥广大演职人员的积极性,如何与二人转剧团合作,进一步从母体艺术吸取营养,同时也推广普及龙江剧的精品剧。这样在长期合作、交流的过程中,使龙江剧的基座宽厚起来,融化为面貌更新鲜的龙江剧。

白淑贤还说过:

有些剧种,一经出现了名气很大的头牌领衔主演,却封杀了后继人才脱颖而出的机会。龙江剧在白淑贤身后,会不会重蹈前车的覆辙呢?另外,作为一个新兴剧种的龙江剧,它的各类人才都没有专门的学校培养,要保证长足的发展,必须建立自己的专业学校。

白淑贤的贡献在于,她把在表演上的创造,规范为教材,传给她的学生。这样就能够相传下去,而且能够大面积收效。她现在正在盛年,毅然放弃了争夺梅花大奖的机会,把新排的戏让给了她的学生,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办学上。今年六月初,我参观了白淑贤艺术基地,看了少年学员的精彩表演。同去的专家赞叹说:他们在教学和管理上,使一些专门的艺术学校相形逊色。我们还看了龙江剧青年演员的演出,大家情不自禁地说:龙江剧后继有人! (责任编辑 赵友慈)

(作者为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

屈原流放地溆浦

● 李华章

溆浦,古为楚地,位于湖南西部,沅水中游,是伟大爱国诗人、世界文化名人屈原流放的定居地。由于历史久远,硝烟散尽,人们对溆浦并不了解,说起溆浦,如闻“番外”一般。

屈原虽一片孤忠,品格高尚,又娴于辞令,终敌不过佞臣谗言,抑郁不得志,而遭到放逐。屈原由楚都郢往南流放,入湖湘,溯沅水,发枉渚,宿辰阳,入溆浦。他在《涉江》诗中写道:“入溆浦余徘徊兮,迷不知吾所如……”记述了他放逐溆浦的经历。当时的溆浦,并非“穷荒绝域”,也绝不是“非人之境”。考古学家禹经安先生经过30多年的考证与发掘,认为溆浦是楚国南邑之重镇,人口较稠密,文化较发达,经济较繁荣。到了战国末期至西汉初期,汉高祖已将武陵郡治设在溆浦。县境四周山峦重叠,中部开阔平坦,是沅水中上游地区最大的河谷盆地,属五溪(黔中)的战略腹地。要不,汉高祖怎么会把武陵郡治设在溆浦呢?!

为了纪念三闾大夫屈原流放溆浦,黎民百姓便在他的居住地修建了“招屈亭”,亭位于县南5里许。修建日期估计在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以前。从目前史料看,它是我国纪念屈原最早的纪念亭。《溆浦县志》记载:“招屈亭,冬无积雪,夏无蚊蝇。”足见屈原的精忠爱国精神感动了天公。明代进士邓少谷《招屈亭怀古》诗云:“楚天今古一亭幽”。清代郭远厚也在《招屈亭怀古》中写道:“溆水沿浦人,汪洋亦何深,水深汨罗似,水清孤臣心,死生岂不惜……昭昭人已去,茫茫古与今,魂兮归来未?”溆浦的“招屈亭”虽多次修复,仍不免废毁,惜乎哉!

为了纪念屈原,溆浦划龙船的历史悠久。自东汉初马援平“五溪蛮”后,溆浦就有过大端午和小端午的习俗。五月初五为小端午,龙船会由头人组织年轻力壮又识水性的人下河练习划龙舟。五月

十五大端午正式举行龙舟比赛。所造龙舟有头有尾,船身长,船尾翘,装饰美观。龙舟下水,必先游江祭祖。一只龙船,33个桡手,分成头桡、引水、前羊角、夹包、鼓包、后羊角。引水又分头引、二引、三引;龙船鼓有当头鼓、分手鼓、汉子鼓、插花鼓;舵有逆舵、顺舵、懒汉舵、撒手舵。一条龙船,头桡、鼓手、艄公三个人是核心,鼓手看头桡的桡片击鼓,桡手听鼓手的鼓划桡,艄公看鼓手的鼓槌掌舵,似一个连环套。乱了套,这只龙船定吃猪尾巴无疑。夺标归来,再在祠堂杀猪宰羊,以示庆贺。同时,把龙舟抬到专供停放的地方——“龙船亭”内。亭形似长廊,两头高翘,外形别致,是沅水中游溆浦一带独具的民间建筑。

溆水悠悠流去,流不断百姓对屈原热爱和崇敬的深情。新世纪伊始,溆浦人民特意在县城的溆水河畔新修一座“怀屈楼”,仿古建筑,飞檐翘角,气势恢宏,雄伟壮观。

屈原受谗害,一再被流放,自是政治上的悲剧。相反地,却成就了他的文学大业。如果屈原没有流放的人生经历,就不可能写出《楚辞》,如果没有《楚辞》,也就没有屈原的伟大。《楚辞》将与日月同辉,屈原精神将永放光芒!也许是受屈原的深刻影响,溆浦历代学风盛行,书院林立,人才辈出。再者,按照儒家观点,兴建书院要选择优美的环境,宁静的院舍,这才能够诱发青年学子的性灵,陶冶情操,专心读书。而溆浦有溆水碧绿长流,四周万山环抱,山青水秀,为兴建书院提供了得天独厚之地利。据禹经安先生《溆浦明清书院考》云:“县境先后有19人中进士,141人中举人,420余人中贡生。同时,还培养了一批蜚声中外的学者。”这在湘西一带自然享有盛名。清末废除科举后,书院大多改为学堂或学校。这个楚文化的传统是不可忽视的。重温历史,发人深省。

近代以来,溆浦出了教育家、辞学家、《辞海》主编舒新城,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向达,经济学家武育千,教育家、法学家杜元载等,以及我国妇女运动的先驱者向警予,声名远播,溆浦人为之骄傲。难怪著名文学家、学者沈从文称赞:“溆浦为人杰地灵之地。”

著名青年作家王跃文在《〈溆浦拾轶〉序言》里写道:“溆浦从来就是个文气很重的地方。读书人在溆浦从来都是很受尊重的。后生们浪漫,总愿意相信溆浦重文化的传统缘于屈子。而文化的确是有基因的,溆浦历代都不乏以天下为己任的文

化人,正因承了屈子之风。”由此,我想起屈原故里千百年来文化积淀深厚、代有才人,文气浓郁,人文荟萃,盖沐浴屈子遗风之故吧!

历史自有兴衰,溆水也有涨落。当我重返家乡,徜徉在溆水河畔,耳闻屈原传说,目睹新建的“怀屈楼”,心潮起伏。我俯看滚滚江水,一个泡漩沉入远古,一个泡漩又浮出现时;岁月把屈原的身躯化作灰烬,历史又把屈原的心灵铸成诗魂。我久久地品味着伟大诗人一生的爱和憎……

(责任编辑 程 度)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 价	邮 费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	郭汝瑰 黄玉章	68.00	7.00
邓小平时代(上下册)	杨继绳	32.00	4.00
我向总理说实话	李昌平	23.00	4.00
一盏明灯与五十万座地堡	严 秀	12.50	3.00
沧桑十年——为了悲剧不重演	马识途	33.00	4.00
李锐论说文选	李 锐	28.00	4.00
瓮中杂俎	廖沫沙	19.00	3.00
叶剑英在非常时期	范 硕	36.00	5.00
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大史学	吴 江	11.80	3.00
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	胡 绳	12.00	3.00
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	刘杰辉 张国华	25.00	4.00
中国改革开放史	朵生春	66.00	7.00
无罪流放	贺 黎 杨 健	24.00	4.00
陆定一传	陈清泉 宋广渭	29.80	4.00
杨尚昆回忆录	杨尚昆	25.00	4.00
遇罗克遗作与回忆	徐 晓 丁 东 徐友渔	26.00	4.00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	纪希晨	49.00	4.00
昨夜西风凋碧树	徐光耀	15.00	3.00
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	季羨林	24.00	4.00
没有情节的故事	季羨林	25.00	4.00
枝蔓丛丛的回忆	季羨林	26.00	4.00
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	李 锐	29.50	4.00
思想解冻的春天			
——大转折日日夜夜(卷一)	张湛彬	24.40	4.00
红色风波中的交锋与较量(上下册)	曾繁正	39.80	4.00
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	凌志军 马立诚	23.80	4.00
社会主义前途与马克思主义命运	吴 江	20.00	4.00
思忆文丛: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			
之一 六月雪	牛 汉 邓九平	25.00	4.00
之二 原上草	牛 汉 邓九平	24.00	4.00
之三 荆棘路	牛 汉 邓九平	24.00	4.00
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上下册)	唐德刚 王书君	69.00	6.00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章含之	30.00	4.00

代购代邮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叶剑英在非常时期》叶剑英同志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他在“文革”十年中同林彪、江青的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的惊心动魄的斗争,更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本书以独特的视角和纪实的手法,客观翔实地记述了这场斗争的始末,展现出一代元戎的文韬武略和高超的斗争艺术。

《红色风波中的交锋与较量》是中共建党后 70 年党内是非曲折的大写真。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发生过不少悲剧,教训太深刻了,其主要表现就是某些领导人的错误路线,使许多忠诚的战士在貌似革命的口号下做了无谓的牺牲,甚至使党内多次面临分裂的危险。如三次“左”倾路线指导下的“肃反”扩大化,“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等。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红色风波中的交锋与较量,可以使我们警钟长鸣,不再犯“左”的或右的错误。

《无罪流放》是光明日报出版社以“五七干校”生活为主题的口述实录体专著。“五七干校”是研究中国当代史的一个重要课题。它是我国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时期所经历的特殊遭遇、再生与自我反省的一幕。书中有张光年、吴祖光、屠岸等 66 位知识分子的亲历告白,它真实地记录了那段历史。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苏三监狱”与《玉堂春》

● 谈 风

一曲“苏三离了洪洞县”，已经唱了大约上百年，那宛转动听的京剧曲调唱遍了全中国，唱遍了海内外。在中国年纪稍长的人有几个不知道洪洞县的？有几个不知道“洪洞县里没好人”这句语意双关的台词的由来？有几个不知道苏三与王金龙情深义重、曲折多磨的恋爱故事的？

可是，却很少有人知道那囚禁苏三的监狱如今还在，更不会知道在这座监狱的庭院里还立着一座苏三的立式雕像。

此刻，我正站在这座雕像的跟前，想从雕像上追寻鉴赏苏三昔年的风姿。可惜这座雕像是根据作者的想像雕制的，这种想像又是根据舞台上演员形象模拟产生的，因此这座雕像纯是艺术上的创作，从外貌上很难找到与实际的苏三的关联，如果一定要确认她们之间有所关联，那就是苏三立像也是一个“罪犯”。

雕像苏三身披罩衫，风尘仆仆，右臂微曲，以手抚胸，似有无限心事，脸上带着被屈含冤的凄楚表情，嘴角眉梢又流露出有不甘的激愤之态，昂头引颈凝视远方，表现了一个身逢绝境的弱女子悬想前途的悲伤而又不屈的精神。苏三立像的造型并不十分理想，雕制工艺也不像出自名家之手，但作者的设意确是经过一番苦心的。刻画古人，意重于形，这是难能可贵的。你总不能把苏三雕成南京莫愁湖公园中婀娜多姿的莫愁女吧，因为这毕竟是一所监狱。

囚禁苏三的监狱是一座我国保存最久的明代囚牢。它坐落在山西省洪洞县城内古槐大街上。因为这里曾囚禁过苏三，所以又称“苏三监狱”。绕过苏三的雕像，就是监狱的正门，到洪洞县的人如果不参观一下“苏三监狱”，就会有没到过洪洞的遗憾。我随着络绎不绝的游人踏进了昔时谁也不愿进来的监狱之门。

这座监狱由过厅、普通监狱、死牢三部分组成，总面积达 610 平方米。各部牢房门窗狭小坚实，围墙高大，院

内阴森冷怖，给人一种强烈的压迫感。穿过厅便是普通监狱区，两排长列监房东西相向，中间为通道。通道上方监房檐间罩着密如蛛网的铁丝网，网上挂有响铃，以防囚犯逃跑，通道南端有两间禁房，是禁子住的，禁房两侧设有狱神庙，死囚洞，东北便是死囚牢。

500 多年前苏三就是这死囚牢里的待决女犯。死囚牢当门刻画有古代传说中的狴犴，其貌狰狞可怖，形似虎头，故称“虎头牢”。其牢门设置前后两道，中间为高 1.6 米，宽 1 米，长 3 米的低矮的通道，通道两端各有一道门槛和门扇，一道朝左开，一道朝右开，是明代标准的死囚牢门，打入死牢的囚犯多为已经定案的待决囚犯。进入死牢时，要低头，弯腰，躬身通过，如进鬼门口，使那些死囚已经绝望的心情更加绝望。

死牢为三间监室，左侧角上的一间黑洞洞的牢房是囚禁苏三的，门上写着“苏三监室”。死牢无窗，墙壁三尺厚，室内黑暗而又狭窄，囚犯仅能坐地，真是坐牢。我无法猜想当年那位含冤少女玉堂春是怎样在这里苦熬长年待死岁月的。

苏三监狱建于明朝洪武二年（公元 1369 年），已有 600 多年的历史，是我国现存的最古老的监狱，不但对研究中国明代刑法有很高的价值，而且也是今天旅游的重要景点，但它出名的主要原因却不是因其历史久远，而是因为它囚禁过苏三。当然，一座监狱如果仅仅因为囚禁过一个妓女而名传后世，那也是不可能的，其间必定有着极特殊的社会原因。

确实，这不是一个普通妓女的普通故事。

苏三是京剧传统剧目《苏三起解》、《玉堂春》中的女主角，而这两个戏又是人们非常喜爱的，因此苏三这个也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但看戏的人多以为戏中的情节、人物是过去文人编造的故事，不是真事儿。但这个戏虽有某些情节是后人设置的，但主要的情节和人物却是

真实的，剧中的苏三和王金龙以及他们的恋爱故事大体也是真有其事的。

京剧《玉堂春》是根据明末冯梦龙编著的《警世通言》中的《玉堂春落难逢夫》的话本改编的，其后的折子戏《苏三起解》，可以说完全是京剧里前辈们根据话本的基本内容进行了精心的再创作而成的。

话本是根据民间传说的故事为说书人说书时准备的脚本，逐步完善加工成话本。《玉堂春落难逢夫》的话本是由当时的一个轰动民间的带有“桃色色彩的冤案”编成的，这个案件的某些实物至今仍保存在这个监狱的陈列室里。

人们天生赋有美好的愿望，对一切美好的事物遭到挫折、压抑、打击会从内心里发出同情，希望有情人能成眷属，这是人类一种自然的感情，古今中外，莫不如此。苏三本是明朝年间山西大同人，是一个姓周的贫苦农民的女儿，因家贫，七岁便卖给北京开妓院的苏淮，改姓苏，在妓院里排行在三，即名苏三，妓名玉堂春。就在苏三年将长成之际，遇到了宦家公子王景隆（剧中改为王金龙），两人一见倾心，誓结白发之盟。故事的后半部分是大家都知道了。王孙公子与漂亮姐儿恋爱不是新鲜事儿，也不易引起人们同情，更成不了“佳话”。新鲜的事儿是苏三与王金龙分别之后，被骗卖到山西洪洞县富商沈洪（剧中叫沈燕林）家作妾，发生了皮氏毒死丈夫赖在苏三头上的冤案。还是无巧不成书，王金龙科考得中派到山西巡按，恰遇此案，王金龙为苏三平反冤案，克践前诺，完成了人们“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愿望。于是这个被封建上流社会视为“不齿行径”的遇合终于抵不住普通百姓的善良愿望，变成了民间传颂的动人故事。

冯梦龙《警世通言》的话本把这个故事讲得很详细，情节曲折动人，600多年来流传江南江北，始终不衰。

但我更佩服的是京剧的《玉堂春》、《苏三起解》的编剧、导演和演员。我喜欢京剧，但不内行，不大懂京剧板眼，却喜听其行腔。从艺术创作上说，这个剧本是很难编写的，因为它仅仅是个家室案件，不像清末江南大案《杨乃武与小白菜》那样充满社会矛盾的曲折和复杂，难能有什么发挥。如果照事件发展顺序铺陈，会成为流水账式的过场戏，如果照话本实录安排，会成为杂乱无章、琐碎无聊的闹剧。而我们京剧界的前辈们以高超的艺术手法，撮其要，略其繁，把整个故事集于《三堂会审》一案上，又以《起解》为补充，把苏三的身世和这起冤案详加补述。

没有中国戏曲这样强的表现力，这两个戏都不会有今日的成功。

在这两个剧中，女主角苏三没有华丽鲜艳的服装，而是罪衣罪裙，道具只是一副套在脖子上的大刑枷和一根木棍，没有一件是好看的。女主角没有甩摆水袖和多姿的舞蹈。在《起解》中，女主角只是走路，在《三堂会审》中苏三从头到尾是跪在地上，简直和清唱差不多。试问世界上有任何一个剧种能用这两个基本动作把这两出丰富多彩的戏演成功？京剧却以其特有的表演艺术和魅力，能在全剧两三个小时的演出中，令全场观众停睇不瞬，全神贯注在舞台上。我曾多次看过京剧《女起解》和《玉堂春》，使我印象最深的却是最初的一次和最后的一次。最初的一次大概是1950年或1951年在北京看著名京剧演员杜近芳演的《起解》和《玉堂春》，使我深深受到感动，作为年轻人我也第一次感到京剧的魅力。最近的一次是观看了又一位著名京剧演员李维康在徽班进京200周年纪念日里演出的《玉堂春》，使我对这个戏更为深爱上了。两位表演艺术家那宛转动听、极具感染力的唱腔，把观众带进了故事的梦境之中，使人心醉神驰。这两个戏中都没有设计舞蹈段落，但苏三在《起解》中走动的每一步都是婀娜多姿的优美舞蹈，令人赏心悦目。即使是玉堂春跪在地上回答堂上问话时那种惊堂惧刑，那种娇羞掩面，那种对情人一往情深所表示的动作也无一不是动人的舞蹈。京剧《女起解》和《玉堂春》的导演与剧作者，在戏中安排的人物冲突，既极具戏剧性，又符合典型人物的性格，使这个戏的特色非常鲜明地表现出来。

这两个戏所以能流传百年不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它能通过两人的对话或几个人的对话，把一个具体案件与历史人物和广阔的社会背景联系起来，使之反映的不只是当时一个事件，而是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社会问题。看了戏给人以很多联想和启发，给戏增加了分量，因之其流传的价值不会因时间的推移而减弱，而且愈久愈会使人感到其意味之深长。我们应该深深感谢京剧界前辈为我们创作了如此美好的艺术珍品。

洪洞县的明代监狱因苏三和王金龙的爱情故事而名传海内外，苏三的故事又因京剧艺术而得彰明，但是归根到底还是因为这是一曲反封建、反冤狱的颂歌，它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深切同情，所以才能广为传播。

（责任编辑 赵友慈）

2002 /11 总第 128 期

陈独秀李大钊开创早期党风
我们需要再反一次党八股
总理办公室撤销始末
我的父亲阳翰笙
邓拓收购名画的风波
追思孙犁老师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11>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邮发代号：82-507 定价：4.80 元